

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

毛泽东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A84
54

88339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15645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

刘益涛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
刘益涛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印张 6插页 158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128—5/9·4417

定 价：9.6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

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的坚实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

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前 言	(1)
上 编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	(1)
一、只要你提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1)
二、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	(7)
三、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10)
四、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	(16)
五、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20)
下 编 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纪事	(26)
1939 年	(26)
1940 年	(28)
1941 年	(32)
1942 年	(52)
1943 年	(164)
1944 年	(208)

上 编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 精 兵 简 政

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的第一次精兵简政。是抗日根据地克服物资缺乏的极大困难,提高领导机关工作效能的重要措施,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之一。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极其重要的政策”,就此作过不少指示、讲话,并写文章专门论述这个政策的重要性。精兵简政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实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①,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好了充分的物资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总结这一历史经验,不仅对于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坚决执行党在十四大提出的机构改革的艰巨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只要你提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首先提出来的。1941 年 11 月 6 日至 21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开幕那

天,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共产党人要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希望党外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抗日救国大计提出意见和建议^②。当时还是米脂县参议会会长的李鼎铭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感动,他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根据边区群众这些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与其他 10 名参议员一道向会议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要求“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还提出解决财政困难的五项办法,其中第三项是:“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③。

这个当时被编为 81 号的提案一经提出,在参议会上立即引起反响,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要裁减政府工作人员,民主政权如何巩固发展”,甚至还有人以李鼎铭是党外人士,怀疑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动机纯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非常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④。毛泽东肯定了这个提案,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和说服工作。

毛泽东肯定精兵简政的提案主要有两点：一是切中时弊，指出了我们的毛病；二是找到了对症药，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什么是我们的毛病？就是“鱼大水小”。“鱼大”就是脱产人员太多，“水小”就是人民负担过重。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边区刚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1.4万人；1938年也仅1.6万人；到1939年一下增加到4.9万人；1940年剧增到6.1万人；1941年已上升为7.3万人。脱产人员猛增，造成机构庞大臃肿，机构庞大臃肿就会带来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194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曾规定各区域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脱产人员不能超过全人口总数的3%^⑤，但当时实际已达5.4%，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边区人民交纳公粮为例：1938年仅为1.5万石；1939年增至6万石；1940年上升为10万石；1941年则剧增到20万石，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个农民要负担1斗4升（合42斤）粮食。1941年6月发生边区一农民借雷电劈死人说怪话的事件，就是部分群众对负担过重产生不满情绪的反映。

对于“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早就有所觉察，但解决矛盾的办法主要是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脱产人员进行生产自给。1939年春耕和秋收季节，中共中央都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每次都出席并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他在2月2日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功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

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环境,但这同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⑥。9月25日,毛泽东在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他首先指出边区今年生产运动完成了3万石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已不算小事了。今天开秋收动员大会,大家再努力,便可把已到嘴边的粮食,装进我们的肚子里面了。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以后边区吃粮困难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4万人,这4万人吃的粮食一半是由老百姓帮助解决的,另一半还没有来源,怎么办呢?饿死吗?不成!解散吗?也不成,那末,只有走第三条路,自己动手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⑦!

1941年6月以后,陕甘宁边区群众对负担过重反映强烈,毛泽东在处理好皖南事变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后,把注意力比较集中地转向经济工作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与谢觉哉就边区经济工作,如运盐等问题曾多次进行商讨,设法解决边区经济工作中的争论问题,提出发展经济、平衡出入口的方针,督制1942年经济预算,并设想从1942年开始统一经济,实行统筹统分政策。随着这些经济工作的开展,必然会产生对机构、人员的调查与重新确定。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讨论了关于改革中央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决议“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

策,总结经验,调济干部,其组织以精干为原则”;“中央各部委组织,须按上述原则,重新编制”。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已经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还决定延安一些学校的合并问题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规定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形式;决定成立中央调查局,毛泽东兼任局长;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还决定了中央各部委的编制,如宣传部,干部19人,事务员15人,马5匹;组织部,干部16人,事务员11人,马4匹;统一战线部,干部18人,事务员12人,马5匹;财政经济部,干部14人,事务员7人,马2匹;中央青委,干部10人,事务员11人,马4匹等等^⑨。这些情况说明,在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前,毛泽东也在探索解决矛盾的对症药,把开源(生产)与节流(缩编)两个方面逐渐地结合起来,所以毛泽东采纳李鼎铭的提案是必然的。

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肯定精兵简政政策,他说:1942年度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第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第二扩大收支,发展生产^⑩。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11月18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165票多数通过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二届参议会闭幕后,12月3日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训令。12月4日又发出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⑪。这样,实行精兵简政的工作,不仅在陕甘宁边区,而且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采纳精兵简政提案这件事,不仅说明精兵简政这个提案提得及时,提得好,对抗日事业有好处,而且还在于打破一部分共产党员不愿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派情绪,把精兵简政政策提到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高度,予以充分的重视。11月21日,毛泽东在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说:“开了十五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我觉得开得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号召要反对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⑧。半年以后,即1942年7月8日,当李鼎铭回忆这段往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当我提此案时,曾趑趄至再,并经友人数度劝阻,但我在边参会上,目睹共产党对于民主合作,完全出于至诚,乃毅然提出,结果非但未遭反对,且受该党人士热烈赞助,而经大会接受。”^⑨可见,党采取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的政策影响之深。就在二届参议会期间,由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⑩。不久,李鼎铭全家由米脂县搬到延安来住,搬家前李鼎铭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对李鼎铭说,还是留一点吧!李鼎铭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就此赞誉他为“开明绅士”。后来,毛泽东还多次批评党内同志听不得党外人士不同意见的宗派主义情绪。1944年9月8日,他在悼念为公牺牲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时,作了一段著名的演讲:“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

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⑮毛泽东把采纳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提高到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的高度，是有深远意义的。

二、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

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对各抗日根据地执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发现，“一般已开始在做，但均做得很不够”^⑯。有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发生明减暗不减，上层减下层不减，前方减后方不减的现象。还有一些地区和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没有普遍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极少数地方不但根本尚未开始精兵简政，反而还想扩大部队增设机关学校。凡此情况表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在他们的思想上对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片面的观点。从当时调查到的情况看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只强调将来要发展，不愿意在今天进行精简的“远视眼”；二是只看到今天还能勉强过得去，不顾将来严重环境一定到来的“近视眼”；三是只晓得“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不懂得兵多关键在于能否养活的“多兵论”；四是只认为机关大、干部多，人多好办事，不理解机关林立、系统纷繁、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反而降低的“繁政论”。这些错误的思想，究其根源是复杂的，从深层上探讨，包括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但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为着彻底执行精兵简政，首先必须扫除思想障碍，也就是说精兵简政首先要从思想

上贯彻,然后才能够在组织上落实。为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始终没有停止扫除思想障碍的工作,从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起,就不断在《解放日报》上讨论精兵简政,帮助大家提高思想认识。

毛泽东认为,对于精兵简政“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⑦。所以,他在著文、讲话、发指示时多次首先说明这个问题: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的提出还是确有需要而提出来的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⑧。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武装刚刚建起,还没有发展壮大就提出精兵主义,当然是不对的。那时的抗日政权也在初创时期,没有巩固,提简政也是不对的。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根据地在缩小,即“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⑨。这是因为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消耗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这是因为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使得抗日根据地必然要缩小。而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队伍和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

毛泽东抓住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认识事物凝固不变的特征,教

育全党的认识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1942年9月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运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松松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他还特别指出机构精简后,队伍整编后,精小能胜庞大的道理,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②。毛泽东希望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孙行者和小老虎,从而战胜那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办法就是“变一变”,精兵简政,我们的身体变小,但更加扎实了,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智慧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党摒弃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会自觉地克服对于精兵简政政策一些不正确的看法。思想澄清后,就会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实行,也才能真正实行好。毛泽东在说明精兵简政的必要性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正如当时《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总结的那样:精兵简政,这一口号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③。这样,就把它与教条主义对立起来,与当时党内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的运动结合起来,以整风来推动精简,以精简来检验整风的成果,从而取得精神的与物质的

双丰收。

特别值得提出的,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于全面地认识精兵简政的实质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如毛泽东谈到当时的困难情况,一再强调我们的困难是接近胜利的困难,是胜利前夜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那么为克服这种困难的精兵简政政策,也不是消极的政策,而是积极的政策;不是单纯的撤并机构、裁减人员的政策,而是为了积蓄力量,提高工作效率,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政策;不光是为了克服目前困难,也是为着争取将来更大发展的正确政策。如毛泽东“衣服必须随着变化”的理论,季节常变,衣服常换,说明精兵简政不应是一朝一夕的突击任务,而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机构应随时适应环境,环境变了,工作机构也应相应改变,不然会生毛病的。这些道理虽然没有直接讲出来,但其影响却是深刻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一直在思想上开展着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一方面反对不精不减的倾向,这个道理上面已说得很充分了,另一方面也要反对精简主义的倾向,也就是反对做落后群众的尾巴,一味地要精要简,成为拆伙解散,瓦解力量,取消抗战。精兵简政虽说需要随季更衣,但并不等于不要穿衣,而是要将衣服穿得更合体,更漂亮。

三、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

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到1944年1月李鼎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陕甘宁边区政府简政总结报告为止,一共经历了2年多时间,但以陕甘宁边区来说,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就连续进行了3次

精简(个别地方,如晋察冀边区还进行了4次精简^②,这一方面说明中共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的决心大,非能切实见效不可,一方面又说明精兵简政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策,要做到彻底执行精兵简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简从1941年12月中旬开始,至1942年4月结束,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1598名,占边区级机关原有人数的24%。第二次精简从1942年7月开始,9月结束,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分开,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的职权等。这两次精简,虽然有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缺乏经验,尤其是对精兵简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进不大,尚未达到精简的全部目的。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有些同志说失败了,我说是小的胜利,大的失败。你说一点也没有胜利,那不见得,现在就有16000人没有领粮食了,但听说人却是一个没有减,从前16000人领粮食是各机关冒名领的,现在没有冒领,但对原来的人却一概未动,这就叫做失败。毛泽东幽默地指出了边区第一次精简存在的问题,但也给予了鼓励,并说现在要真正的精兵简政,说明这个道理,如何精兵简政,不简为什么不好。精兵简政要党政军三方面配合去作,要提倡统一,要研究怎么样就搞得更合理一些^③。

1942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演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时,批评了边区前两次精兵简政进行得不彻底。他说:为什么进行得不彻底呢?就是因为没有把具体的条件加以周密的分析。比如我们边区有多少人,要穿多少衣服?这中间是有矛盾的,老百姓少,公家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一方面要精兵简政。究竟今天能够简多少?政府系统、党的系统、民众团

体系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精密的分析。不能那样糊里糊涂,说现在要精兵简政了,就简。以前简过好几次都没有简彻底,那就带了一点糊里糊涂,没有加以周密的分析^⑨。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前两次精简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说明要精简彻底就应该作好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

1942年8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文章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全面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边区对精兵的执行可以说是很彻底的,如总部直属队在减兵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的4%,其余96%,除有一部分用以充实下面以外,其他都真正减去了。边区政府本身精简后,也裁减了44%的工作人员,节省经费46%。他们在如何精简的做法上,不是单纯的减员,而是加强下层和更好地使用干部,提高干部质量,以一当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如边区高等法院在精简后减少了一半工作人员,而且提出:“少用一个勤务,多添一个法官”的口号,真正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他们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摸索出一套从政治动员到总结检查的系统做法。这些成绩与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商谈召开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事宜,原拟定于10月10日召开,后决定延期。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他们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19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毛泽东在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同时,深感到其它根据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还做得很不够,因此在信中

最后提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②。也就是精兵简政要来一个大举方能切实见效，不能是走走过场、浮皮了草。以后毛泽东还指出“精兵简政也算是个运动”^③，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普遍地进行。

精兵简政既然要来一个大举，要当作一场运动来开展，中央就要拿出一套办法和确定要达到的目标。毛泽东根据晋冀鲁豫边区的经验指出“应检查（点验）精简”^④，也就是要通过工作大检查来推动精简。1942年8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⑤。8月29日，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的目标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还提出精兵简政要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⑥。10月1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毛泽东对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办法和目标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即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要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就在西北局高干会期间，毛泽东为会议撰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在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的同时，也提出了要继续实行精兵简政，他说：这次高干会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要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⑦。就这样，第三次精兵简政在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于1942年底开始进行了。

这次精兵简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的要求，不仅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而且在党中央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地实行了。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1941年9月会议后就提出的精简中央机构问题，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调整了机构，精简了人员。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还兼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加强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其它也进行比较大的调整和精简，如把原来中央职工、妇女、青年三个委员会合并为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⑧，精简了许多人员。中央机关的精简为其它党政军机关的进一步精简作出了榜样。

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毛泽东就多次指示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要进行精兵简政。1942年1月20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电示聂荣臻、萧克，指出解决平西问题的关键是实行精兵简政，使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超过平西我区人口的3%，以减轻人民负担及财政粮食困难^⑨。4月中旬，毛泽东致电返延途经山东的刘少奇，委托他召开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以精兵简政^⑩。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敌后根据地日益增长的困难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会议委托王稼祥起草指示性的电报通知华北、华中各根据地^⑪。10月28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⑫。

毛泽东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的要求不是一刀切的，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并帮助分析特殊地区的特殊情

况。如对于华中,根据“因各党、政、军机关除个别的部分外,均系新建立,还有部分不但机关组织不庞大,而且有些至今尚未建立”的情况^⑧,毛泽东在8月4日致陈毅的电报中,一方面指出“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另一方面承认华中情形略有不同,“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很不久,也不必急于更改”^⑨。但总的认为华中的扩军计划总数还是太大了,所以,同其它地区一样要实行精兵简政的总方向是相同的。

抓住典型,对于搞得好的及时总结推广,以点带面。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并从这个好的经验中总结出精兵简政要同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要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要各敌后根据地仿效实行。但对搞得不够的地区也提出批评与改进意见。1943年8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晋察冀分局的电报,指出“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90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它能收公粮的90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8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3万,只留5万”,“如果明年再困难,再准备从5万中减一万”^⑩。晋察冀边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除吕正操部6000人西移,另从北岳区调4000人西移,共计1万人西移,其余2万在本地安插。保证了晋察冀边区度过了敌后抗战最困难的年月,并逐步从恢复进入再发展的时期。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中央机关到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到部队,从延安到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普遍的彻底的精兵

简政，精兵简政真正成为一个大举，一个运动。到1944年初大检查（点验）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和物资基础。

四、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

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中，针对边区第一次精简出现的问题指出，今天在边区精兵简政还没有行得通，但精兵简政一定要行得通，就要精简得其所。这就是说，在实行精兵简政的时候，必然会有一批人员被精简下去，做好编余人员的分流工作，使编余人员各得其所，这是精兵简政能否行得通的关键所在。

一般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干部不是说太多了，相反还觉不够，但为什么还要精兵简政，问题在于比例失调。如在某一地区生产人员与脱产人员比例失调，财政经济干部与政工干部比例失调，上级机关人员与下级机关人员比例失调。上下级机关人员比例失调在陕甘宁边区显得十分严重，人员都浮在上面，下级机关如县、区、乡一级却很缺乏干部。上级指示下来，由于下级干部缺乏或素质太低，往往贯彻不下去，或贯彻变型。这时候，有些上级机关就要派工作组或干部下去，帮助或代替下级机关贯彻指示。对于干部本身来讲也有问题，如有的干部并不适合在领导机关工作，基层工作更适合于他；有的干部更适宜从事生产技术工作，而偏又安排他搞政治工作。所以精兵简政必须对干部进行调整，使得人尽其材，材尽其用，人人各得其所。

从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的经验来看，当时对编余人员的

分流基本有4种：一是充实生产技术部门，减少脱产人员；二是充实下级县、区、乡级政权机关，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三是送入学校学习，提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保存干部；四是老弱病残的进行休养或动员返乡务农。调整干部、机关人员的工作，关系到单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很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含有重大革命意义”^③。在实行过程中，除了必要的思想工作外，还要教育领导干部乐于交出自己的部队，乐于被降级使用。当然在分配干部工作时，要仔细考虑，使新的工作尽量适合于干部的才能与志趣，同时要耐心说明新工作的情况和进行新工作的办法。对于干部提出的各种困难，则要尽一切可能设法解决。需要治疗的，帮助他解决医药问题；缺乏农具种籽的，则帮助他解决农具种籽。对于返乡务农的干部，当地的党组织要和他经常发生联系，并且分配他适当的工作，使他能够不断地进步。如陕甘宁边区柳林区的李善德，是一位“南梁时代”的老战士，曾任青化区委组织科长，现在回乡种田，并担任乡的党支部书记。过去他家里3口人吃饭，全靠政府拨粮，一年要给3石多粮食。现在种了14垧地，1个月里还能抽出10天时间工作，这样，家里不仅不要政府拨粮，而且生活也比以前好，当年可以打粮食9石，还能交1石公粮。过去干组织科长工作搞不好，现在当支书工作却很顺手。这个例子说明，干部调整适得其所，对公对私对群众对自己都是有益的。

毛泽东除了指示各级领导要做好编余人员的分流工作外，自己也经常利用不同场合做这方面的思想工作。如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和为高干会撰写的书面报告中两次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女同志，原来她的对象是作政治工作的，后来调到骡马大队当队长，因此这个女同志就不爱他了。毛泽东说，由于我们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

作的态度,以致其他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搞文学艺术,而不愿做经济工作。这个女同志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给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给一个政治干部,才算不辱没了她。毛泽东指出,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很错误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职业革命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我们的大批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和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那个女同志应以自己爱人为光荣,应买花生欢迎他。这种人应有恋爱的优先权,女同志应首先和他們去谈恋爱。我们要奖励这些同志去管理骡马大队,去生产。

由于精兵简政不仅是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政策,而且是为了准备争取抗战胜利的政策,所以如何积蓄力量,保存大量干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也是延安时期精兵简政分流编余人员做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高瞻远瞩,他指出当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迎接黎明的到来。所以毛泽东特别重视把编余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送进学校进行培训学习,要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这样做,“一面支持斗争,一面大批保存干部”^④。1942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⑤。1943年1月1日,在陕甘宁边区开始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我们必须有最大的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保留与学习。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过去;由

于根据地和军队的继续减缩,我们的干部,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②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指示后,在实施精兵简政过程中,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一部分干部抽调出来,部队是营级以上,地方政府是县级以上,其中不乏有造就的中、上级干部,有的还是领导骨干,但为了全局,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们,各根据地还是把他们抽调出来送到延安,他们的职务就地提拔下级干部来顶替。

在选送干部到延安来学习的问题上,彭德怀比较重视,毛泽东在1942年11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表扬。而晋察冀边区做得不够,毛泽东也去电提出了批评,让他们重选干部来延安学习。毛泽东对此问题抓得又紧又具体。1943年8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邓小平和太行分局各同志电,要他们照中央给晋察冀边区电的内容,“同样正确地处理此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400~500人送延安学习,提拔中下级上来代替他们的职位”^③。

抽调大批干部来延安学习,延安的教育工作势必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加重了延安的教育任务。中共中央结合整风运动,于1942年2月28日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为加强教育工作,在中央机构精兵简政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直接指导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

通过精兵精政,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延安保存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得在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能迅速从延安派出一万余干部去加强新区的开辟工作。保存和培养干部,不仅减轻了精兵简政中编余人员分流工作的负担,而且为抗日胜利

作好了充分组织准备,这确实是一个有远见的英明决策。

五、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进入第三次精简后,效果越来越显著。1943年2月9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林彪的电报中说:“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累资产值边币五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遇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万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④这说明边区已逐步渡过难关,渡过难关的办法很多,精兵简政就是其中主要办法之一。在精兵简政实行的后期,各根据地都开始了总结工作。

毛泽东对精兵简政工作的总结是和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其它多种政策联系起来考虑的,他没有专门就精兵简政而总结精兵简政。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虽然该决定主要是针对整风问题的一个总结,但对精兵简政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总结。决定指出:“凡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虑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⑤。回顾从精兵简政的提

出,到反复的实施过程,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正是循着毛泽东指出的这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走过来的。不过,毛泽东是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并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领导工作方法来加以总结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⑥。精兵简政政策在当时来讲,无疑也是为着战胜日寇,但是它在战胜日寇的各种政策中到底占有何等地位,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总结工作中逐步地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并讲话。在讲到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时,毛泽东指出: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这些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将各根据地执行的各项政策集中起来概括。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我党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强调:中央今后要继续在全国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⑧。同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中,再次提到六大政策,并说自我党实行这六大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⑨。但是,到了7月30日,毛泽东考虑到敌后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又改变了提法,他在致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负责同志的电中说:“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

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⑤这八大政策的次序不是随意安排的，我们从以后毛泽东对它们位置次序的调换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说明了该政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应该对它予以重视的程度。

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该指示最终对各根据地实行的各项政策给以全面的总结。指示说：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并指出“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必须将这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⑥至此，抗日战争时期克敌制胜的十大政策完全总结出来了。从六大政策，到八大政策，再到十大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也有个不断认识、不断总结的过程。在十大政策中，毛泽东把精兵简政放在仅次于对敌斗争的第二位置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精兵简政政策的。同时，从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观点来看，精兵简政确实涉及到制度、业务、机构、干部、民主集中制、领导作风、军民关系、三三制等，既有“一序列的组织问题”，又有“一序列的思想问题”，它在各项政策中具有触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总而言之，“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句话，是毛泽东对精兵简政作出的最好的总结。

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的第一次精兵简政，由于缺乏经验，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如机构虽然精简了，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尚未彻底

转变；如人员虽然精简了，但旧的一套，即“政”未“简”，党政没有分开，政府职能没有转变。这样，精兵简政的本质，尚未完全贯彻到最下层去。所以，时间一长，机构又会膨胀起来，人员又会多起来了。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1946年3月6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华东、晋冀鲁豫、华中三处分二期进行精简^⑨。通过这件事，不仅说明了精兵简政确实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而且也使我们感觉到了第一次精兵简政的缺点和不足。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7—810页。

③《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第7—8页。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502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70页。

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2月2日）。

⑦《毛主席在秋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9月25日）。

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7月30日）。

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11月8月27日）。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11月17日）。

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4页。

⑫1941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⑬1942年7月12日《解放日报》第一版。

⑭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先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后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就任副主席后就不再担任副议长职务了。

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

⑯1942年6月25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80 页。

⑯《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 年 11 月 21、23 日)。

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80 页。

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81—883 页。

⑲1942 年 2 月 20 日《解放日报》第一版。

⑳1943 年 5 月 31 日《解放日报》第二版。

㉑《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1942 年 4 月 13 日)。

㉒《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 年 11 月 21、23 日)。

㉓《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99 页。

㉔《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1942 年 11 月 21 日、23 日)。

㉕《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99 页。

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 年 8 月 22 日)。

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 年 8 月 29 日)。

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96 页。

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3 年 3 月 20 日)。

㉚《毛泽东生平纪事》第 71 页。

㉛《毛泽东生平纪事》第 72 页。

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 年 7 月 30 日)。

㉝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 年 10 月 28 日)。

㉞《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7 卷第 412 页。

㉟《文献和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1 页。

㊱中央书记处致晋察冀分局电(1943 年 8 月 5 日)。

㊲《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第 12 页。

㊳《文献和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3 页。

㊴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2 年 11 月 17 日)。

- ④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3 页。
- ④③中央书记处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电(1943 年 8 月 16 日)。
- ④④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1943 年 2 月 9 日)。
-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20 页。
- ④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80 页。
- ④⑦1943 年 7 月 3 日《解放日报》第一版。
- ④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3 年 7 月 13 日)。
- ④⑨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 年 7 月 13 日)。
- ⑤⑩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 年 7 月 30 日)。
- ⑤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101 页。
- ⑤⑫中央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电(1946 年 3 月 6 日)

下 编

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纪事

1939 年

2月2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出席大会并演讲。毛泽东指出：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功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同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

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6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指出为了克服财政经济日益增加的困难,“除积极加紧生产以谋自给外,目前特别要注意认真的严格的建立财政经济的制度,发扬艰苦作风厉行节省,以便坚持抗战,坚持长期艰苦奋斗”。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严格统一收支;严格建立预决算制度;建立会计审计制;为着调剂财政困难必须厉行节省,在厉行节省一条中规定:从6月份起一概暂停建筑,已经在5月份批准建筑者亦需节省,限期结束;各机关学校部队的油印刊物须分别经中宣部或总政治部批准后,始能出版,否则一律停止刊印;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等等。

9月25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讲话。他首先指出边区今年生产运动完成了3万石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已不算小事了。今天开秋收动员大会,大家再一努力,便可把已到嘴边的粮食,装进我们的肚子里面了。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以后边区吃粮困难问题,他说:我们这里4万人,这4万人吃的粮食一半是由老百姓帮助解决的,另一半还没有来源,怎么办呢?饿死吗?不成!解散吗?也不成!那末,只有走第三条路,自己动手来解决。

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和生产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现在华北的财政经济尚未统一，要做到统一须有统一的组织。中央财经部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要统一收支、计划等。现在要收集材料，准备在“七大”作一报告。陕甘宁边区必须增加农业税，否则边区不能存在。建议由李富春作报告，向民众说明这主要是为了保卫边区，为了供给军队与干部的给养，否则不能争取全国的胜利。商业税应规定一定的标准。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应当开展反腐化的斗争。

1940年

1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党过去的财经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发言中还阐述了财经工作中必要与可能、统一与独立、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生产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的意义等问题，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了，羊毛不能一次拔光了。动员人力也要如此。

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支持长期战争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工作是财政经济工作，各地应于电到一个月内，制定自己区域内本年全部财政经济计划。”“必须明白，没有认真的财政经济工作，我们将遇到绝大困难。”“一切在职人员，在不妨碍战斗，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学习

的条件下,均应参加生产运动,但不是平均主义的参加,而是按照具体状况参加适合其环境与能力的部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均须设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与总结全部财政经济工作,但在已有政府地区,须注意不要代替政府工作。”

2月3日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发出关于1939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的通报。通报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去年生产运动的成绩时指出:“四万在职人员的生产,平均保障了三个月粮食。警卫营,保卫营及政治教导队则保证了十个月或半年粮食”。在总结经验时指出:“去年边区的缺点是在职人员生产的单一性与平均主义,上面要求的是生产粮食一种,没有按照可能情况进行多样性的(如蔬菜家畜家禽手工业等)生产,这就是单一性(但各机关及部队养猪打柴做鞋袜仍是有成绩的),未估计各单位各部队的不同情况与不同环境而给以不同任务,在劳动力组织上未分别男女老弱,规定不同程度的劳动或不参加劳动,这就是平均主义。”

2月1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战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提出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三者合一,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成绩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怕任何困难,我们将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物质困难,完成党的军事、政治任务”。

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示指出:

“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派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送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3月6日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指示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政权建设上，应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但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8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节省人力物力坚持长期抗战的指示。指示说：“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必须对人力物力使用作长期打算，但现在各根据地内民众负担都是很大的”。为此，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提出以下要求：一、“全区域党政军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与全人口（不固定的游击区和敌占区不在内）之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三。”二、“军队人数（不脱离生产者不在内）与党政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之比例至多应为二比一即两个军人一个文人。”三、“军队内（军队之后方机关学校计算在内）应有六成枪支。”四、“经费开支亦按照上述比例。”指示还指出：“为长期坚持，必须统筹统支，党政军民学均须有严格的编制表，村一级粮

款不应独立,而应统筹,否则消耗浪费殊大。劳役必须大大减轻,并应建立严格的统一的动员制度,生产事业必须大大发展,否则有碍长期坚持。”“为了长期坚持斗争,必须与敌人争地盘,各部队必须向外推进,争取新区,发展游击区,缩小敌占区,必须与敌人缩小我区域企图作坚决的斗争,切忌把部队集中在中心区域,坐吃山空。”“在新区(如华中某些区域)在开始时人力财力物力或尚宽裕,但应注意老根据地之经验,不应浪费人力物力,注意积蓄人力财力,以长期打算为出发点,以减少将来的困难。”

1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关于根据地建立政权问题指示指出:这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根据华北经验,“一开始便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阶级的旧政权改造成成为几个革命阶级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防止过左过右的错误,以免缩小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关于财政经济问题,指示指出:“应注意一开始便作长期打算,节省人力物力,注意培养积蓄,认真的爱护根据地,反对临时性的抓一把的办法,要有比较固定的经常的政策,严格建立各级预决算制度,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开展合作运动,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反对贪污浪费。严格规定动员人力牲口的办法,禁止各部分随便自由募捐筹款,禁止一切浪费人力物力破坏生产的动员。对商人政策要正确,根据地内商业应有自由,对敌区的商业应有一定限度的统制。对于各种负担,应按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原则,但根据地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均应负担,不可把负担完全放在富有者身上,尤其是在我军刚占领新区时,不应向老百姓要的东西过多,而应同时实行许多善政,以使老百姓了解旧政权与新政权之区别”。

1941 年

5 月 1 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施政纲领一共二十一条，第五条：“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第八条：“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同日 《新中华报》刊登《边区中央局发布施政纲领》报道，报道说：“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不但表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并包举各方面的正确政策，例如军事政策，优抗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人员称，边区中央局此项施政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之时，实具备着伟大的政治意义，不仅陕甘宁边区可以施行，而且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以施行，即在全国范围内说来，亦必有甚大之影响云。”

5 月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指出“各机关部队均应将日常工作与生产劳动分开，实行部分

的兵工政策。”“各机关部队均需就驻地附近(留守兵团则在直罗镇,三五九旅及直属队则在南泥湾及延安附近)立即加紧夏耕工作,积极经营农业生产,多种秋菜,多饲牲畜,保证全年的全部蔬菜油料及肉食自给。”

6月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被电击死。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由19万石降为16万石。

7月24日 毛泽东同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谈边区财经问题,谈话至夜晚。毛泽东派车送谢觉哉回住处。7月26日上午,谢觉哉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深夜一点方回。

7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讨论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决定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济干部,其组织以精干为原则。决定中央各部委之组织,须按上述原则,重新编制,交任弼时同志主持的“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后,再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会议还讨论了延安学校合并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各办事处工作管理问题等。

8月6日 毛泽东致信谢觉哉：“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3000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3000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发言指出：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140万要供给8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是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

8月14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询问绥德、米脂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学生代表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对学生代表们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干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

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8月22日 毛泽东在复谢觉哉的信中指出:“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情都好办了。”“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多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多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成立中央调查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兼副局长。中央调查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海外4组。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国际、敌伪3个研究组。决定中央情报部隶属中央调查局。决定中央下列各部委的编制:宣传部:干部19人、事务员15人、马5匹。组织部:干部16人、事务员11人、马4匹。统一战线部:干部18人、事务员12人、马5匹。财政经济部:干部14人、事务员7人、马2匹。中央青委:干部10人、事务员11人、马4匹。

8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各区分担中央、军委一部分费用问题的指示。指示说：“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贫乏，党政军民脱离生产者共有8万人，占全人口百分之六以上，负担很大，边币跌价，中央及军委之物质保证难得维持，已经妨碍工作，许多干部忙于找饭找钱，不能集中力量帮助全国，而边区民众已渐不满，估计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八路军新四军打到大后方已经不可能了，因比过去准备突然事变的经费，希望能提出以作帮助中央及军委之用。”“中央及军委直属部分共2万人，粮草由陕甘宁边区负担，其他各种费用包括兵工通讯等等，每年共需1000万法币，由各根据地分别负担。”“陕甘宁边区之党政军共6万人完全由该边区负责供给。”“我们希望华北每年给我们600万元，华中200万元”。“以上方案预备明年1月1日起实行，因此希望今年内能送一部分钱给我们。”

9月2日 谢觉哉致信毛泽东，谈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半年来边区财经总结问题，信中说：“今年财经经验，大的有：一、财政上统筹统支即统一的原则，优裕时要这样，困难时更要这样。二、军费第一，战争时的政府应切实把这任务放在肩上。三、机关部队自己生产，补助经济不足，这是我们的特点。四、经济建设是充裕财政来源，而非拿来应财政之急。五、事要有速决的，也可以缓决的。在情况未全明了之先，各方意见未搜集与分析之先，最好不做决定，就是决定要留伸缩地步或不涉其细微。因为决定以后，须无条件执行。这是说明，决定政策，要极慎重。”

同日 谢觉哉又致信毛泽东：“前信关于财经经验，须补充一条‘发展与节约的问题’。半开化（封建）之世‘量入为出’，偏重节

约；文明（资本主义）之世，‘量出为入’偏重发展。我们要做的事很多而处在不好做事的边区，只能适用‘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适中的原则，即是说不能不尽量增加‘入’，以应付必需的‘出’；而又不能不尽量节省‘出’，以符合有限的‘入’。以发展为方针是对的，但未提节约是缺点；另一方面，在财政上讲‘发展’应是培税源，增收入。”

9月底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毛泽东希望人民多讲话多协助政府工作。他讲的“亲爱团结”四个字，给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冀中第四次政工会议作出指示，强调华北各根据地向上发展与扩大的阶段早已过去，现在的问题是长期坚持，保存现有实力，以待时机。“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工作不是如何扩大主力，而是如何加紧军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特别是民兵）的建立”。“政治工作组织机构，上面应缩小精干，下面应充实”。

11月6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出席者有正式参议员193人，候补参议员16人，政府首长及来宾共800余人。毛泽东、朱德莅会致词。毛泽东在致词中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他说：“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

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11月7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正、副议长,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讲了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他说:“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的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的这样清楚,说的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我希望诸位同志,大家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有些不对处,只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别人。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都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自然就人人相信,人人相爱了”。第二、是经济问题。他说:“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到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

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于经济必须要有整个的计划,一方面开发资源,一方面避免浪费,称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事,务使经济常有余力。我们看到,应当发展的事,就去发展,应当充实的事,就去充实,自然抗战建国都能成功。若是我们没有整个的计划,常常入不敷出,处在经济压迫之下,将来政府与人民交困,前途的危险,何堪设想?”

会议期间,李鼎铭等 11 位参议员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内容:“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此案被列为关于财政提案第六案(编号第八十一案)。后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提案,非常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了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的对症药。

同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示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1)主力军，(2)地方军，(3)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指示还指出精兵的比例：“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2与1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1与1之比为原则。在某些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

11月8日、9日 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边区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有道，用之得当。既要开源，也要节流，量入为出，也量出为人。人民的政府不能不依靠人民，人民的金钱不能有丝毫的浪费，一切事业的发展又不能因收入有限而停顿下来。”“政府的收入，除了依靠公营事业的收入外，主要的还是依靠税收。我们的税收原则是‘统一累进’，一方面规定纳税是全体人民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要使人民的负担公平合理。农业税——主要是公粮，前年征了5万多石，去年征了9万多石，今年准备征收20万石。”“我们已用尽一切方法减轻民众的负担，机关部队为了解决自己的经费，都进行生产。大家看到，军队除战斗训练外，还要屯田打盐，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人员，都参加了劳动。这是历史上所没有，其它地区所不能做到的。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经费，政府难为无米之炊，因而在用尽一切努力之后，仍不能不稍微增重边区人民的负担。大家晓得，一切抗战的国军，国民政府均发给必要的经费，八路军是国军之一部，他抵抗着敌寇在华半数的军队，而国民政府却停发了他们的经费。边区政府与八路军是不愿加重边区人民的负担的，他们过去曾以经费之一部，维持其留守部队，并且力求自力更生，借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但是在中央政府停发经费后，边区部队不得不由边区人民给以适当供给了。加以边区的封锁，今年边区人民的负担无疑的是比前数年加重了。政府与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为了抗战，为了保卫边区，保卫西北，大家不得不暂时勉为其难。”

11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

要有一个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副主席之职。

11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会议决定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由李富春负责，彭真为顾问，限3天写出边区1942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交政治局通过。决定从1942年1月起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6项。决定1942年动员运输公盐20万驮。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基本上同意李富春代表计划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边区明年财政经济计划，并补充要缩减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至三分之一等意见。委托计划起草委员会考虑补充的几点后，写成计划书提交17日之政治局会议通过。

11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计划起草委员会提出的1942年度边区财政经济计划。毛泽东发言说：财经方针须实行下列两大原则：1、精兵简政，调整人员。要求边区减1500人，军委系统减1500人，中央直属减1500人，留守兵团减1500人，但裁减人员须使之各得其所。2、扩大收支，发展生产。陈正人发言说：现在延安实际有72000人，现预算人数74500人。不识字的可解甲归田，知识分子要放下去，各机关团体可以合署办公。王稼祥发言说：如二局共有800人，只有200余人是真正工作的干部。彭真发言说：延安城附近共有40000人，但民众只有3000多人，因此机关中减人是必要的，但减人必须各得其所。康生发言说：这个预算计划的缺点是量入为出。我们的财政计划如果只是为了吃饭，那就当老百姓好了，主要问题就是为了办事。边区人员

74500人，可减为62500人。调整人员，有的要减，有些机关则要增加人员。有些干部有工作经验有功绩的不能解甲归田，要适当的安置。博古发言说：我赞成裁员简政，同时改善生活。否则都要病倒，有三分之一的人少脂肪，营养不足，这样不能提高工作效率。高岗、叶季壮也都提出：如能减掉10000人，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李富春当即代表计划起草委员会发言说：今天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是好的。裁减计划：边区系统裁减3000人，由陈正人负责；军委系统裁减2000人，由朱德负责；留守兵团裁减2500人，由肖劲光负责；中央直属裁减1500人，由李富春负责。以上共减少9000人。

同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审查通过边区政府提出的1942年度7900万元概算书。为保证此项概算不被突破，大会一致同意小组审查意见：“希望政府本开源节流之原则，实行精兵简政主张，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厉行节约，避免浪费，推广土产出口，争取出入口之平衡，平抑物价，调剂市场，提高边币，巩固金融，并须经常检讨工作，确实执行计划，以期达到收支平衡，不超出预算。”同时，决议由常驻议员组织小组委员会，负责设计并监督此项方案之彻底实行。

11月18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以165票多数，通过李鼎铭等提出的关于财政提案第六案（编号第八十一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此案审查意见是：“交政府速办。”

11月20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伯渠、李鼎铭等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22日，新当选的边区政府委员集体宣誓就职，并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委员分工问题。决定：刘景范任民政厅长，南汉宸任财政厅厅长，高自立任建设厅厅长，霍子乐任建设厅副厅长，柳湜任教育厅厅长，贺连城任教育厅副厅长。另外任命周文为政府秘书长，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高岗、王世泰分别为边区保安司令部正副司令，周兴为保安处处长。

11月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开了15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开得好。我觉得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说：党就是要集中人民意见，即无意见，便要腐化，便要没有前途。今后要切实做到上下一致，言行一致。“党外人士有批评自由，有写信，登报的权利。讲的不对也要讲，否则就不叫自由。”最后他指示要反对两种主义，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这两个毛病不弄掉，革命无论如何不能成功。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只顾自己，只图私利是不行的。”

11月2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实行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精兵简政”提案问题。在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副议长说明简政不是有些事不作，有些人不用，而是不要繁。有些系统、机构、人事，可简的都要简。精兵是要提高部队的质量，本寓兵於农的原则，加强自卫军。肖劲光司令员说明精兵办法，提高部队质量，加强战斗力，应使不担任战斗任务的部队屯田开荒生产。最后由林伯渠作简短总结。会议决定边府设立边区一级编整委员会，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构的

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委员会由刘景范、高自立、周文、周兴、南汉宸等5人组成，刘景范为召集人。确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拟于年底办妥，明年1月1日起实行。

11月30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小言论《简政不是‘减政’》。文章指出：“‘精兵简政’，是这次参议会里的有名提案。”“把应做的事减去些不做，把可以用的人裁去些不用，这不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待做的事正多；目前的人才也非常不够我们的需要。”“老话形容政府好，叫‘政简刑清’；形容不好，叫‘政繁赋重’，政简不是少做事，恰恰那时候是‘百废俱举’；政繁不是多做事，而是‘治丝益棼’。”“‘简政’有很多道理，不要误认只是‘减政’——当然，停止某些不应做的事裁去多余的人（冗员），也包括在内。”

12月初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二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会议明确精兵简政的方针是：一方面要紧缩组织机构，另一方面要加强领导，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改变政府组织头大脚小的现象。会议初步确定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如下（包括事务人员及附属机关人员）：边区政府秘书处由原250人减为115人；民政厅系统由原763人减为549人；财政厅系统由原1372人减为988人；教育厅系统由原3033人减为2965人；建设厅系统由原666人减为290人；高等法院系统由原390人减为305人；保安处系统由原1785人减为1494人，警卫部队、留守兵团、群众团体分别裁减500人。取消边府总务处，改设总务科，保安处各部改为科。另外扩大、健全边府法制室。会议还就分区以下各级机构精简问题进行了研究。

12月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各厅、院、处：确定边区一级各机关，应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训令指出：“‘精兵简政’为第二届参议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决议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是今后彻底实现‘五一施政纲领’的最大保证。”训令指出目前边区政府的各级机构有两大弱点：第一，是头重脚轻。第二，是正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精兵简政是补救以上两大弱点的主要方案。训令还指出：“凡调整出来的所有人员，一律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安置，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须体养的、须学习的、须参加生产事业的，都给以合理的解决。此外大部分人员，则用以加强县区乡级行政机构。”强调“以上调整，实含有重大革命意义，把更多的人深入到群众中去，面向群众，对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和提高，必然发生伟大的作用。”

12月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向各专署、县府发出指示信。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指示，提出本府委员会就职以后，首先实行的就是“精兵简政”。因为“精兵简政”是健全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的最有效的方案，是保证今后完全实行“五一施政纲领”和一切重要决议案的重要步骤。关于边区各级政府机构现在存在的主要毛病，指示指出：“第一，是头重脚轻的现象。在上级，人数过多，机关庞大；在下级，干部的数量和质量都比较差。上级人数过多，就有人浮于事的现象；下级干部配备得不强，一切命令和指示，总是多少要被打折扣，以致有许多很好的政策，在有些地方没有能够很好的贯彻。”“第二，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制度还没有完全正规化，还始终多少存在着‘老一套’的游击作风。”关于如何安排调整出来的人员，指示规定了几项原则：“（一）凡是有相当文化程度，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应该尽量往下移，以加强县、区、乡

的机构(县级干部亦应有一部分移到区乡级去);(二)凡是须继续培养、加以深造的干部,应该经过一定的系统,送来延安的学校学习;(三)凡是身体确有疾病,实在不可能工作或学习的干部,应该由原机关负责设法给以休息,使其恢复健康后,能够胜任愉快地为革命继续工作;(四)凡是身体强壮的杂务人员,应该送入建设厅所属各工厂,去参加生产事业,以发展边区生产;(五)凡是太落后的分子,以及太老弱的杂务人员,他们需要回家去务农的,应该帮助他们回去。以上的几项办法,就是要做到人人各得其所。”指示还指出在编整和处理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各级行政长官,务必要把这次‘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很切实的向所属人员传达,使大家了解‘精兵简政’不是消极的裁减人员,而是积极的为了提高行政效能,以发展边区的事业,以进一步的提高边区、巩固边区。‘简政’不是减少政事,而是要把所有工作做得简洁明确,能够很快地深入下层,深入群众。”“第二,往县级、区级、乡级移去的干部,应该认真而深刻地向他们解释,每个革命干部都应该面向群众,深入群众,在我们民主的政权里边,一个干部往下调,并不是‘降级’,相反的,应该认为作下层工作是最光荣的事业。”“第三,凡是需要转入生产部门的,应该对那些个别不愿意的,加以耐心的说服,使他了解发展边区生产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业,是改善自己生活、发展边区经济,加强抗战建国力量的事业。”“第四,对那些须送休养的,须送学习的,须回家去的,都要很好的处理,不容许马虎了事、草率了事,而应该看作是一件较重要的工作去完成它,使每个人的心里都感觉很为愉快,心安理得。”“第五,各级行政长官应该特别注意,在按照新原则编整了之后,应该根据‘简政’的原则,马上建立正规的工作制度,建立了,要随时检查,坚持下去,决不可口头在喊建立而实际上不建立起来,结果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12月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在交际处宴请延安市新闻、文艺界人士,发表谈话,阐述边区新的施政方针。林伯渠说: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一致通过的“五一施政纲领”,为边区今后施政的基本方针。为了坚决完成二届参议会的决议,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方面:首先要健全行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方法,实行精兵简政,克服过去行政机构头大脚小现象,建立区乡政府的经常工作,并号召与动员大批干部,面向群众,深入民间,加强下级政权的基层工作。李鼎铭就“精兵简政”政策的要义,作了专门阐述。他说:过去边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予以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一为“开源”,一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方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害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的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最后李鼎铭又引例汉高祖约法三章的故事,证明政简刑轻的好处,所以今天边区的行政也应简明,使老百姓易于了解和接收,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12月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精兵简政》的社论。社论指出:“精兵简政”的施政方针,“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即是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精兵简政”这一主张之所以被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今天全国所处的形势,是需要我们抗战更坚决、团结更巩固、进步更迅速的时代,是需要我们不仅善于发掘抗战力量,而且要求我们更恰当地更有效地使用抗战力量,更有计划地储蓄与培植抗战力量的时代。”“在敌后,敌我斗争已进入了

新的阶段。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方式，主要的已经从一口鲸吞或一举粉碎变而为分割封锁逐渐吞食的政策；扫荡目标已经不只是我军事力量和政权组织，且进而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栉篦梳头一样的来搜索、摧残我深入民间的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而在它计不得逞时，则索性实行它之所谓抢、烧、杀的‘三光政策’。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在军事编制上就不能不把正规军与地方军有恰当的比例：一方面使正规部队更能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更广泛地建立地方军与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以开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以反对敌寇对我之蚕食政策。而我们的政治机构，也不能不更加精干机动。这即是说：在敌后方，我们的兵，不能不精，我们的政，不能不简。”社论还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不同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在这里应该有它独特的内容和意义。在边区，精兵主义的执行，主要的应该是提高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在边区的简政，主要该做的是：“行政工作抓中心，行政机构求精干，建立正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在干部使用上，不仅要使人人有工作，而且要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财政工作上，不仅要取之合理，而且要用之得当。”“也可以说，简政的实行，就是建立正规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今天不是‘无为而治’的时代，‘简政’不是恢复于‘简陋’；也不是提倡粗枝大叶的‘简略’，这和加强研究调查工作、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一脉相通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不可平分力量，抓住中心一环’。”

12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府编整委员会连日工作紧张，本月20日左右即将编整完毕，届时有千余干部，深入民间开展下层工作。二届参议会后，边区新政府充满着新的工作作风与新的气象，‘精兵简政’政策的实行，将为今后边区的建设任务。”

12月8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实行精兵简政。据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后方留守部队除计划以3000人适当地转移到生产战线上（不脱离原部队），以解决明年度部分经费外，并积极设法提高部队质量，在军事政治方面力求完全正规化，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定明年为“部队文化运动年”，拟大量翻印科学课本及其他多种书籍，努力提高一般文化水平，特别注意加强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留守部队真正成为文武双全的精锐部队。

同日 边区高等法院草就编整计划。据雷经天院长谈：法院已草就整编计划及明年工作方针，其中心内容是：（一）健全各级司法组织，使之走向正规化。（二）调整干部，使之各尽其职，以提高工作效率。（三）加强干部法律知识，培养司法干部。（四）严格检查《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的具体实施，如债务，婚姻等条例均按二届参议会通过之办法实行，以健全革命秩序。（五）加强犯人教育，扩大原有劳动生产的各种组织，使犯人学习各种专门技术，且便于集中教育管理。（六）协助政府起草刑事诉讼等成文法，以建立正规司法制度。

12月9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到下层去！》的小言论：“前两天，边府林、李主席在招待新闻记者席上说：边区工作，犯着些‘头重脚轻’的毛病。什么叫做头重脚轻呢？人，拥塞在上边，没有好多事做，有的甚至觉得闲得难受；而下边堆满了事，找不到做事的人；这就叫做头重脚轻。政策，在上边决定的时候，有理论、有办法，面面周到，到下边变成简单的执行命令，甚至跟原有决定完全相反，这叫做头重脚轻。书籍、刊物、文化活动，在延安是应有尽有，甚至多的使人没时间看，没时间参加；而乡间却连一份群众报都看

不到。这也叫做头重脚轻。要更提高边区一步，必须医好头重脚轻的毛病。边区政府正准备把大批干部派到下层去，把政策、法令贯彻到下层去，我们更希望书籍、杂志、文化活动能够普及到下层去！医好头重脚轻的毛病，使我们边区站立得象金字塔一样稳！”

12月1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编整委员会公布拟定的编整计划：（一）边府各厅处原有工作干部千余人，现拟缩减三分之一。但有的机关则以工作需要，酌予增加。各厅处附属机关，亦酌缩减。缩编后人员总数将超过6300人。（二）专员公署、县工作人员18~23人，杂务人员8人；乙等专署工作人员18人，杂务人员8人；丙等专署就所在县县政府酌加数人，不另设独立机关。甲等县计戛阳、葭县、米脂、定边、绥德、延安、延川、清涧8县，工作人员28人至30人，杂务7人。乙等县计鄜县、靖边、安定、环县、曲子、新正、神府、镇原、合水、吴堡、淳耀、延长、安塞、志丹、延安市等15个县市，工作人员22人至26人，杂务7人。丙等县计新正、固临、甘泉、盐池、华池、赤水、宜耀等7个县一个行政区，工作人员19人至20人，杂务6人。区级计214区，内甲等区占十分之二，乙等区占十分之七，丙等区占十分之一，干部配备甲等区6人，乙等区7人（原材料如此——编者）、丙等区4人。以上各专署、县、区原有人数为4021人，将整编为3396人，计缩减625人。（三）警卫队亦将缩减500人，所有是项人员将全部转入工业机构。自卫军指导员1000人，原均脱离生产，此后均将参加农村生产。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原有1100人，将整编为600人，并决定今后群众团体的经费，以自筹为原则。预计边区一级的整编工作，在今年年底即可完全告成。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召开会议，宣布边府裁撤总务处、编整秘书处的决议。秘书处编整后，设主任秘书1人，监印1

人,秘书 9 人分管机要、通讯、对外宣传、各分区与直属县及民、财、教、建、司法等行政之研究;第一科设科长 1 人,科员 1 人,管理人事登记、任免、考核、交际。第二科设科长 1 人,科员 4 人,管理组织、统计、调查、研究。第三科设科长 1 人,下设科员 10 人,管理文书、油印、收发、校对、提案等事项。第四科设科长 1 人,下设科员 4 人,管理庶务、会计等项。视察室设视察员 6 人,专管巡视工作。以上人员连正副主席及法制室、民族事务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共为 105 人,较编整前减去 70 人。所有缩减的人员或分派各县区工作,或送学校学习、休养,或转入生产机关。原属秘书处领导下的交际处,编制上则仍旧不变。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吃不开》的小言论:“边区政府,为了实行精兵简政,军政民各机关团体的人员决定加以减缩,于是有人说‘唉!吃不开了!’为什么要实行精兵简政?为的是要我们的兵更能打仗,我们的政府更能办事。这就不能不把每一个人安置到最需要、最适当的岗位上,把每一文钱都使用到最急切、最重要的事业上。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我们所凭藉的物质、人才,又是这样短缺,如果连现有的人力、物力都不好好地配置、使用,那我们当真要吃不开了。精兵简政,是要人得其所,才尽其用,是要每个同志都在岗位上吃得开,是要我们全边区在抗战建国的各项事业上都吃得开。为什么一听到紧缩人员就叹气说吃不开呢?”

12 月 15 日 边区财政厅公布《陕甘宁边区财政实行统筹统支办法》,规定统筹统支的总方针是:发展边区国民经济,依靠全边区力量,完全实现自给自足;从发展国民经济中增加财政收入,保持预决算平衡,渡过 1942 年财政难关。为了实现这一方针,必须贯

彻政府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私人经济的政策,有计划地调整与充实公营经济;彻底调整政府冗员,提高工作效率,厉行节约。确定目前的方针是:采取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原则;在1942年实行初步地统筹统支,尔后逐步过渡到完全的统筹统支。

12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榨民财的恶棍。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地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在精兵简政政策实现之后,干部必有多余,同时为准备将来还应抽调干部,一并加以训练,除各根据地自己极端注意训练干部外,中央准备办一高级学校,训练几百个真正高级的干部。”“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视察团,到边区直属各县检查工作,指导简政。

12月中旬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对工业建设的领导,决定扩大建设厅工业局机构,人员编制由原20人增至35人。边区政府计划1942年运销食盐30万驮。为了加强运盐工作的领导,特于建设厅下设立运输管理局。

12月20日 边区民政厅编整工作,已调整完竣,直辖各科缩减36人,附属机关卫生处缩减20人,边区通讯站无大变动。民政厅原来共分5科及1秘书室,连杂务在内共计91人,现一科加管土地行政事宜,二科原来工作并入三科,五科改为二科,四科原来的保育工作划归卫生处负责,改管全厅生产诸事。以上除一二三科均减5人外,四科减为4人,杂务人员减为12人。民政厅整编后,除一部分缩减人员分别转入学校、生产机关或休养外,其余8人已组成民政厅视察团于19日赴陇东各地视察,该团此行任务:(一)健全陇东各县的民主建设,开展县乡各级参议会的工作;(二)传达政府精兵简政意义,并帮助各级政府迅速执行;(三)建立各县乡的行政制度;(四)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执行此次边区参议会的决议。必要时,或将指令各员参加当地工作,藉以充实下层行政的效能。

12月2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县区行政领导》。社论指出:边区政府在实行“精兵简政”声中,提出“加强县区行政领导”,号召大家面向区乡,彻底克服“头重脚轻”的现象。这在陕甘宁边区当前的行政工作中,确是非常切中时宜的主张。社论认为,加强对于县区行政的领导,主要就是帮助县区建立“三三制”

的问题。

12月22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编整工作业已完竣。计各科室缩减百分之三十三点八,保卫团缩减百分之十八,警政校缩减百分之四十四。各县的保安科及警卫队也都规定一概缩减三分之一,各区保安助理员完全裁撤,共计180余人。此次整编后,由于改部为科,在行政方面将更直接迅速,供给工作的统一办理,将使过去各单位终日忙于事务的作风完全改变,例如过去保安处做供给工作的是10人,保安团是12人,警政校是6人,现在统为第三科办理,只须13人,节省15人。过去警政校校长差不多用二分之一的时间化在供给工作方面的,今后亦可专心致力于教育。此外又因工作的需要,检查站增加4处,检查所增加3处,使能真正达到精兵简政的原意。

12月2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编整完成。财政厅原有工作干部64人,杂务32人,分设4科2室。整编后,除视察室仍为5人外,秘书室由15人减为9人,第一科由13人减为5人,第二科由16人减为12人,第三科由10人减为7人,第四科撤销。合计干部缩减为35人(厅长副厅长在内),杂务人员已由32人缩减为16人,平均缩减百分之五十。在工作的分配上,例如过去第一科下设总务、公产、生产三股,今虽公产股改为供给股,总务、生产二股亦均依旧存在,但在组织上除各股指定一人负总责外,全科5人仍分负三股的工作。其他科股的或并或裁,也均以工作的合理与精简为标准。在工作的制度上,该厅原已走上正轨的途径,例如收发、值日、行文、档案都已建立正规基础,所以在这次编整过程中,虽然减了一半的工作人员,但是毫无紊乱停滞现象,而工作更加紧凑,公

事处理也更迅速。他们认为过去的优点是干部的工作热情高,分工细而责任明确,缺点是少数干部没有办事经验,原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却要拖上两三天,因此显得劳逸不均。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所属建设厅,批准该厅在三边、陇东、关中、绥德等4分区再设交通运输管理分局;在新儿湾等8处设立转运栈。同时训令民政厅在编整中抽调编余干部39人充实到建设厅交通运输部门。

12月25日 陕甘宁边区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实行整编。决定县府所属一、二、三、四及秘书处所减1人,三科及推事处(原材料如此——编者)照旧,五科加1人,生产主任裁撤。生产事务归二科管理。杂务人员:勤务伙夫减去2人,通讯员减去3人。总计减去工作人员4人,杂务人员5人。所有编余人员将另行分配工作,杂务人员派送工厂学习。这是边区第一个县级政府实行“精兵简政”。

12月2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整编完成。建设厅共裁减干部及杂务人员45人。为加强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对原有组织加以调整。现厅内除秘书室外,共设3科(对外):一科管人事、庶务。二科管会计、审查、统计。三科管机关生产自给。6局(对外):农业局——领导边区整个农牧业,并兼理光华农场,将原来农牧科工作合并于农业局。工业局——指导边区整个工业,将原来工矿科与工业局合并。交通运输局——除领导交通运输,修筑公路等事宜外,并兼管水利工程。贸易局——领导进出口贸易和指导边区商业。合作指导局——领导边区生产消费合作事业,将原来生产和消费合作统一指导。林务局——管理护林及造林。此外

直接领导农业学校一处。整编结果,组织机构较前短小精干,更加灵活,人员亦少而精,现连杂务人员在内,仅留 295 人。所有编余人员,除个别因年老或有病休养外,学习者极少,大部分均分配至县区,加强下层各种经济建设工作。按各县实际情况,现仍需要大批有能力的经建人才。

12 月 28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发出关于 1942 年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坚决执行中央 12 月 13 日指示(1941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原件档案没有看到。——编者注),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令各县区促行简政。命令各县区,迅即推行“精兵简政”政策,进行编整,加强下层机构,使工作正规化。在编整之后,各级政府务须严格遵守编制,不得任意增加人员马匹,如因特殊原因必须增加时,须先行呈报,经上级批准后,始得酌予增加,否则即不准报销其增加人员的衣食等用费。预决算制度应严格执行,并每月将决算送呈边区审计处审核,审计处有权检查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

同日 边区高等法院编整完成。高等法院将原有人员缩减三分之一。该院行政部门原与生产部门统一,此次整编之后,即行分开。行政部门由政府按一般的供给实物及经费,生产部门则全须自给。行政部门除法庭看守所仍旧外,取消检察处,将书记室、总务科、生产科、秘书处,合并 in 办公室,分设 3 个科及秘书 2 人。第一科管理干部、典狱、材料、教育事项;第二科管理文牍、统计、缮校、

档案、收发、印刷事项；第三科管理会计、审计、事务、生产事项；秘书 2 人分管一切行政事务及审核各种报告案卷。至于劳动生产所，则划归生产部门。

同日 边区银行总分行已调整就绪，计总行工作人员现有 76 人，兼职者 8 人。分行及办事处合计现有 49 人，兼职者 1 人。连前总计 125 人，兼职者 9 人。

12 月 30 日 边区保安司令部为执行精兵政策，决定将全边区的保安部队，分期分区进行整训，以 3 个月为一期。为整训工作顺利完成，又决定 3 项补助办法，于明年即行开始：一、全部统筹统支；二、抽调 500 人转入生产战线；三、抽调百余军政干部来延安学习，以加强其现代的战术和技术能力，以及正规的领导管理工作。

12 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制定专署以下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编整方案，其机构设置如下：专署、正副专员下设秘书处、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建设处、粮食处、保安处；县政府、县长下设秘书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 5 个科（丙等县不设第五科）和保安科。

1942 年

1 月 1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对接管的边区盐务局（原由军委领导）实行精简改组，将该局原设立的秘书、会计、总务、生产等 4 个处分别改设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 4 个科，另设秘书室；将原附设的 4 个推销处合并为 3 个分局；人员编制由原 150 人

减为 64 人。

1 月 5 日 边区政府召开第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合署办公暂行办法》。确定边区政府设立合署办公厅,各厅、处、院并入合署办公(保安处、高等法院暂缓并入);合署办公后,政府办公厅下设总务处、交际处、调查研究室、法制室、参议室。并对合署办公后公文处理,档案保管等作了具体规定。第二天午后即开始实行合署办公。参加合署办公的有周兴秘书长、民政厅刘景范厅长、财政厅南汉宸厅长、教育厅柳湜厅长、建设厅高自立厅长等 10 余人。凡各厅处相互间文件,当时即用谈访、签条、公文转移簿等解决之。这样每件例行公文所需时间,节省三分之二,隔日即可发出,不但提高行政效率,也大为节省了纸张人力。

1 月 6 日 边区政府发布通令,为健全各级行政组织,加强区划的管理,依据人口、财力、自然环境及政治环境等条件与标准将分区至乡的各级行政区划分别规定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具体规定绥德、陇东专署为甲等专署,关中专署为乙等专署,三边专署为丙等专署。县级规定为:人口在 8 万以上者为甲等县;人口在 4 万以上者为乙等县;人口在 4 万以下者为丙等县。区公署等级:人口在 7000 以上者为甲等区;人口在 4000 以上者为乙等区;人口在 4000 以下者为丙等区。乡政府等级:甲等乡,人口至多不逾 1500 人,面积纵横不逾 10 里;乙等乡,人口至多不逾 1000,面积纵横不逾 20 里;丙等乡,人口至多不逾 1000,面积纵横不逾 30 里。并附发了各级行政组织人员名额编制表。关于各区政府人员的规定:甲等区:干部 5 人,事务人员 1 人,区长 1 人,助理员 3 人,保安助理员兼自卫军营长 1 人。乙等区:干部 4 人,事务人员 1 人,区长 1

人,助理员 2 人,保安助理员兼自卫军营长 1 人。丙等区:干部 3 人,事务人员 1 人,区长 1 人,助理员 1 人,保安助理员兼自卫军营长 1 人。每乡乡长 1 人。通令指出:上述各节,限文到 10 日内编制完竣,到期则按新编制预算办理。

1 月 8 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消灭浪费现象》。社论指出:“我们曾一再发出过节约的号召,因为我们今天处在战争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我们的敌人则是处心积虑征服世界,穷年累月竭尽一切力量,‘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帝国主义。我们之所谓节约,不仅只是要求我们人人刻苦奋发过所谓‘战时生活’,而且要求我们善于珍惜与运用我们所有的每一分人力、物资与钱财,真正做到‘一切为着战争’,我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在争取抗战胜利中最高度的发挥它的作用。”“我们提出‘精兵简政’的主张,我们强调工作正规化,我们规定了财政上统收统支的办法,做出了种种节省民力的方案,这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所有这些,可以说也就是一个大的节约方案。”

1 月 10 日 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聂荣臻、萧克,告知关于征调各根据地营级以上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问题,中央已有决定另行通知。延安精简以后办中央党校(内设军事班、军事干部只收营级以上)。抗大总校和二分校,均将营级以上学员及在职干部送延安。

1 月 12 日 边区政府召开第七次政务会议讨论决定:为加强对动员工作的统一领导,确定今后边区党政军民的一切动员工作一律经民政厅动员委员会。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已整编结束的民政

厅、建设厅、高等法院、保安处等单位内部机构的负责人选。

1月13日 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及后勤各部门,为响应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号召,在太北某地召开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到会者数百人,左权参谋长亲临报告“精兵简政”的意义及目前财政问题。会后各单位纷起成立整编委员会,造具名单、实行点验,以期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

同日 陕甘宁边区延长县召开主要干部会议,讨论实行“精兵简政”。会议认为,切实实行“精兵简政”不是简单的减少几个公务人员,重要的还在于健全制度,提高工作效率,消除工作上的游击习气。会议对各级编整工作决定:1月15日至3月底编整完成。首先从县级开始,2月5日前各种工作纲要一律完成,2月5日到15日,研究通过并交直属上级批准。区乡于3月5日前交县府讨论批准。

1月15日 晋察冀军区召开军分区首长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整编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确定精兵的基本精神是:明确划分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关系,紧缩上层机关,安置老弱病残,减少冗员,充实战斗部队,大量减少马匹以利行动,使部队短小精干,加速提高战斗能力,以积蓄与准备反攻力量。高干会议后,晋察冀军区在精兵方面做了6件事:第一,经中央同意,撤销“冀察热挺进军”。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原挺进军领导机关的人员,一部分并入军区机关,另一部分加强军分区的领导。第二,整编主力军,分别编为甲种团和乙种团。甲种团设3营9连,编制为2770人;乙种团设6连,编制为1080人。加强地方部队,分别编为地区队、县基干游击

队和区基干游击队。第三,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冀中军区及一部分部队,暂时撤出冀中地区,转移到北岳区。冀中区党委和行署级机关大部分随军西移。为此整编原冀中区部队,撤销原冀中军区后勤机关和所属各分区直属机关,干部充实到连队。这样转移到北岳区的5个团,整编后为1个甲种团4个乙种团。第四,取消团以下机关与部队的勤务员制度,勤务员工作由通讯员兼任。第五,担任部队生产任务的工人与部队总人数比例为1:100,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部队伙食的改善主要靠部队生产解决。第六,缩编骑兵团,改为骑步兵各一营,以适应反“扫荡”战斗的情况,同时达到节约财力畜力的目的。军队在精简整顿的同时,明确了军费供给关系;主力军由边区政府供给;地方部队分别由所在行署、专署和县政府供给。经过这次精兵,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军、地方军和军区指挥机关(包括抗大二分校)的总人数,由1942年3月的60440人减为1942年9月的52590人。除正常的减员与补充外,实际减少5000人。即减少百分之八点三。整编后军队的数目约占北岳区巩固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九,仍高于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二的比例。

同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根据精兵简政的政策精神发布整编命令。第一二九师于1942年上半年进行了“精兵简政”:第一、精简机构,充实战斗部队。规定旅以上直属队与战斗部队的比例为1:7,团直属队与团以下战斗人员为1:5;每班在9人以上,每连9个班,够4个连编成丙种团,够6个连编成两个营的乙种团,够9个连编为3个营的甲种团。经过整编,连队平均由50人增至100人。第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从正规军中调大批干部充实各军分区,使地方武装的战斗力的迅速获得提高。第三、送校学习和转业。整编中,仅太行、冀南军区即调出2000余名干部部分送延安、抗大或陆军

中学深造。对于年老体弱不适合部队工作的干部,凡有转业条件的即转业地方工作,仅太行、冀南军区即有 600 余人;丧失工作能力者则由政府妥善安置。还乡复员战士 6000 余名。第四、发展生产。进行农业、副业、商业、运输等生产。据不完全统计,仅师直、太行军区各军分区、新编第一旅、第三八五旅,在 1942 年中即生产价值 210 余万元的产品。第五、厉行节约。严格财物管理制度,爱护武器、弹药、粮食、被服;严格编制,不许超编一人;检举贪污分子,制止浪费行为。经过“精兵简政”,第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只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三以下。

1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指出由于延安与华北、华中的联系更加困难,陕甘宁及晋西北两个边区更加重要,特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上述两个边区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委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委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委任第一二零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撤销,并入联防军政治部。另以军委总政治部一部搬至杨家岭附近,组织很精小的总政治部,统管全军政治工作。

1 月 17 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小言论《合署办公》,文章指出合署办公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减少现在边府与各厅处间公文来往批阅、划行等时间上的浪费。也就是说,可以使政令更能迅速下达,真正做到“今日事,今日毕”。第二、可以免除现在边府以下各级呈报公文上的同样内容缮写多份、人力物力(纸张笔墨)的浪费。第三、可以防止敷衍、因循、遇难灰心的现象发生。也就是说,“合署

办公”能够在集体办公中遇难即释,真正收到相互监督、砥砺的效果。文章最后说,我们热望着这个办法,能够坚持实行,进一步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工作制度。

1月18日 边区高等法院根据边区编整委员会决定,除绥德分区和延安市已成立地方法院外,另在庆阳、新正均各成立一地方法院。并为加强第一审级的司法工作,人员组织已较前充实,编制达到8人。

1月19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太行区行政人员编制方案,其原则系根据中央“精兵简政”方针,内容有:(一)专署分别兼理和西县、平顺县、涉县、沙河县工作。(二)井陉县兼理涿鹿县工作,平南、平北兼理平顺县工作。(三)若干县政府兼理区公所工作。小县可以不设区。专署兼县者,不再兼区。游击县不兼区。(四)酌量归并现有之区,以减少原有区数百分之四十为标准。同时边府日内将再派干部深入所属各级政府进行编整工作,以期简政工作于短期内彻底完成。

同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第八次政务会,讨论延安市工作,决定划延安市为实验区,提高市府职权,各机关均须一律遵守市府法令。会议具体结论是:(一)提高市府职权,建立制度:在延安市机关,无论党、政、军、民、学都应遵守市府所定制度。凡与各机关有关的规程,市府应召集各方讨论,使各方明白后再决定施行。(二)延市作为边府的实验区,市府各科可与边府各厅处直接联系,由各厅处直接领导延安市,并决定由南汉宸厅长负责总领导。等等。

1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山东军政委员会:(一)山东纵

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胶东、鲁中、鲁南战略区均成立军区。鲁南编为一主力旅,拨归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指挥。(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军区)。

同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平西工作及领导问题的指示,指出(一)解决平西问题的关键是实行“精兵简政”,使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超过平西我区人口的百分之三,以减轻人民负担及财政粮食的困难。(二)应将第十分区划归冀中区,平西划归北岳区管理,平西区党委及挺进军番号取消,另在冀热边成立一短小精干的区党委和地方性军区,以管理平北冀东工作。(三)萧克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边区自1942年1月15日高干会议后,简政方面的工作也开始进行。简政的中心问题在于调整组织,调整干部,裁并机关,缩减冗员,以提高工作效能。简政前期,精简整顿的重点在专区、县和区级。简政的重点是北岳、平西和冀中区。但冀中区比较特殊,因在“五一大扫荡”后,大部分地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留在地方进行工作的脱产人员已大为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必要再进行精简了。北岳区、平西区在简政后规定了严格的人员编制。专署作为边府派出机构,除正副专员外,各科只设少数办事人员。县设县长、秘书和民政、财政、教育、实行4科。区级不是一级政权、区公所属于县府辅佐机关,精简时区公所减少了五分之一,区干部(区长及助理员)和通信员由原来的6至7人减少为3至4人。精简后,北岳区地方系统脱产人员由精简前的3.3万人减少为2.5万人,减少8000人,即减少四分之一。现有地方脱产人数由精简前占巩固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八六下降为百分之一点一,但仍超过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一的比例。北岳区第一次精兵简政,军队和地方的脱产人数,由精简前占巩固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二五下降到精简后的百分之三点五二,总量仍然高于中央规

定的百分之三的比例。)

1月22日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统筹统支。在此以前保安司令部已编整完成,仅参谋处与政治部便裁去6个科,人员也缩减一部分。

同日 延安举行欢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打了一个大胜仗。边区是个好地方,顽固分子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把你们从前方调回来,有事就打仗,没事就生产、学习。

1月25日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实行合署办公,各直属部门负责同志定时集议,处理待办事宜,以免辗转商酌,浪费时间。

1月26日 边区政府交际处编整完成。现设处长、秘书和联络、招待两科,共计干部12人,招待员4人,事务人员10人。取消总务科,减少人员5人。

1月28日 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彻底改组,在新的教育方针下,确定学制延长为两年,提高收生标准(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在延中共中央委员和各专门学者任各科教授(毛泽东主讲哲学、中国近代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范文澜、艾思奇、陈伯达也均分任各种专门课程的教授)。消息传出后,各地争相投报入校。入校学生连日进行编班考试,学习计划定于本年2月1日开始,至1944年2月1日结束。

1月30日 边区银行贸易局开始集体办公。贸易局由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兼局长,银行和贸易局双方集中在银行大楼上集体办公,双方的工作效率和配合,大为增进。

2月1日 延安民族学院实行“精兵简政”,在行政组织机构、工作人员配备、教育制度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调整。现有教职学员200余人。每班设主任教员1人,取消了指导员制度。按民族分区,新分蒙古、回族、西南民族(包括藏、夷、苗族等)及女生共4区。学制共分初、中、高三级(各为二年),并设研究部(不定期)。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区固林县召开第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整编。县政府留干部20人。减裁的干部,有的分配到区乡工作,有的入延安学校学习,有的去修养病体。县政府各科除人员减少外,五科与二科进行合并。为了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并提出了加强在职干部学习。

2月2日 边区政府教育厅整编完竣,所有任该厅各科科长及秘书主任,都予重新任命。

2月4日 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召开政务会议,总结整编工作。陇东分区的整编工作在边区民政厅视察团的协助下,已于日前完成。最近即将整编情况,总结后汇报边区备查。

2月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厅、处院发出命令,根据编整委员会的决议,编余干部能另行分配工作的,在阴历年年底以前安排完毕;需要学习的,于2月15日前分送完毕;需休养的,于3月

15 日前安置完毕。

2 月 9 日 边区政府发出命令,根据精简原则,对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匹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之马匹编制数额作了规定。

2 月 10 日 边区政府民政厅为使行政正规化和干部各得其所,特提出编整工作上的几个问题。关于行政组织,首先必须健全行政机构,建立正规制度,政府颁布的各级组织条例,必须讨论后遵照执行,并裁并虚设部门。如编整后工作繁重,必须增加人员名额,须事先呈准后方能任用。编余人员,如能造就区级以上的干部,可送民政厅转送行政学院学习,如有年龄较大或工作能力较差,又不愿脱离工作者,可送民政厅转送各生产部门。思想意识落后,坚决不愿工作者,可准其回家参加生产。对病员:成绩优良的干部,或对革命有劳绩的区级以上干部,身有疾病者,可介绍到民政厅转送休养所。如路途不便者,可在当地安置休养,其生活费用以一般工作人员待遇计算。自愿回家休养者亦可,各项费用一般的由自己负责,如家庭贫困者,政府应发动群众帮助解决。编余的杂务人员,如身强力壮者,经说服后送民政厅转送工厂参加生产。编整后必须注意调查研究,帮助下级,建立正规行政制度,纠正过去一把抓的工作方式。在注意事项中还规定:各级编整工作限 2 月底全部完成,如逾限期,则生活办公费不准报销。

2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一号),明确规定今后在实行“精兵简政”,部队缩编时,应抽调干部入校受训、实行干部轮训制度。

2月1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发出通知,规定凡边区一级在休养所医院休养的干部,菜费、粮食、津贴于每月初旬由各该机关造具预算、送交休养机关办理;此次编整编余干部之病员应送医院或干部休养所者,其预算由各该机关造就后,送交民政厅统一办理。民政厅为关心病员生活,特送病员每月菜金增加为2元。

2月1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小言论《开源节流》。文章指出:把今年的生产计划完成,首先把春耕运动办好,这是开源的主要源泉,很重要;不浪费一颗粮,一张纸,一支笔,及至一针一线,这就是节流的主要水闸,同样重要。前日报载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的节约办法上,有这么几句话:“除规定粮食节约外,并规定一个信封用四次,一张信纸用两次,旧笔换新笔……”等等。像这样仔细认真的节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提倡节约以来,注意实行的不少,不注意的也很多,特别是仔细严格执行的很差,距离“认真”执行,还有相当的距离。值此旧历元旦,愿大家今年努力“开源”,更愿大家认真“节流”。

2月1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谷谿的文章《从精兵简政中女干部的动态说起》。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女干部被整编的情况:以原有干部数量为基准,此次一般干部减缩率约为十分之四,女干部减缩率约为十分之六左右。这些被减缩的女干部,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较弱,不能胜任简政以后的新工作,或者不适合于新工作,而调到边府下级机关或边区各县各区去工作(约占被减缩女干部的十分之七)。另一部分女干部,或者因为过去一面工作,一面带孩子,或者因为怀

着已经达月的孩胎,此次把她们调到适当的保育场所或休养所去了,一俟孩子问题解决,再行恢复工作(约占被减缩女干部的十分之一)。其他,有少数是因为工作积极,有相当工作能力和发展前途,今天又无必要工作,而送到适当学校专门学习以求深造。还有少数因身体病弱,不能继续工作,而送至休养所去休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女干部,因为工作能力较强,适合于新工作,而提升和调遣的,如边府秘书处,新派了 9 位女干部,教育厅新添了 1 位,财政厅还提升了 1 位女股长。在边区妇联系统下,除边区级县级照旧不动外,区级女干部中,由于工作能力较差、身体病弱及孩子牵累等原因而将调动工作的,据初步估计,有 70 余位。这些干部,都将根据其具体条件,分别调至生产部门、保育机关去担任新的工作。

2 月 19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教育厅,为加强干部教育,增设干部教育科,专门负责干部教育的计划与指导。

2 月 20 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论精兵简政》。社论在简要总结“精兵简政”已在边区执行 3 个月的情况后,进一步就行政工作方面的“精兵简政”提出意见:第一,行政工作事权分工一定要明确,不必绕的弯子,不必经的手续,一定要免掉。过去许多事情,往往事权不统一,责任欠分明,形成一国三公,莫知谁从的现象。零星小事往往也必须机关最高首长批准,使领导同志变作了专管柴米油盐的“管家婆”,而没有时间去考虑全面的大的问题;同时,下级同志也就遇事推脱,不负责任,以致高级政务会议也往往变作了日常琐务的讨论,对于政策的掌握,全盘的领导,反而很少注意。这种现象如果不克服,就是怎样本领高的人,也不免要掉到

事务主义的泥坑里去。因此,确立明确的分工制度,划清政务与事务的职司,使得各有所司,各尽其责,乃是精兵简政里的第一个问题。第二,边区内任何工作部门,都感到人员不足,在人员使用上,就发生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有的是“大材小用”,也有的是“材不称职”。在使用机关,总以为:只要他能做一点事,就拚命的拉,拉住了就不放,并不管给他做的事是不是他的所长。一般的说,大家对于“用人唯才”的道理还把握不住,以致使许多人,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在一般工作人员中,也逐渐地养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以为横竖都是革命工作,何必多作选择。因此,轻视业务专长的学习,不肯在本身工作上求进步。本来的精兵,放错了岗位,普通的士兵,失却了求精的兴趣,这不但是人才使用上的浪费,而且是我们工作上的莫大损失。所以说,如何在使用干部上,做到人尽其力,才尽其用,就现有的干部,加以合理的调整,乃是实行精兵简政第二个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三,就是不急之务如何少办,不需之财如何节省,不需之人如何少用的问题。办养老院,是好事情,但是为了养活两个老人,开支 20 个人的预算,就太浪费了;把每个青年、每个妇女、每个工人都组织到青救、妇救、工会里来是应该的。但是,在没有工人或工人极少的县区,设立工会;一个千余人的乡,而群众团体林立,似乎亦太浪费。调查研究当然是好事,可是,如延安和绥德二县经常招待七八个考察团,实在是车水马龙,应接不暇。我们希望政府和民众团体在设立一个机关、办理一件事情、增添一个人员的时候,都首先考虑一下:“在此时此地它有无绝对的必要?”这一根本问题。要而不紧的事,宁可不办。第四,头重脚轻,上级命令不能下达,这已经是边区行政工作苦恼了几年,而始终没有圆满解决的问题。要下决心抽调强干有力的干部,到情况不同的三五个县政府里边做工作,详细考查并研究如何建立正规工作制度的问

题,实验出一个具体方案,给全边区做榜样。第五,我们工作效率太低了。今天是飞机和无线电的时代,而我们却是老牛步调在这里蹒跚着。对于时间,我们不知道爱惜,在工作中,缺乏计算的习惯。同在延安的两个机关,公文传递,可以迟到一个礼拜以上。同样的传递信件,边区通讯站总要比邮局迟几天。一个人,一天完成几件工作,没有算计和检查,一天之内,跑多少冤枉路,枉费多少时间,也满不在乎。无形中人力、时间上的浪费,实在达到吓人的程度。社论最后指出:“精兵简政,这一口号之所以提出,从某方面讲,全部意义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

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称:“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学校的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在实行半统筹半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边区三三制大得周围各地好评,区内则团结了各阶级。精兵简政方针正在各地实行。”“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同日,毛泽东还将此电发给刘少奇、彭德怀。

2月2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十二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边区高等法院 1942 年度工作计划大纲》,该大纲确定今后边区司法工作的方向主要是提高法治精神,切实执行法令,使人民真正获得法律保障,建立适合边区需要的工作制度,提高现有干部,培养司法工作人员。会议还通过两项决议案:(一)边区政府成立保健

委员会,专门管理干部的保健工作。(二)改组原归民政厅管理的动员委员会,由边区政府重新聘请中共西北局、中央管理局、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边区保安司令部及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人组成有权威的动员委员会。必要时由政府主席、副主席亲自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以保证动员工作的统一领导。

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政治局五大业务(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

3月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精兵简政在边区保卫团》的文章。文章叙述了保卫团经过整编,80名战士离队的情况。刚开始战士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经过解释和教育工作,思想统一了,一部分分配到工厂,愿意种地的由政府拨给土地,并一律发给退伍费60元。文章最后指出:精兵简政的贯彻,不是短时期的事,“把精兵简政贯彻到底!”这个口号现正在保卫团各连沸腾着。

3月5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政府秘书处再行调整。报道说:边府秘书处於“精兵简政”后,复感组织庞大,效率不高,顷又实行调整,将一二科取消,仅留文书、庶务两科,另外组织秘书室、视察室、调查统计室,并将10余位秘书分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司法5个小组,集中精力研究专门问题,整理材料,备主席及政务会之参考,避免过去代办各厅工作的现象。

3月6日 陕甘宁边区通讯站决定改编,今年将改为边区政府一级内部的通讯机关,除递送公文信件外,所有书报包裹等件,将由军邮办事处承寄。为加速延市信件的递送起见,决定在杨家岭、文化沟、新市场设立分站,并在附近各处设立信箱,此后延市的信件当天即可送到。中央通讯站将撤销。

3月11日 边区保安司令部工作团到达定边,整顿三边保安部队过去群众纪律松弛现象,取消头大脚小的组织制度,重新整编,减缩非战斗人员,不久将开始整训。

3月18日 边区政府召开第十五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通过《民政厅1942年度工作计划大纲》,确定本年度民政工作重点: (一)继续抓好民主建设,充实各级政权的“三三制”,健全参议会制度; (二)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必要时在全边区实行第二次精简,以真正达到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目的。

3月(20日前) 边区保卫团三连党支部,因消极反抗整编,受到党纪处分。保卫团于去年整编中决定编遣三连,三连支部会后没有很好地进行说服解释工作,以致发生党员与群众痛哭流涕,战士损坏用具,班里私自分被毯的现象。有的竟向连务会要求分连部所存物品,战士班长任意集会讨论分法,甚至阻挡团部接收。在这些行动中,党员曾起了主要作用,支部并未采取任何积极办法来制止这种行动。为此,中共西北局党务委员会决定分别给以三连党支部有关党员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

3月28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召开会议,确定今年征收救国公粮16万石,救国公草1600万斤,和去年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的数量比起来,公粮减收百分之二十,公草减收百分之四十。

3月 晋西北军区部队进行第一次精简,主力部队由40000人减至35000人。

4月4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一)有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在职的老干部,尤其是属于这类的中级和高级干部,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进行学习。对于文化学习决不能轻视,必须认真学习以提高文化水平。(二)文化水平很高,但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除一部分学习专门知识外,必须首先参加工作,或学习一个很短时间后即去工作,以便获得工作经验,不应该长期在学校中学习。(三)党龄虽长,但很少或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例如与党失去联系很久的干部),必须参加工作,尤其下层工作,以增补其工作经验之不足。(四)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害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调去参加下层工作,同时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适当干部去代替之。(五)机要部门及有专门技能或正在学习专门技能的干部,不应调动,并应使他们长期安心工作。(六)必须纠正以为党务工作才是党的工作,其它工作不是党的工作,或轻视党务以外其它工作的错误观点。一切党务、行政、军事、机要、经济、民运、文化及其他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革命工作。必须克服只愿做党务工作,不愿做经济技术或其它工作的倾向。

4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第一次政府委员会以来的政府工作，确定今后方针。秘书长周文代为宣读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各厅处负责人作补充报告。李鼎铭在发言中就“精兵简政”问题指出，“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了他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我受人民的委托，我当然替人民讲话，但今天正处在非常时期，不顾军政，则人民利益亦谈不到，为了兼顾军政民三方面，所以才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目的是提高军政质量，建立工作系统与工作秩序，消除紊乱现象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决不是裁减人员，更不是为了削弱力量”。李鼎铭还指出，边府整编委员会虽然做了些工作，但实际效果很小。整编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并当联合中央及留守兵团各系统共同进行，方可见效。

4月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二日，检讨政府3个月来的工作报告，热烈讨论“精兵简政”。刘景范发言说：政府在执行“精兵简政”一案时，没有根据各部门的工作性质和它的客观情形做出具体适当的决定，只是坐在窑洞里，凭主观想法，作出一般的规定，致使“精兵简政”一案，变成“削足适履”，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柳湜发言说：这一次会议应以“精兵简政”为讨论中心，减少吃闲饭的人员，裁并无所事事的机关。第二期“精兵简政”，在调整干部时，编整委员会要有绝对的指挥权，不容许本位主义的存在。同时主席及各厅处院长不必都集中在延安，可以分别到区乡各级，以两三个县做编整模范试验区，然后大刀阔斧的做去，使上下机构传达灵通，这样才能收到编整的效果。李鼎铭发言说：边区工作缺点的中心所在，是没有什么一定的系统和秩序。边府一级工

作的缺点，是一切命令尚欠慎重考虑，不估计这些命令到了老百姓中间，是否能够做到。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诚恳地接受。但纠正边区以下各级，就要厉行干部教育，使干部能执行指示，但如光是懂得指示，而工作的理解是主观的，工作的执行是怠慢的，则工作也不一定能够做好。现在干部中不怕任何困难，以工作做好为目的的，恐怕百无八九。

4月8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日。会议继续讨论政府工作，讨论中心仍为“精兵简政”问题。到会委员一致指出“精兵简政”在过去三个月内，未能充分贯彻。柳湜发言说：边区行政工作中今天的缺点乃是：一、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但如何在地广人稀、交通困难、文化落后的这些具体条件下建立工作机构与工作制度却很少研究；二、不能建立正规的制度；三、许多干部工作作风，仍旧是老一套，未能彻底转变；四、因此发生党政不分、事权不一的种种现象。解决办法是：要进行工作大检查，组织扩大的整编委员会，经过详密研究，提出具体计划，贯彻“精兵简政”。政府人员应到下边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以加强县以下行政工作的机动性。周文宣读安塞县邵县长的来信，说明工作机构及工作制度亟待调整，因为今天自边府至县府领导同志大都很少有时间考虑问题。高崇山发言说：政府目前的工作，不足是老百姓说繁，干部中也都忙得透不过气来。谢觉哉发言说：由于过去日夜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所以行政工作经验还非常不够。他同意边区各部门来一次大检查，希望政府彻底贯彻“精兵简政”政策。林伯渠发言说：在新政权建设途中，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暴露缺点。但同时我们对克服缺点要有信心。他认为以后要完成安定民生、发展经济、健全民主、加强自卫军等项具体任务，关键就在于认真地执行“精兵

简政”。李鼎铭发言说,搞好下一步“精兵简政”,要邀请党、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整编委员会,统一整编。

4月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通过要案27件,中心问题是完成“精兵简政”,加强干部教育。“精兵简政”一案中提出4点:一、加强下级,提高县、区、乡政府的质量,上级人员往下移;二、以半年为期,做出比较详细的计划,把各级政府机构再加以更完善的调整;三、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团、调查团等等;四、由动员委员会切实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动员,必要的动员也要很好地去调整,使人民真正感到“政简”。但要能够真正做到“兵精政简”,出席会议的诸委员一致指出:端赖干部教育做得如何。边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的决议》指出:边区工作的转变还只是开始,政府工作的缺点还很多。“精兵简政”还没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因此,在组织机构上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还没有很适当的调整,工作制度尚未正规,政令尚繁而又有些不切合实际情形;在工作联系上,是上级领导不够具体,检查不够深入,下面是不完全了解政策法令,有些工作方式是与指示相反的一套,形成了上下不通气和工作脱节疲塌的现象;在负担问题上,是只顾完成任务,对了解具体情况不够,也没有做到公平合理;在下级干部中仍有些耍私情,拖工作的现象,一般的需要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与研究性。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而进一步的实施“精兵简政”则是转变工作的中心关键。因此“精兵简政”应走入第二阶段,为了要在边区全面地彻底地进行这一工作,政府特决定邀请党与军队方面共同组织扩大的编整委员会,加强其职权,于3个月内详细研究出具体方案,提交下届政府委员会讨论执行。同时要抓紧干部教育中业务教育,因为只有边区以及县区乡在职干部的水平提

高,懂得自己的工作,才有可能把工作改进。另一方面,要改变干部配备的头重脚轻的现象,边区一级的干部,要大量地分配下去,负责同志也应经常出巡,帮助下级。至于其它许多弱点,政府均应以最大决心来一纠正。在各种政策实施上,领导方式上、机构组织上应于最近期间进行深入的检查,以为纠正的准备。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贯彻精兵简政》。社论指出:“自从去年12月初我党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以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虽已开始执行,并已获得一些初步成绩,但一般地说,这一重要指示还没有引起应有的认识,还没有普遍实施和认真贯彻。在有些地区,上级机关制定精兵简政的计划,甚至派员至下级机关督促调整,但是因为下级机关人员未曾了解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不能有效地执行,甚至以客观环境困难等为理由,请求暂缓执行。至于由下级机关自动提出本部门精兵简政的办法的例子,更是非常之少。有些地区根本尚未开始,有些地区还在扩大部队添设机关学校。”“假若下级机关不自觉地推行精兵简政,那末上级所定的一般计划决难真正贯彻。因为只有下级机关的人员,才能熟知自己部门的每一个角落,哪些可以裁减,哪些可以合并,只有他们踊跃建议,才能使上级机关的计划在各方面具体化和普遍地实施起来,而不致有一纸空文,无补于事的毛病。所以更深入地反复解释精兵的精义,实在是必要的。”“领导机关不但要从上而下地提倡精兵简政,而且要采取各种具体办法,来使下级机关的人员能够真正明白精兵简政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在这一点上,特别可以引用最近反扫荡战争中活泼生动的例子和大家自身的经验,来作说明的材料。这样才能启发下级机关的人员的自动性,自下而上地充实精兵简政的方针,并普遍地见诸实行。”社论还指出,“精兵简政”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如“第一,今天不十分必要的机关忍痛取消;第二,同样

性质的机关,或者做同样工作的机关可以并合;第三,庞大的机关可以减缩。经过这样的步骤,干部人员必有多余,应当予以调整,妥为安置,或则回到生产岗位,或则调往干部太形缺乏的地方,或则送入学校,为抗战建国的艰巨事业,训练更多的人材。”“最后要贯彻精兵简政,决不应畏首畏尾,顾忌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内缩小了工作的范围。中心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力量源泉是人民,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亦是人民。要开导这个源泉,要巩固这个基础,其关键就在于精兵简政。”

4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于下星期一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中,通知目前时局趋势和“精兵简政”紧缩机关人员的方针。关于实施“精兵简政”紧缩闲员的问题,会议决定以任弼时、王稼祥、陈云、李富春、叶剑英、高岗、谢觉哉、肖劲光、贺龙、王震10同志组成总的裁减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按中央直属、军委直属及边区3个系统组织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情况,分别提出“裁员”、“减员”与“重复机关合并”的具体方案,并需研究如何使裁减并的人员各得其所。

4月13日 根据11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和“精兵简政”的报告。毛泽东指出: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敌人的“扫荡”政策、“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把我们的地方缩小。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在敌后根据地,这个问题更要注意。因为根据地要缩小,要准备没有饭吃。怎么样准备,就是“精兵简政”。有无本领,

就看在困难的时候,能否向前,顺利发展的时候的本领,不算真本领,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才可以看出真本领。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我们要尽可能讲清楚,事实上要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精兵简政”就是克服困难。“精兵简政”这个政策在边区与敌后方各个根据地都在实行,有些是在实现了,但有些地区如华中,工作发展才两年,它不能同华北各根据地一样。现在简政要得其所,今天在边区,“精兵简政”还没有行得通,“精兵精政”一定要行得通,就要简政得其所。中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要考虑如何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如何得其所,同时还要与检查工作结合起来。有些同志说,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失败了,我说是小的胜利,大的失败,你说一点也没有胜利那不见得。现在就有 16000 人没有领粮食了,但听说人却是一个也没有减,从前 16000 人领粮食,是各机关冒空名领的,现在没有冒领的了,但对原来的人却一概未动,这就叫做失败。现在要真正的“精兵简政”,说明不精简为什么不好,如何“精兵简政”。中央已成立了一个总的委员会,各根据地可成立分的委员会,中央这个总的委员会发布命令,各地方就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精兵简政”要党政军三方面配合去做,要提倡统一,要研究怎样搞得合理一些。

4 月 15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执行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决议案发布(战字第二八四号)命令,命令边区各级政府依照决议,就各该职掌所属范围,分别执行,务期迅速具体,不得延误为要。命令同时公布了 4 月 10 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案》。议决案案由是:为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以更加加强行

政干部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理由是:自从边区在去年12月改组以后,即坚决执行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精兵简政”案,各级政府都进行编整,但是仔细检查起来,此次编整,只算做了“精兵简政”的最初步的工作,只是做到“编”,还未做到切实的“整”,机构还未臻完善,人员也还未达到充分合理的调剂,下级政府的质量也还未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工作人员对于“精简”的意义,还未普遍地深刻地了解,工作关系还有许多地方感到繁琐,政令的推行还感到某些繁杂,公文还太多,工作团、调查团之类还太多,下级政府及人民都还感到许多不便,因此要贯彻“精兵简政”,还得更进一步实施编整的必要。办法和要求是:一、要加强下级,提高县、区、乡政府的质量,应将上级人员切实往下移。二、以半年为期,作出较详细计划,把各级政府机构再加以更完善的调整。三、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团、调查团等,此事应由政府适当地调查。四、由动员委员会切实负责,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动员,必要的动员亦须加以很好地调整,使人民真正感到“政简”。最后决议是:函请中共中央、西北局、军委共同组织扩大的编整委员会,三个月作为调查研究,制出方案期间,后三个月即进行有计划的编整。

4月1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文章《谈精兵简政》。文章指出:“精兵简政”的政策是我们目前渡过难关的须坚决执行的办法。可是,党的这种政策宣布以后,各地执行的非常之差,部队仍想扩充,单位多而不充实,机关仍非常庞大,人多而不作事。比如以执行的较好的陕甘宁边区来说:只取消了乡自卫队指导员(其实严格地说是恢复支部书记不脱离生产,还不能说是裁员),其它取缔了一些浮额。敌后各根据地今天环境要比陕甘宁困难,那是更值得注意要加倍努

力去执行的！决不要以为今天“还过得去”而不把眼光放远一点。自然将军打仗总爱兵多，机关作事总爱人多，但今天确不是爱“多”，而是爱“精”的时候。文章还指出：为彻底实行“精兵简政”，除加深对这一政策的认识，防止本位主义，不识大体，只看局部，不顾全局的障碍外，似应采取下列有效办法：一、停与缩：部队一般应停止扩大，凡一切不十分需要的工作应停止进行，机关应停止设立，大的工作范围与计划应尽量缩成为小的范围与小的计划。二、裁与减：已有的部队还要有计划的决心去裁掉老弱的，充实编制，已有的机关还应在讲求工作制度与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上，把所有可要可不要的工作人员完全减去，以做到有一个人便能做一份足够的工作，机关少了，工作倒反紧张起来，这在前方战争环境，尤为重要。三、撤与并：敌后根据地光是上述两项还不够，还应切实把所有的工作部门学校机关等工作任务弄清楚。何者在今天确有价值有存在之必要，何者没有，放手地进行撤消与合并，以做到都是好的制造厂而不是“清官衙门”。至于部队今天在敌后根据地的，也还可以硬从正规部队中抽出多少转化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实行寓兵于农的办法，这样，表面上部队是减少，实际上则仍存在。

4月中旬 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一）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3个机关由万人减去3500人。（三）山东纵队一旅归一一五师建制。此时，山东党员11万人，军队共10万人。根据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800余万。

4月20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在民政厅召开的专署、县府一科科长联席会议上报告“精兵简政”问题：（一）关于“精兵简政”意义。总的方向为支持长期抗战，须使人力物力调整得当，克服困难，争取胜利。（二）关于“精兵简政”的认识。精兵并非只在减少几个兵，而是要淘汰老弱残废，提高军队质量，加强教育，使每一个兵都很精干。简政不是减低政府力量，而是要加强政府工作，提高政府力量，把干部适当地加以调整，使每人都站到适当工作岗位上。（三）关于各级如何执行“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应将自卫军、保安队加强训练，视各区实际情形定出计划进行。简政方面，在干部人员的配备上，要适合今天的情况，彻底纠正头大脚小的毛病，无大作用的机关即予合并取消；政令要简，要使下面能了解，计划要能行得通，“条文主义”，“朝令夕改”，以及政令繁复等现象，一定要改正。领导制度要有中心，有计划，有检查，切实走上正规化。

4月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通知指出：“精兵简政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中央为总结并继续研究精兵简政问题，望各根据地将执行的经验教训电告。”通知还列出须汇报的材料题纲：一、关于节省与积蓄民力方面。如根据地现时我统治下的有多少人口（必须是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出负担的，对于游击区只能纳部分负担者须注明）？现时脱离生产的人数，是否符合中央百分之三（军二党政民一）的规定。如果超过了须说明原因，并说明在人民负担上是否有困难。计算一个脱离生产者，一年要多少

费用(要用实物与钱同时估计),要多少人口才能养活一个脱离生产者?现时人民负担占其全部收入百分之几?并指出富有者负担最高达到的百分数,及贫农负担最低的百分数。同时还要计算出整个边区各种负担(包括财力、物力等)占该区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百分之几?敌占区友军区与我根据地的人民负担孰轻孰重(应举出一般估计与具体数字)?人民对此有何反映?估计敌人以后扫荡封锁更残酷,地区还可能缩小的情况下,在财政经济上有些什么办法可以长期坚持?二、关于组织精干与增强效率方面。如党政民各级原有脱离生产人数及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后新编制人数(应将干部与杂务人员及战士分开写)。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机关庞大,头重脚轻,上下隔阂,政令不能贯彻现象。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组织太多,会议太多,干部疲劳、群众厌烦现象。现在党政民各种组织是否还有重叠可以合并的机关,还有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还有分工不合理,遇事多绕圈子,效率迟慢的现象。是否有后方庞大,行动笨滞,敌人扫荡易受损失现象。正规军与地方军是否已经划分?两者间的比例如何?民兵与自卫队占全人口的百分比及其已起作用。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召开一科长联席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边区参议员霍祝三说:“在‘精兵简政’中,应加强下级干部,上级有能力的干部应派到下面去。政府中间赏罚要明。加强自卫军及农村岗哨。并在农村中设立识字组,提高文化。”鄜县一科长李正荣说:“乡政府下面的委员会可以不要,政令必须简明,各部分工要明确。”延安县一科长罗先彪说:“乡级干部不能做工作报告,区上又没有秘书,在这次编整中,应好好调整。”绥德分区一科长倪伟说:“专署是代表边府承上启下的机关,兼管理县的仍设科,不兼的则财政司法可以不要,有3个秘书几个文书便够了。”固临

县一科长冯俊德说：“要加强‘精兵简政’的宣传，专员公署设一个秘书室，视察研究室，最多共10人便够了。目下县级人员可以不必裁减，特殊者例外。县级二、五科应该合并，县政府秘书职权要提高，乡政府设乡长一人，秘书一人，教育、锄奸、仲裁、优待、自卫军连长都要。”“群众团体人员要减少。政府工作要有严格制度，并将各行政机构联系起来，要有统一领导。”其他提出有：如改善司法工作人员待遇；边府各厅应加强工作；秘书处着重于法令研究，以及解决日常事务；视察室碰到县里出大事，要派人下乡巡视；司法工作判决后还未能完全遵照执行的现象应当克服等等。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十八次政务会议，讨论决定扩大边区政府系统的编整委员会，除原5人外，增加林伯渠、李鼎铭、柳湜、雷经天4人，林伯渠、李鼎铭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4月26日 新华社晋冀鲁豫电讯：晋冀鲁豫边区简政工作大部完成。边府顷特令所属各机关团体，即日造报简政后现有人员马匹表册，逐级呈送，藉以彻底了解各机关团体简政后的具体情况，防止埋伏，掌握预算，而备点验。该项工作限5月20日以前完成。边府同时规定，以后凡人员之增添，马匹之损失补充，必须即时呈报备案，如过时不报者，财厅不予批准预决算。

4月27日、28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幸之的文章《谈谈合署办公》。文章指出：合署办公，是实行“精兵简政”的重要关键，“它可以使行政上‘头重脚轻’的现象减少，使下级县区乡级行政力量加强，使整个的行政效率提高。”作者在附记中说：“这篇东西，是在今年一月边府初实行合署办公时写的。在这次边府第二次委员会决定再度加强精兵简政的时候，我认为边区政府各厅处彻底实

行合署办公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愿不揣简陋的把这篇东西拿出来发表,以供大家研究讨论。”

4月28日 边区成立总编整委员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经边区政府邀请,边区总编整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李富春、西北局陈正人、中央军委叶剑英、八路军留守兵团肖劲光、边区参议会谢觉哉及边区政府林伯渠、李鼎铭7人组成。林伯渠、李鼎铭主持会务,周文为秘书。会议决定,在总会领导下,各系统设立分会,在1个月以内各分会须提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

4月29日 边区民政厅召开的一科长联席会议闭幕。刘景范在会上报告“精兵简政”讨论的总结,并给以解释。决定在乡政府设一文书,加强行政村主任工作,提高乡政府委员会权利,各种委员会有的可以存在,有的需合并或取消。区政府组织机构,仍维持现状,分甲乙两等便够了,如区不要各种委员会可设临时仲裁委员会。县组织应加强秘书室工作,带全面性的指示,边府可直接交县、专署督促完成任务;带地方性的,专署提交边府批准后,有权决定。建立县的严格分工,县委员会每两月一次,政务会每周一次,区长会议两月一次,乡长会议一年一次。会议时间要短,规定请假制度,按时作息,按时学习。

5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决定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5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决定,指出:“凡直属联防军司令部指挥的各

兵团,从5月21日起,即与联防司令部直接发生关系并接受其命令。”“华中华北各战略区,望与联防司令员相互通报,确保联络。”

5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十九次政务会议,讨论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编整工作。会议决定:(一)以刘景范、柳湜、高自立等3人组成编整委员会,刘景范为召集人,负责对各机关编整计划方案进行审查;(二)编整结束后,审计处取消,将其工作归并到财政厅;(三)编余人员的安置由民政厅负责。

5月8日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常驻会召开第六次会议,林伯渠报告1941年以来5个月的政府工作。回顾了5个月来边区的政治环境及边区政府在精兵简政、民主建设、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作的工作,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为:一是搞好第二次编整,二是加强农业建设,三是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四是整顿学校教育,五是加强自卫军的训练。

5月15日至17日 边区政府召开直属县市长、自卫军政治委员联席会议,根据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和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六次会议精神,主要讨论进一步贯彻“精兵简政”方针问题。会议期间,林伯渠、李鼎铭报告“精兵简政”意义,谢觉哉代表参议会提出,希望政府彻底贯彻“精兵简政”,并强调:一切行政工作必须懂得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才能真正行得通。会议具体决定了派遣大批干部加强县区行政机构的原则和各县立即着手重新整顿各县自卫军的办法。会议在讨论“精兵简政”工作时,大家发言比较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一、在行政机构方面,县政府下各种委员会有与各

科职权相重者,应否取消?二科(财政)与五科(粮食)应否合并?秘书室与司法工作如何加强?各科人数配备等问题如何确定?二、在干部问题上都同意缩减边区一级人员配备,加强县、区,以彻底纠正“头重脚轻”之弊,并讨论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结合问题,确定每一个区要保证有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三、关于工作制度方面,确定原有好的制度要继续发扬,目前新建的制度应努力使它健全起来。四、更进一步密切上下联系,巩固党政军民关系,使群众团体能配合政府进行工作,这是增强工作效能的关键。以上问题会议未做最后结论,决议交由边府编整委员会研究审查后,再做正式决定。

5月1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陈海阔、德风的文章《增强下级政府的工作效能》。文章说:“精兵简政”并不就是减少开支和裁员,而是因为“和尚多了没水吃”,所以需要“兵精”;因为“官敝民烦”,所以需要“政简”,问题是怎样“精法”和怎样“简法”。文章提出要增强下级政府的工作效能,应该做到:第一、化繁为简,加强工作效率;第二、经常工作与临时中心工作的配合;第三、上级有计划地领导与慎重地发出政令;第四、提高区乡干部工作责任心。

5月1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二十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政府各机关第二次编整方案。会议确定各部门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和事务人员)编制为:秘书处、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交际处共89人,较前减少50人;民政厅(含附属之卫生处、招待所)63人,较前减少20人;财政厅56人,较前减少5人;粮食局36人,较前减少24人;税务局15人,较前减少14人;禁烟督查处16人;教育厅44人,较前减少9人;建设厅撤销所设各局,编制95

人,较前减少 103 人;贸易局划归边区银行领导;裁并审计处,其工作划归财政厅。关于编余干部的处理,会议决定以百分之八十派往县区为原则。

5 月 20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决定动员边区一级机关编余干部 200 余名到县区工作,百分之八十到区上,百分之二十到县上。林伯渠在会上讲话,进一步阐明“精兵简政”的目的与意义,要求即将到县区工作的干部学好整风文件,下去要当小学生,不当“钦差大臣”;要注意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民政厅唐副厅长在会议现场告诉《解放日报》记者说:这次分派干部到县区去工作,是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纠正头重脚轻的具体步骤。目前下级行政机关工作中,以上代下的毛病相当严重,各种工作团下乡后,往往形成了下级依靠工作团的现象,大大影响了下级的责任心和正规工作制度的建立。在第一次编整时,有人认为“精兵简政”是单纯的减人,因而下级有些机关人员是减了,但是质量并未提高。所以缩减边区一级工作人员,加强下层行政机构、实在是目前很切要的工作。这次派出的干部都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实为县区行政工作的一批生力军。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到县区去》。社论指出:“边区行政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头重脚轻,上下呼应不够灵活,政府的政策法令,往往不能正确无误地贯彻到底,原因主要是:区乡干部一般的文化水准太低。治病之道乃在于选派大批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到下边去,领导学习,帮助工作,贯彻政令,加强下级政府工作中的灵活性、机动性。而上级领导机关的人员则无妨减少,这是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共同意见,这是‘精兵简政’的一个主要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要选派大批同志到县区去工作的主要理

由。”

5月21日 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华中执行“精兵简政”指示的情况。报告说:去冬得到关于精兵简政指示后,各师战略单位即开始讨论。今春,华中局扩大会又根据“精兵简政”原则及军委关于根据地军事建设指示作具体讨论和部署。三月底各单位代表返部,到四月底各地区军政党扩大会召开,现在刚刚才开完,执行情形尚未报告来。现在仅就执行中央指示中的各种倾向报告如下:(一)地方党政人员常常在讨论中央“精兵简政”时着重主力裁减,发生不顾华中敌顽对我环伺,我之主力尚不足够应付,而华中人力物力之调征,并未达到饱和点,除淮海、津浦路东地区外,一般均未达中央脱离生产人数不得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三的规定,华中主力仅8万人,地方军仅4万余,相当的扩充仍属必要而且可能。这种裁兵论、缩小论是基于片面理由,我们认为应加纠正。(二)扩大会主张发展主力到9~10万,地方军到10万,自卫军20万,基干队10万,准备一年内完成此计划。这个主张又发生有所谓特点论出来障碍,其实质是某些主力的工作同志认为主力编制不充实,不同意搞地方军,而要求继续编并地方武装以扩大主力,认为中央精兵主义只适用于华北,不适用于华中。强调地方的特点,因而曲解中央精兵建设的指示,未强调主力的扩大,不了解华中地区主力亦必须注意本身地方化,某些地区如苏南、苏中、无为等地,部队不地方化即难于坚持,即令某些地区人力物力尚可供我征调,但提前注意积蓄,保持军民实力,仍是必要的(又此时不通过发展地方军的办法,孤单地扩大主力也不可能)。我们对这种地区特点论者不了解华北、华中同为敌后,不了解斗争的长期性,民力为军力之泉源,不爱惜民力,绝难长期坚持,这些观点正在纠正。(三)华中各根据地

从1940年冬黄桥决战后,才完全控制在我手,才有了正规建设的可能。许多应办机关均未成立,比如各根据地的参议会,仅先后初办,许多机构仍未建立,如一切裁减势必影响工作,但如不顾可能,不密切注意敌后环境及根据地发展之趋向,而建设庞大机关,亦必在扫荡中遭受损失。(四)一年多来的华中局面敌友我均保持三角的相持形势,汤李等大军计40余万屯集豫皖鄂,……故我应利用此时机在两个反“扫荡”之间来迅速进行建设工作,反对各种偏向,正确而灵活地执行中央的“精兵简政”的指示。(五)在军事建设上,决分为甲乙丙三种师的编制。甲种师则采取三旅三团三营四连制,乙种师则采取废旅制,丙种师如七师则直接废旅,并且团亦废营。又如一、六两师师部合并,该两师原为一个部队分开的,且地域接近。又各师或兼军区或不兼,某些军区之下设分区或不设,总以避免叠床架屋、头重脚轻为目的。(六)我们打算今年秋收前完成扩大地方军到10万任务,各季动员数万新兵充实主力,冬季才有可能使各种工作走入正规或可能完全照中央规定的报告项目,作正确的统计报告。(七)华中局仅保持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宣传、青妇各部仅1人或2人,政府工作部至今无人负责,军政治部主任亦系兼职,无人负专职,我们军直机关连特团、抗大在内仅3000人,我们工作机关拟逐渐添补人员。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滇浙与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但我们仍应根据“精兵简政”、迁移多余资材,不误整风学习、不误农民生产等原则,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工作。

5月22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谢觉哉在边区第二届参议

会常驻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去年大会上告诉我们：“参政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达到这个目的的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而要使这些政策充分有效，那就要执行去年大会决定的：“精兵简政，言行一致，上下一致。”“精兵简政”，即是“短小精干”。边区人少地瘠，物力人力都不足，不能不“短小”；而要抵抗顽大的敌人，担负民族复兴的任务，又不能不“精干”。“言行一致”，说到就要做到；“上下一致”，上面决定的政策，一定要贯彻到下面去。

5月22日、24日 延安市南北区自卫军连排长已民主选出。北区、南区分别召开整编会议，决定自卫军整编工作于5月底完成。

5月25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府派遣干部下乡，已在切实执行中。下乡人数总共200余人，已出发者共有50多人。此次下乡性质，是留乡做较长时期的工作，大多数是到区乡级，任区助理员或乡政府文书等。派出干部以财政厅最多，民政厅次之，再次则为教育厅。科长以上干部，则由民政厅干部科另行分配到各县。

5月26日 边府秘书处50余人召开晚会欢送20余名下乡干部。李鼎铭致词是：“医治头重脚轻毛病；深入民间了解下情，健全清明政治，加强军政民相互关系，帮助群众团体工作。”谢觉哉在会上告以下乡干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的具体办法，并着重指出和群众密切联系及研究22个文件的重要性。会上还传达了林伯渠对下乡干部的希望：下乡后多多来信，多多收集材料寄来，保持经常

的密切联系。欢送晚会时达3小时始毕。赴绥德分区干部10人即于本日启程,至其他各分区者亦将于本月全部出发。

6月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林伯渠在5月8日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常驻会第六次会议作的《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五个月工作报告》。报告把“精兵简政”作为五个月来政府工作的第一项工作,指出:自从政府改组以后,我们首先执行的就是“精兵简政”决议案。在部队方面,实行“精兵”政策,以加强武装力量。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都曾经加以编整,减去老弱,转入生产,编整以后,即加强政治军事训练,使它达到精兵的程度。另一方面,则着重民兵,重新整顿自卫军,使不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强大。因为在今天的军事条件,应该随时准备把游击战争放在主要的方面。最近并大量制造武器,使正规军和民兵的弹药充实。至于“简政”政策,基本上是要使政府机构灵活、轻便,以便发挥政权工作在抗战中的最大效能。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我们曾经把政府机构,从上到下,加以编整,共减去1598人的名额,派了300余人加强下级,其余则送学习,或转入生产。我们今天检讨起来,还感到不够,头重脚轻的毛病还很严重。因此,最近又决定了进行第二次的编整,把边区一级尽量缩小,成为精干的领导机关,对下级则大大加强,使政府的工作效率更加提高,以适应今天战争环境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对于“精兵简政”所进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而军事工作,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方面。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钟人方的文章《敌后部队的精兵简政》。文章指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提出以后,在敌后许多地区均已执行或开始执行,有些地区执行得较好。如山东我军之一部,在这个指示下,部队裁减了许多重叠的机关,原来有31个指挥及

指导的机关,现在减为 18 个,营级战斗单位,也由 42 个减为 22 个。整编的结果,充实了战斗连队,所有的战斗单位均充实到 150 人以上,战斗力比前增加一倍至二倍。在山东部队之某兵团中,把 525 名杂务减了出来,192 名身体强壮的充实了战士,333 名老弱残废动员加入了后方的生产部队,部队战斗人员增加、战斗力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也增强了。由于战斗人员的增加,旧日剩余的枪支现在有人拿来使用,连队火力比前加强,胜利信心较前提高。整编后,干部足够,且干部质量普遍地提高,所以单位虽少,而战斗力加强,机关虽少,办事能力提高,头重脚轻的毛病克服了。整编后还抽调出 650 名班长以上的各级干部,大部分已进校受训,小部分加强了地方军区的工作。文章还指出“精兵简政”实施中的经验与教训:如政治动员和解释工作,还犯有一般化的缺点,以致在整编前后发生各种不良的倾向,甚至发生逃跑的现象。如干部配备不适当,则发生战士与干部的不熟识,管理松懈,宗派主义等现象。如对老战士教育不够,使他们长期停留在战士和杂务人员的职位上,使他们感到不能发展而发生工作厌倦的情绪。如对裁减下来人处置不当,对整个部队情绪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山东的办法,主要是送后方加入农工商的各种生产,对于那些不能参加生产而离家又远的人,即设法与地方上配合适当的安插。如整编后,许多人认为“精兵简政”已大功告成,而未认识紧缩编制仅是实行“精兵简政”的开始,因为这还仅是组织上的精,而今后工作上的精、战术上的精、战斗上的精……还要我们继续去完成。文章最后说:敌后各个根据地虽有不尽相同之点,如山区与平原之不同等,但敌后斗争今天已进入艰苦困难的新阶段,这是共同的;敌人对我频繁的“扫荡”与“清剿”是共同的;敌人对我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也是共同的。如果有点不同,也只能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基本上的差别。所

以“精兵简政”应是敌后各个地区各个部队都要执行的政策，尤其是那些困难的地区，特别是平原地区，更要坚决执行和首先执行。

6月3日 边区政府召开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府系统第二次编整意见》：（一）确定边区政府为政务领导机关，其基本工作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导行政，培养干部”。根据这一原则，边区政府进行第二次编整，机构及人员之调整与配备，编整范围除边区一级外，尚包括分区县、各级政府机关；（二）边区政府应将一切不属于或可以不属于本身的日常政务，划给县市政府去管理，俾能发挥其本身政务领导机关之作用，达成基本工作任务之职能；（三）各厅处尽可能集中起来，并建立合署办公制度，日常政务与事务应适当分开，一切事务工作由边府秘书处统一领导之。会议决定，由民政厅编整委员会负责，根据上述原则，考查与研究各机关情形，拟具详细办法与计划，于本周内提交总编整委员会审核。

6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指出要改变一切组织机构使之更加适合于今天残酷斗争的环境，党、政、军的关系要做到一元化，庞大不便行动的后方机关必须缩小，要切实实行“精兵简政”政策。

6月12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民政厅编整委员会提出的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会议决定：（一）根据该纲要关于工作制度及组织机构所规定的原则，各厅处进行研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确定政务与事务如何分开，以及本单位之具体人数，渐次照二次编整计划进行编制与缩

减,迅速抽调干部派赴各县。(二)关于合署办公之一切制度,事务机关之建立及房屋之布置与配备等规定,自即日起至7月底止为准备期间,准备就绪后,8月即行移住,以便集体办公。(三)各学校之编整方案于17日讨论,边府各厅处附属机关及下级政府之组织机构,及人数与确定的编制,定于24日讨论。

6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后方勤务部编整完竣,人员减少三分之二,工作效率提高。报道说:在未整编前,后勤部下设供给部、卫生部、经济建设部、工业局、兵站等。仅供给部一个部门来说,下面即分处、分科,每处至少配备8个干部。各部并设秘书室,秘书3人至5人,卫生部、经建部、供给部并各有政治处,各单位居处分散,各有伙食单位,消耗人力甚大。经此次编整之后,连后勤部本身,只有一政治处,一供给部,一卫生部。兵站的运输交通队,全由后勤部总务处直接领导。工业局及经建部,留下之各工作,除一部分归前方司令部管辖外,余均由供给部工业处领导。全后勤部设一秘书处——供给部及卫生部各设一秘书,分别助理各部工作,各单位的伙食单位,警卫班等,亦合而为一,不仅地点集中,而且指挥便利。此次编整后裁减下来的干部,均由组织另外分配工作,或去前方或留在后方,不少干部在整编前担任科长,整编后改任干部,但无一表示不愿接受。

6月1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二十四次政务会议,讨论落实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会议对今后政府工作决定如下:(一)军事第一,一切工作服从战争。(二)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克服太平观念和忽视战争的思想。(三)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人民的情绪与需要。(四)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实现事

权统一,行动简便,提高工作效率。(五)改进司法工作。在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一条中具体指出:“精兵简政,为的是事权统一,行动能够简便,劳费减少而工作效率增高,人员减少而干部力量加强,比如厅处长专员县长,减轻些事务工作(不是说不管事务),而多去考虑问题,解决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千万件事务工作也随之解决,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提高干部、配备干部、纠正头重脚轻,知识分子干部去做实际工作,比较容易成为独立工作的人。又如合署办公,裁并一些可裁并反而效力增大的骈枝机关学校。重新审查事业,分别必要、次要与不要的,首先加强必要的,取消不必要的。“精兵简政”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减去些事不做,而是使事情做得更好,不是只求裁少几个人,而是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使工作能贯彻到底。“精兵简政”是今年工作上的一个主要议程,应在最近研究好并实行,应在今冬参议会以前,向参议会提出报告。

6月20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延川县实行“精兵简政”,在数量上大体已做到,但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尚未见成效。县政府原有工作人员40人,减去8人,派往加强区乡工作。8个区原有职员55人,减为38人。裁去17人,4人将分配为乡长,11人回家生产,2人到延安学习。全县8区共51乡,原有乡长51人,今后为加强乡政府工作,须各增加文书1人。但这种能读能写的文书不易一时完全找到。现任乡长中仅1人是高小学生,能写字条的也只有四、五人,稍识几个字的约占全数三分之一,其余则目不识丁。故每一乡政府设立一文书,对协助乡长,加强乡政府工作有很大作用。

同日 晋西农会根据“精兵简政”原则,通知各级领导机关,一律暂行缩小编制,中心区一级规定留1至3人,县级亦按工作繁简

留1人至3人,区级一律2人。上层干部一律深入下层,真正帮助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6月2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敌后精兵简政》。社论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政策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推行以来,已获得一些初步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还是很不够的,还是远落于客观环境的需要之后。这是由于有许多同志对于“精兵简政”的极端重要性还没有真正透澈的认识,对于现有的工作场面,往往有“舍不得”之感,只愿扩大而不愿减缩。于是“精兵简政”的实行不免遇到了阻碍。社论在反复说明“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的必要性后指出:我们要更深刻地认识敌后抗战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在达到最后胜利之前,我们还要走一段空前艰难的途程。我们要渡过这个难关,对于根据地的人力物力,便必须万分珍惜,作长期的打算,节省地和持久地使用。只有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将脱离生产的人数减至最低的必要限度,才能使根据地的元气能够保存,才能使根据地人民和政府军队更紧密地团结,坚持抗战。

6月2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陶铸的文章《再谈精兵简政》。文章指出:有一条规律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即一定的生产力养活一定的人数。我们根据地今天的生产力与被这生产力所养活的人数之间是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绝不应依靠其自流的发展,而应依靠我们自觉的有远见的政策的指导。现在我们各根据地对“精兵简政”的政策,虽一般已开始在做,但均做得很不够,原因是由于大家一方面还舍不得把自己的部队和工作精简一下,另一方面被精简的确也不容易找到销路。有两个碗盛水,倒来倒去还是那些水之苦,这里十全的办法是没有的,从远处

大处着眼，部队硬要做到重多而存精，各种机关与各种工作硬要做到有绝对需要的才使其存在与让其进行，否则就一律撤消与停办。自然，“精兵简政”因各地区之不同，在执行的程度上是应当有些差别的，如富产的平原地带，一般生产力比贫苦的山岳地带要高，因之人民的负担力也就要大于山区，被养活的人可以多一点，精简就可以少一点。再如以华中与华北比较而言，华中发展起来比较迟，今天有许多东西在华中还未搞起来，这就决定它精简的范围与深度确不同于华北，因为它不仅精与简的对象没有华北那么多且某些方面是还可以多少增一点的。文章最后指出：把精兵简政当成主义，做落后群众的尾巴，只一味的要精与简，而不注意到：坚持一定的地区是需要有着一定的力量，这一点，那也是昧于“精兵简政”这一政策的真义的，“量体裁衣并不等于不要穿衣”，否则，就不是“精兵简政”，而是“拆伙解散”，瓦解力量，取消抗战。总之，“精兵简政”这一政策，一定要贯彻，在执行中并要对“不精不简”与“精简主义”这两种倾向做两条战线的斗争。

6月25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晋冀鲁豫边府决定“简政”具体办法：（一）区村不得出布告。（二）少下命令。（三）确守财粮、义运、支差及荣誉军人安置制度。（四）凡有制度、有规定的日常工作，边府各科长、秘书、主任，专署各科长有机动处理之权，但处理后负责向首长汇报。（五）政府制定法令、政策时，应事先征求下级意见，以期深入切合实际。（六）边府、专署及县建立与加强联合办公制度，以便商讨工作，避免迟缓与矛盾现象。（七）建立与健全案卷及文牒制度。（八）边府及专署对电报须在一天内答复，一般公文限3天内答复。（九）发文件检查表，以检查政府执行情况。（十）一切政府文件布告应力求简明通俗，易于了解执行。

6月30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精兵简政实施方案纲要》两个重要文件。《方案》内容如下：一、“精兵简政”的方向。“精兵简政”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为此目的，需要：（一）建立必要的、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行政工作制度。（二）提高干部与适当配备干部。（三）要增加县政府的权限。（四）密切党、政、民的工作配合。（五）实行合署办公。《方案》在每一方面都指出了过去的问题和不足，现时纠正的办法。二、调整政府机构的原则。政府设多少机关部门，是根据工作的需要。机关的大小，是根据工作的性质、规模和繁简而定。现政府机构依照工作性质，大致有三类：（一）行政工作的领导机关，如各厅、保安处和法院，这是督导县政府和所属事业专管机关、事务机关的工作的领导机关。他们的基本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导行政、培养干部”。这种机关要以短小精干，宁缺毋滥为原则。（二）事业专管机关，如卫生处、粮食局、税务局、贸易局、通讯站、银行等等。有的事业虽重要，但不必专设专管机关（如交通局、合作指导局、卫生处等），可以裁局并科，减少伙食单位。（三）技术事务机构，如秘书处、总务科、文书科、收发科、生产科等等。行政或事业机关的独立单位愈多，这些技术事务部门也愈多，一个人的工作分成几个人做，人就要得多，人的质量就差，工作质量也愈差。因此要减少技术事务部门，就得合并机关，减少独立单位。可以减少或合并的机关单位如：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合署办公，五机关为一单位，总称边区政府。农业局、工业局、交通运输局、林务局、合作指导局分别合并为建设厅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第四科。抗属工业社取消。这样能减少4个厅和抗属工业社、林务局、贸易局、

合作指导局、农业局、工业局、交通运输局 11 个单位。单位减少,人员跟着减少,领导跟着集中,工作质量跟着提高,即实际提高了工作效率。三、实施办法。“精兵简政”主要应从建立与改进各种制度,配备干部等等开始。起初不是减多少人,甚至还得临时增加必需的人员,帮助建立各种制度,支出必要的建筑费,建设合署办公的房屋等等。要舍个头本,换回节省干部,节省经费的将来。

《纲要》主要内容如下:(一)实行合署办公制度。第一,首先实行民、财、教、建 4 厅与秘书处的合署办公,保安处、高等法院因工作性质不同可暂不合。第二,设立合署办公厅。第三,秘书处掌握各厅共同之内务与日常事务及不属各厅诸事项。第四,对外各项行文,多以正副主席署名。第五,如此,则各厅以搬住一处为合宜。此次编整后,公务人员不过 140—150 人,连事务人员约有 250 人左右。(二)把政务与事务相当的分开。所谓政务,是政策的领导并包括其具体的业务和各厅及厅内各科,一方面决定政策,一方面执行工作内任务内的各项具体工作。事务是专指日常生活方面的,如供给、生产、会计及文书、收发等。因此,必须确定,在集体办公后政府各厅处专门掌握其政务,其各项事务工作,大部分集中在秘书处领导之下,把秘书处变成合署办公之各厅的内务行政部门。集体办公后可以合并的事务:1. 总务工作,包括供给、生产、管理人事、分配房屋、招待、警卫及其它庶务工作等。2. 特别会计,如民政厅的民政事业费,建设厅的建设费,教育厅的教育费等,可以统一管理,但主权仍属各厅。3. 文书、收发工作,如缮写、印刷、校对、收发等。4. 统计及材料的保管也可统一。(三)要加强下级,首先要加强各县政府的独立工作能力。第一、要给各县政府尤其县长以相当的权限,边区政府只负对他们领导督促检查等责任。县长有处理指定工作、配备干部、调支经费等各项权限。第二、边区政府现管的某些具体政

务,尽可能的责成各县办理。如民事调解,必先经过县,县解决后,不服则接收,不能件件管,代替了下级的工作。其他如税收、粮食、卫生、通讯等工作,各县均可有责直接管理与领导,这样边府可以减轻许多日常工作。第三、要重视组织系统,各厅领导各县,一定要经过县长,由县长总其成并向边府各厅负责。纠正过去由厅直接到科及某些提倡特殊性独立性不经过县长的现象。第四、各县应设一个强的秘书主任,各科应有一个以上强的科员,人不一定要多。(四)根据以上的工作和制度,确定边区政府机构的合理原则是“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从这一原则出发,重新确定各厅处的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为:秘书处设秘书长 1 人,下设秘书主任、秘书、总务科、文书科、收发科、工作团、统计材料室、特别会计室、法制室,编制 52 人至 54 人;民政厅设正副厅长各 1 人,下设秘书室及第一、第二、第三科,编制 23 人;财政厅设正副厅长各 1 人,下设秘书室及第一、第二、第三科,编制 17 人;教育厅设正副厅长各 1 人,下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编审室、督学,编制 22 人;建设厅设正副厅长各 1 人,下设秘书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科、技术室,编制 19 人至 26 人;保安处按原定不变;高等法院设院长 1 人,下设秘书处、司法行政科、法庭、监狱、卫生所,编制 26 人;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制 1 至 3 人,文化工作委员会和防疫委员会编制 8 人;民政厅卫生处、通讯站,财政厅粮食局、税务局、禁烟督察处等均实行缩编。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绥德专署召开县长联席会,彻底实行二次“简政”,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如关于乡政府问题,决定:一、提高乡长职权,充分发扬其积极性;二、经费准大乡自购米 1 石 5 斗,钱 1000 元,小乡 5 斗,钱 500 元,开支半年,经过报销,由县府审核。

7月8日 李鼎铭赴延安交际处访晤晋西北来延士绅，在畅谈中李鼎铭表示：“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虽六十，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以“精兵简政”一案为例，说：“当我提此案时，曾趑趄至再，并经友人数度劝阻，但我在边参会上，目睹共产党对于民主合作，完全出于至诚，乃毅然提出，结果非但未遭反对，且受该党人士热烈赞助，而经大会接受。”他继续说：“从政以来，该案已由政府认真执行，同时因为做得不够彻底，在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上，复经详细讨论，为期彻底实现起见，现已开始二次编整。至在工作过程中，本人更无任何困难的感觉和党与非党的界限。”

7月9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第二次“精兵简政”与增加县政府权限》。社论指出：边府这次“精兵简政”的具体方针，除了要调整政府机构，建立必要的、符合边区实际情况的行政工作制度，提高干部与适当配备干部，密切党政军的工作配合，边府各厅处实行合署办公之外，就是要增加县政府的权限，这是在第一次“精兵简政”时未明确提出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整个边区行政工作效能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应予以正确的解决。因为县是直接领导区乡政权，具体执行政府一切政策、决定和法令的行政单位。现在的问题是县政府的权限不够，事事要向上级请示，甚至添造一间房屋也要请示上级批准。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县长没有做到对一切县政府工作的统一领导。解决办法：第一，要按照《县政府组织条例》，真正实行县政府对本县内地方性事业的兴革，有完全决定之权。第二，政府派工作团或干部下乡协助，不是去“代替”县府工作，只有提意见参加工作的义务，而无不经过县政府自由决定的

权利。第三，县长对全部县政工作都要负责任。边区各厅处对县府各种指示工作，应经过县长下发，责成县长负责督促各科执行。第四、积极发挥县参议会在决定县政上的创制与监督作用。

7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左权已于1942年5月25日在战斗中牺牲)的遗著《坚决执行精兵政策》。编者按指出：此文曾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当此“精兵简政”政策正在各根据地实行时，此文仍有意义。代论详细阐述了在军队一部分人员中曲解精兵政策的现象：有些同志把精兵政策简单的认为就是“裁员裁兵”，减少吃饭穿衣的人员；有的同志因为必须深造而送去学习也认为“吃不开了”，对前途表示暗淡；有的不适宜军队工作的同志，必须作更恰当的分配与安置也就认为“革命革了多年，现在没有我的地位了，不要我了”；有的同志转入生产营业部门工作，也就表现极不乐为，鄙视这些工作，而不服从分配；有的妇女同志，也认为今日没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了，而担心着自己将来的工作问题；更有些调动工作的同志，因为减少某些可以减少的公务人员与马匹，就认为降低了自己的“地位”、“资格”，不“体谅”干部，表现极端不满，或则藉故需索，或则不惜违犯纪律、破坏制度、不择手段的硬要；还有些同志因为自己要调动工作，或本单位要解散，就胡分起来，公物也可以不爱惜了。争分生产所得盈余，或则杀猪宰羊，大吃大喝，总以一扫而光为快。这一切显然是不对的，错误的。代论指出：精兵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提高部队政治的军事的力量。而要搞好精兵工作，正确处理与适当分配编余人员是关键。关于编余人员的处理：第一，抽调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中去学习；第二，尽可能从非战斗部门抽出精壮，充实到战斗单位中去；第三，以一部分人员投入生产营业部门；第四，部分已

不适宜于军队工作的老弱残废同志,分别情况在根据地内安家落户,要照顾好老同志和残废同志;第五,对于妇女同志安插到适宜她们工作的岗位上去;第六,抽调一部分同志分配到其它根据地工作。代论最后指出:各个部门必须慎重地认真地处理这一问题,一切粗枝大叶,马虎了事,都会酿成过失,造成革命的损失。

7月1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洪彦霖的文章《乡村行政组织整编问题商榷》。文章指出:如延安县一个乡的例子,说明“平均八个人就有一个干部,不到两家就有一个头目”,这种情况差不多全边区是普遍存在着的。乡级行政机构也宜简、人数也宜少,因为机构庞大,转动不灵,责任不专,有时会发生“和尚多了没水吃”、“鸭多不下蛋”的现象。文章建议乡级政府中教育、优抗、建设、锄奸、仲裁、卫生6个委员会中,仲裁、卫生2个可以取消,另外增设地政委员会,从6个委员会变成5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原则上还是规定只有3个委员。

7月15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清涧县进行二次简政,县建立集体办公学习制,取消一般委员会组织。

7月中旬 陕甘宁边区建设厅遵照边府关于进行第二次编整的方案,彻底简政,实行裁局设科。具体是:将农业局和林务局合并改为第一科,工业局改为第二科,合作指导局改为第三科,交通运输局改为第四科。将原第一、二科合并于秘书室,第三科并入第一科。19日,在农业局和林务局合并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两局合并,使人力物力更加集中,今后边区的农林工作可更加发展。

7月20日 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党政民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第二次的“精兵简政”。决定工作较闲的干部,一律裁减,分别派遣回家生产,参加部队或保送学习。此次共减员49名,连前共减90余名,约占原有脱离生产干部的四分之一。

7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在讨论晋西北工作和“精兵简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提出:“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6万人,晋西北减至5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晋西北加上打仗一项。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军队不继续补充,按现有实际人数充实连队,可以实行小团制。至于敌后,要准备很大的缩小。搞一个统筹统支与自给自足相配合的很好的经济制度,以七分统筹、三分自给为主旨。

7月29日至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在讨论关于晋西北工作决定草案时,毛泽东发言提出修改意见,并指出,关于敌后工作有两件未深入,一是整顿三风,二是“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日益增长的困难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精兵简政”的问题,如想不到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故要主动地订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变化很快很大。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离生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

8月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彻底实行精兵政策》。社论指出：很久以前，党中央即已明白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敌后建军原则，完全是依据敌我力量的诸般变化，敌后斗争客观形势之发展而正确规定的。但在个别地区和少数干部中，对于中央这一正确的指示，还有误解或执行不够的地方。而在此敌后斗争日益残酷尖锐的时候，精兵政策又为敌后军事建设当务之急。所以，今天对精兵之要义还有再为申论之必要。如果今天还有些地方，企图把地方武装编入正规军，扩大主力；只看到局部情况，暂时利益，舍不得把自己的部队精简一下，这种作法，将来必然会处处撞壁，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的。这种作法，必须速予纠正。

8月4日 毛泽东复电陈毅：“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1934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8万主力军、4万地方军扩大至10万主力军、10万地方军，共计20万，党政还不在于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

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8月8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政府一级二次编整计划，已经在民、财、教、建四厅着手进行。民政厅二次编整，近已完竣，各科按实际工作情形，干部人数配备已略有变动。目前连边区防疫委员会、保健委员会两新机关在内，总共有干部为31人。在民政厅所属机关如边区通讯站，未编整前干部共22人，现则减为17人。边区卫生处、边区门诊部、边区医院，亦减少干部5人。保育训练班、抗属工合社，则已取消。在遵照二次编整方针下，部分工作计划给县市管理，如前附属民政厅之边区防疫委员会，已决定改为研究指导机关，一切实际事务，改由市府卫生所执行。同日，还报道：边府二次编整委员会，初拟7月底编整完竣，并实行合署办公。目前先决定在民、建两厅，准备拨出若干窑洞，以使财、教两厅搬来。俟大办公室建筑完竣后即实行合署办公。至各厅合署办公实行后，各厅原有之总务科，均将取消，改由总务处统一管理日常生活，将可节省大量干部和杂务人员。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府机关人员的薪给，将逐渐改为“实物薪水制”。教育厅与延安市政府已首先实行，按月每人发给小米4斗或同等价值之代金，衣食即不再供给。报道说：“薪水制”的实行，对于行政效率的提高，或有若干裨益，且为“三三制”政权中必不可少措施。目前只为试行阶段，如果实行的成绩好，将在各机关内的个别人员及各县党外人士、地方干部中首先实行，但亦只以自愿为原则。

8月19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铎的文章《精兵简政在晋

冀鲁豫边区》。文章说：边区在今年春间依着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坚决紧缩军政民的组织机构，注意精干，使之更适合于敌后日益残酷斗争的环境，并认真地爱护民力与节省民力。如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百分之四，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一部分用以充实下面，一部分真正裁去。边区政府本身在紧缩后，也裁减人员百分之四十八，节省经费百分之四十六。预计至本年底7个月内，全太行区即可节省粮食49156石，及经费4266120元（每月可节省公粮7000石，经费60万）。文章接着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实施“精兵简政”的具体做法，如采取的步骤、如何简政、如何精兵、爱护培养民力等。

同日 毛泽东致信谢觉哉、陈正人，指出：“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19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8月21日 新华社电讯：晋西北边区为贯彻“精兵简政”的原则，除行政公署内组织已紧缩整顿外，又决定将西北农民银行、各级贸易局及税务稽征局三个单位合并编制。编制合并后人员大为减少，晋西北边区一级，现有人数占过去人数百分之四十二。

8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军、整政、整党、整

财、整关系)。中央和军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两个标准来大整。工作是按现状条件布置工作,过去要四五个人的,现在只要半个人。教育是专门学习,储备力量,扩大学校。中央最好能做到四五千,总之以工作与教育两标准来进行,与此二原则相反的均不要。军队亦以此为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加强,抓住中心,掌握政策。边区参议会停开(原拟定于本年10月10日召开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主要实行“精兵简政”,然后再开。

8月2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社论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以来,在时间上来说,已经是相当很久了,但是还有某些地区或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社论再次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必要性:第一,五年来敌后抗战的结果,敌我形成彼此包围的相峙局面,进行着拉锯式的反复战争,抗战初期那种游击战争向敌后进军的蓬勃发展形势,已经是过去了。今后的问题,在于谁能熬过严重的难关,胜利就是谁的!因此,我们必须紧缩自己,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第二,敌后战争频繁,战线不固定,部队机关的流动性都很大,庞大的机关、非战斗人员多了,为战争环境所不容。我们的机关和部队,是为着执行一定的任务而规定的,不是为着机关而机关,为部队而部队。如果在发展时一般是注意数量“搭架子”,那么,在紧缩时,就应该注重质量,贵精干而不贵繁多。如果情况变了,而我们仍然墨守成规,不愿有所改变,那就是道地的教条主义者!第三,由于根据地在残酷战争中,地区上的缩小,人力物力的困难增加,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

人民的财富又比较有限，所以在每个根据地内脱离生产的人数只能有一定的比例，否则会发生“塘小鱼大”的矛盾。敌寇对我根据地采取的“三光政策”，其目的就在于摧毁我“生存条件”，是企图“竭泽而渔”的办法。紧缩正是针对敌人这一毒辣政策而来的。社论对在少数同志中还存在着的一些不正确的意见，片面的了解，如只幻想将来，而对现在的具体情形熟视无睹的“远视眼”的想法；如不能预见将来，定出对策的“近视眼”的看法；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不顾条件的“多兵论”；如只要机关大，干部多，才得把事情办好的“繁政论”等一一作了批评和解释。社论强调：“精兵简政实为目前各根据地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把这一任务的实现，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举凡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政经济工作等等的进行，都应当在这一政策之下，加以新的考虑，贯彻这一政策。”社论号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应“当机立断”，主动地变化我们的政策，避免“措手不及”，甚至遭到意外的损失！社论最后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政策，是为着克服目前困难，争取将来更大发展的正确政策，是既照顾到现在又照顾到将来的政策，是积极的政策而不是消极的政策！要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是定了的，将来的发展也是定了的。在由现在到反攻这一段艰苦路程中，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整齐些，锻炼得更精干些，则胜利与发展就会更有保证！”

8月2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精兵简政的模范》。社论介绍了1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文章，赞扬晋冀鲁豫边区在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指示中，在工作上创造了不少的成绩。社论说：“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工作，是有比较周密、精详而切合实际的办法。在纵的关系上，它从政治动员、工作的布置计划、工作的执行以及总结检查，都能有条不紊，依次

进行；在横的关系上，它能把精兵简政的总方针贯彻于各个方面的工作，它对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政工作等等的精简工作，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精兵简政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党政军民中深入地传达与动员”，“首先是部队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与动员。在动员中，检讨了各级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和人民负担情况，并建立各级领导机关的整编委员会，并使专人负责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实行简政，不只是简单的减少人员，而是加强行政机构，改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充实上层，加强下层。不必要独立存在或工作可以兼顾的机关，可予合并调整。勤务员、伙夫、马匹可以裁减节省的，编入生产队伍。如晋冀鲁豫边区，规定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不超过居民人数的百分之一。根据这个规定，政府缩减人员百分之四十、节省经费百分之四十六，按各种条件实行并村、并乡等等。淘汰冗员，兼理公差，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发扬干部的劳动作风。如邢台县二区减少村干部十七人，全年节省经费不下二万余元。”“在调整干部时，也详细注意到干部的情况，适合于何种工作？何处工作需要？务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对编余人员，亦有妥善处理。有的上学，有的转入其他工作部门，有的进工厂农庄参加生产，有的由政府贷予小规模款项，助其经营工商业，使壮者有工可做，老弱者不致流离失所。在干部使用调整问题上，亦规定出三项具体办法：①不妨碍‘三三制’之施行；②尽先留用历史久的干部及大后方敌占区来的干部；③不是排斥某些人，对妇女干部尤须按插。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事无巨细，都经过一番详细的筹划。”“精兵简政工作，要配合爱惜民力、培养民力与发展生产同时进行”。“实行精兵简政，要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精兵的意义，一方面求得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另一方面也是顾到今日敌后的经济困难，而紧缩部队。晋冀鲁豫边区规定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不超

过居民数百分之二,因此必须紧缩后方机关,充实连队,减少人员马匹。战斗部队团以上战斗员与直属队人员为7与1之比,团以下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为5与1之比。民兵发展亦有限制,不得超过居民数百分之五。”“晋冀鲁豫边区彻底精兵简政之后,已收到许多显著的效果。首先是节省了大量的物力,总部直属队及边区精兵简政之后,预计自6月至年底七个月内,太行区即可节省粮食4万9千余石,节省经费420余万元。边区政府现已节省粮食2万石,移价减免太行区各敌占区人民负担之用。不仅如此,部队和政府更加精干,战斗力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更适合于敌后的艰苦战斗环境,而军政民的团结亦更加增强了。”

8月27日 新华社晋察冀电: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委员会,为了贯彻“精兵简政”,掌握边区财粮预决算,认真节约,消除浪费,特共同决定组织边区审计委员会,审计军政部门之财粮预决算,掌握军政部门之编制人数,检查各级军政部门浪费贪污事项等。自本年10月份起,边委会即交审计委员会批准军政各部门编制人马数及预算,核发粮食与经费。

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9月1日发出,作为整风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并作结论,关于“精兵简政”,他指出:“精兵简政”包括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的政策。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过去在江西根据地有20万军队,只有120万民众供给,没有经验,现在中央和军委共有2万4千余人,应减为五六千人。中央工作的原

则是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

同日 延安县工会、青救、妇联三团体，正式合并，改名为延安县抗敌后援会。群众团体合并后，根据“精兵简政”原则，县级减为7人，设立主任1人，下设组织、宣传两科，秘书1人；各区设主任、干事各1人；乡抗援会由5人至7人组成，如有工作需要得设青年、妇女、工人等干事。

9月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三十三次政务会议，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列席会议并报告继续贯彻“精兵简政”的方案。经过会议讨论，通过将该方案修改补充后印发实行。会议并决定由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高自立、刘景范、柳湜、周兴7人组成简政委员会，负责政府简政之全部工作，李鼎铭为主任委员。会议根据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的请求，决定由边区政府咨请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提交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选举点验委员，组织点验委员会，到各部队点验整编工作。

在该次会上被通过的《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指出：“统一，少而精，提高效率，是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全部意义”。“边区政府对于精兵简政的整编已进行了两次，一次有一次的进步。然而应该承认离客观需要之精和简还远。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对精兵简政和巩固根据地准备反攻之不可分离的意义的认识与宣传不够；和精简不相容的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方式没有全克服；只强调缩编，没提出精简工作的全部纲领。”《纲要(草案)》继续强调：“脱离生产的部队应不超过边区人民总数的百分之二，脱离生产的政民工作人员，应不超过全边区人民总数百分之一。”对“精兵”、“简政”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出：“精兵简政不是一次能完全做好的，要从实践中和不断研究中改进。现只是精

兵简政工作的突击,不能以暂时做做就完事。”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党政军民关系中,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决定提出了各种改进办法。关于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决定指出:政权系统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决定还指出:“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9月3日 新华社电讯:晋西北各级机关团体内部机构,已开始调整。行政公署所属工具制造厂与化学工厂合并,人员裁减一部,但生产计划照旧进行。又忻县武委会、抗联、贸易局、交通局、公安局等机关干部,大批分派下乡,开展下层工作。该机关等与县政府合并伙食,节省开支。

9月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我们始终要同老百姓在一起》。社论提出各抗日根据地必须认真地爱护民力,节省民力,培养与积蓄民力,才能渡过困难,坚持长期抗战。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切实限定各个抗日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的军政人员与全部人口的一定的百分比。因为按照我们现在落后农村的生产力,及经常遭受战争摧毁的环境,如果脱离生产的人太多了,便会养不活,便会公私交困。第二个办法,就是要努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三个办法,就是要部队及机关工作人员除从事战斗与本身工作外,努力参加生产,实行自力更生,解决一部分物质供给。第四个办法,就是要厉行节约肃清一切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

9月7日 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发表。社论首先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继而指出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社论指出:“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日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

“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社论在说明了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政策后，接着指出：“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力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10日 边区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布置检查与总结政府机关第二次简政工作。首先由林伯渠作动员报告：第一，对于“精兵简政”的认识问题。“精兵简政”这个方针自从去年边区参议会提出以后，党中央用了很多方法督促推进，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同进

行。半年多以来在许多根据地收到很大成绩，晋冀鲁豫边区所获成绩尤为显著。在陕甘宁边区也有了初步的成就，可是还有些机关和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还认识不够，或者曲解。有些人认为简政就是机关缩小或取消，从消极方面来了解，这是不对的。抗战到了第六年，是越加接近胜利了，可是困难也越多、越大，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几年来所以能抗战下去，是靠了国内的团结，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问题，也就是“精兵简政”的问题，要以少胜多，要短小精悍，才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才能克服困难达到胜利。“精兵简政”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是政权如何适合于战时，提高群众生产情绪。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起了模范，那末，对于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如何把根据地弄好，也应当在全国起个模范，这就要靠“精兵简政”的方法。各部门的工作同志，一定要提高这种认识，我们党一再提出，这是达到最后胜利的重要的政策。过去几个月，政府系统的一二次简政派了 200 人下乡。但简政还不仅是调人的问题，而是政权机构如何精干的问题。第二，关于一二次简政中的缺点是：（一）没有全面地具体地订出方案，贯彻这个政策；（二）调人下乡我们做了一些。可是在机构、制度、工作作风上，我们还没有鲜明的成绩；（三）认识不够，对于积极性方面的意义看得不清，有些马虎，拖延，没有雷厉风行的精神；（四）没有总结一二次简政的经验；（五）计划性差，领导不紧。第三，关于简政的目的：（一）政权机构一元化；（二）组织精干，以少数人做更多的事；（三）工作效率提高。林伯渠在报告最后称：这次一定要彻底做好，政府已经专门组织了简政委员会，可是还需要上下一致，进行工作检查，来完成这个任务。继由李鼎铭致词，他说：简政的重要意义有二：（一）政权机构短小精干，人人都要有作用；（二）建立起制度，有系统，有秩序，使政权机构如同人的身体一样，要手动就手动，要脚

动就脚动。后由谢觉哉讲话，他概括地说明了简政的意义：用人少，做事多，收效大，这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好办法。“精兵简政”是在节约民力的基础下，来生长民力，发展民力。会议确定从11日至17日，各机关对本单位的精简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为：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的编制与配备、行政制度的建立、领导关系、工作计划等。

9月11日 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召集第八次会议，决定：（一）根据政府来函，因部队点验委员会须经大会选出，而部队之整编，要在年底完成，故原定今年国庆日所召集之议员代表大会，决定延至明春召开。（二）明春参议会将以检查“精兵简政”为中心。

同日 边府开始检查工作，切实执行简政政策。在初步的检查工作中已发现：如某些机关在组织机构方面，纵的缺乏系统，横的联系不够；有些机关虽然“处”“科”很多，但在工作方面却反而“尾大不掉”；部分的负责同志，为事务工作所纠缠，考虑问题的时间反而很少；在上下级的关系方面，应往下交的工作反多往上挤；而在某些地方，又有“人不找事”“事不找人”致形成工作效率迟缓……凡此种种，边府各机关工作同志已尖锐提出。

9月14日 边区“刘堡”团召开全团副排长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实行精兵政策。团部领导在讲话中指出精兵意义，在本团的具体实施办法，及防止今后可能发生的偏向。特别是把实行精兵政策与整风学习结合起来，指出这次整编是整风学习的实际测验，每个干部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上级分配的工作，哪怕比原来工作范围小些，也应完全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9月15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签署与发布关于联防军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的命令及干部任命名单。命令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为统一军事指挥，着令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但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联防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免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在关向应病期中代理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

9月15日、16日 边府各厅院处集中检查干部配备及领导关系诸问题。教育厅对于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的问题讨论颇为深刻。外来干部说，本地干部在工作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如一位外来干部编的一本民众课本，经地方干部在词汇上提出很多意见，照着修改后，发到下面去就受到读者很大的欢迎。民政厅同志的发言中，提到新老干部互相间的帮助还不够。秘书处有一些同志，觉得少数的干部还没有放在更好的岗位上。建设厅同志检查到他们工作机构的时候，觉得还有某些因人设事的地方，前次编余的干部，还有一部分没有得到更适当的措置。法院里有个别同志，还表现了工农干部自觉“吃不开”的错误思想。民政厅个别外来干部认为：“将来还不是远走高飞，现在不过帮忙帮忙。”相反的想法则是地方干部认为：“现在不好好努力，将来工作还不是一样都搁在我们身上了吗？”在领导关系的问题上，各厅之间的联系是不够的，比如关于公盐代金的指示，建设厅和财政厅各发了一个指示，但是开始征收的日期一个是8月，一个是9月，使下面无所适从了。

9月16日 边府各厅处工作大检查，关于工作制度部分，均

已检查完毕。综合各厅处检查会上共同的反映：成文制度很少实行，优良部分发扬不够。

9月1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建立乡村党政工作的正确关系》。社论指出：陕甘宁边区乡村工作中，至今还存在着党支部对各种工作一把抓方式的残余。在有些地方党还代替着政府的工作。这种方式，使政府的独立工作不能发挥，事事依赖着党，同时使党忙于日常事务，而不能尽其对于政权工作的领导作用。党和政府机关正常的业务不能建立，则乡村建设工作的效能，就不能提高。现在的局势，要求我们在陕甘宁边区贯彻“精兵简政”的政策，提高工作的效能，纠正党对工作一把抓方式的残余，建立乡村党政工作的正确关系，正是提高工作效能的一个重要办法。

同日 边区政府简政委员会发出通知，限令各单位在20日以前，一律将检查总结呈报该会。该项总结除须将过去和现在的机构制度，以及此次检查中的各项意见具体反映外，并须提出各该单位简政办法。边府简委现正根据各单位每日工作检查的总结，初步研究各机关最适宜的简政制度，待各单位最后检查总结送到后，即可综合全局，制定出具体的办法，提供边府采择施行。边府一级机关的组织机构，将有较大变动，将以合署办公为核心。

9月18日 新华社太行电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8月25日专员联席会议上，详细讨论彻底实行“精兵简政”问题，会后边区政府即开始调动干部，现已调动完毕，调出干部百分之九十以充实专署与县级。杂务人员减缩到最低限度，大部分参加生产事业。农林局、工矿局调驻政府，相当于处下的一个科。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一级工作检查完毕，开始讨论专

署以下各级行政机关实行进一步简政问题。边府简政对象，一为边府一级，二为各分区专员公署，三为县政府，四为区政府，五为乡政府。其目的乃在从上而下，在统一的精神下，使组织机构与制度系统得以贯彻简政的方针。本日，边区政府召集各专员及部分县、区长举行座谈会，林伯渠在会上就简政的目的与意义作了说明。会议确定简政总的原则是：精干、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建立制度，健全机构，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的关系。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府民政厅于上次简政后，工作人员由 90 余人减缩为 40 余人（包括杂务人员在内），并合并了视察室、政权研究班、保育训练班等组织。所属之通讯班也由 52 人减至 37 人。然而在这次讨论中，该厅本机关的工作人员 31 人虽不减少，但在干部配备方面，拟于合署办公后，四科可调动一二人至其它科，而通讯站则拟由 37 人减至 24 人。

9 月 19 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乡级政权的基本任务》。社论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乡级政府，是政权的最下层组织，是和人民最接近的。它对于政府法令政策的执行和乡村建设工作的推进，是负担着直接的责任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乡村政权的根本作用不外两点：在战时，动员人民参战，保卫家乡，争取胜利；在平时，组织人民生活，为人民谋经济、政治、文化的福利。”社论具体提出乡级政权的基本任务是：一、实行政府法令；二、建立革命秩序；三、战争动员，爱护军队；四、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五、关心人民利益，提倡公共事业；六、贯彻民主作风，实行公平办事。

同日 边区政府召集专员、县长座谈会，讨论县级简政问题。会议原则上提出的意见，包括（一）县的工作对象应为乡级，县在考

虑与观察问题的时候,应以乡级为出发点,但为普遍加强乡级,目前人力尚感不足,故首应加强区级工作,通过区级推进乡级;(二)职权应统一于县长,各科对县长负责,县对边府负责;(三)各种经费最好统一管理,经费由边府拨付,另可指定一定的地方收入,作为县的临时补助费;(四)组织机构方面,一致主张增设政务秘书 1 人与事务分开,专力襄助县长处理政务,二、五科最好合并,各种委员会除有必要设立者外,余均主张一律裁撤。

9 月 20 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莫艾的文章《边区两次简政的经过》。第一次简政于去冬着手准备、今春开始实行。第一、调整机构,一切骈枝机关均经裁汰,事实需要之处,并经酌加增设。第二、缩编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至原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六。第三、各种制度逐渐的建立,如各厅院处实行集体办公制,确定各县组织等。但由于(一)战争的环境,抗战动员工作多,组织机构变动多;(二)交通不便利,上下级联系困难,物质供应亦不易;(三)政权工作经验少,一般的文化程度落后,多须摸索与创造;(四)工作基础差,如户口土地等尚无精确调查等。所以存在的缺点有:第一、由于边府各机关住的分散,致领导不够集中;第二由于政务工作与事务工作划分不清,职权不明,许多领导同志多偏于事务的应付,结果妨碍了政务的领导,而事务工作也做不好;第三,上级组织庞大,下级人力单薄,有时上级还包办与代替了下级工作,头重脚轻的现象没有解决;第四、工作制度尚欠完善,不合理不正规之处所在多有,如供给制度不统一,如工作团太多等。第二次简政于六月中旬开始,根据第一次简政的经验,首先确定边府目前的基本任务为“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导行政,培养干部”的政务领导机关,并即决定实行第二次的“精兵简政”,建立一定的正规制度。本此原则,乃拟定

“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适当分开,合署办公”四项办法作为二次简政的方针。现各厅处均已经过二次编整。如建设厅附设的6个局,除贸易局改为财政厅领导外,余均改局为科。人员方面亦正逐渐紧缩,包括干部与勤务人员在内,派赴充实下级的工作人员已达200余人。合署办公的办公厅正在加紧建设,工作条例也正在草拟中,明春即可实行。同时二次编整方针已决定提高县政府权力,加强县、乡两级政府。综上所述,边区简政工作,虽尚未能完全达到理想之目的,但在两次整编中已可看出显著的进步。第一次整编重心在于缩减人员,裁并骈枝机关;第二次整编的中心,则在于建立制度,加强下层。唯一切活动,尚仅限于上层的筹划,致下级执行时,有部分同志对简政意义,尚欠明确认识。而此次政府现正集中力量,厉行工作检查,研究下层机构,在边府一级干部同志,已掀起简政之热潮,对于县区乡级亦正在作切实的调查,简政之切实认真执行是有了保证的。

9月21日 边区政府召集座谈会,讨论县级简政。按照目前甲、乙、丙等县的干部配备:甲等县30至31人,乙等县26至29人,丙等县21至25人。但很多人认为县的工作基础在于乡,乡机构健全后,则县上干部减少了,对工作也无妨碍。延安县长刘秉温在会上说:如每乡添一文书,则区上配备干部3人,县上配备20人即够。按该县为甲等县,共10个区54个乡,现在县级干部共29人,每区干部6人至7人,共约90余人,如照刘县长的配备方法,以每乡增加文书1人计(有文化的乡长暂时可以不需要文书),须54人,亦不过相差10余人,此一提议很受会议重视。

9月23日 林伯渠对来延开会的各县区乡长谈话,指出“精

兵简政”不仅就等于裁兵减人，它的真义，乃是增强我们抗战的力量，渡过难关，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政策。当此“黎明前的黑暗”的时期，敌人既施尽恶毒以图一逞，那么我们自然就要用更好的方法来对付它，这方法是什么？就是“精兵简政”！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适应战争环境，亦必贯彻“精兵简政”到下级去，前此两次编整，已使我们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但在个别同志中，尚有以为简政只是“减人”等错误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精兵简政”是党的一个重要政策，是战胜日寇一切问题的中心，是克服抗战困难、积蓄力量、联系群众、节省民力、提高生产热忱的唯一办法，总而言之，简政的意义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和封建时代简政的意义不完全相同：我们简政目的是为了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不是说不要机关，而是说要把各方面的条件、业务机构人员等更加划分清楚，更适合于精简原则，或更加配备得合理一点。过去简政的缺点是，方针虽已确定，但尚未能全面贯彻；虽然人员方面有所减缩，但在机构、制度、工作作风上尚未做出应有之成绩。今后简政的精神与内容是在积极的意义下，求得精干、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原则之实现，必须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以至改善各方面的关系之目的，籍使上下一致，上层加强精干，下层充实提高，以及法令深入群众。目前须做到的：（一）对简政的意义，在思想上要有一致的认识；（二）确定工作任务的目的，提高业务质量，建立适应于此项目的机构制度；（三）实行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贯彻“三三制”政策，并须反对只顾布置，不去检查，有头无尾及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藉以提高工作的效能。

同日 新华社山东电：胶东简政工作，已在若干地区开始执行。东海区：（一）合并单位，金库与贷款所都合并于银行，若干乡公

所取消。(二)实行精编,专署人员减去百分之四十,牟马县政府减去人员百分之五十四,减去人员皆已设法安插。(三)简政后,每年可节约粮食 2772840 斤,经费 193000 元。(四)初步提高了效率,取消了不必要的会议,克服了事务主义。(五)减少支差,节省民力。西海区简政工作,亦在热烈进行,从专署到乡公所,共减去人员百分之二十七。专署简政后,可节省经费 9230 元,粮食 228940 斤,工作效率不受影响,且可逐渐提高。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通知指出: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政策以来,我华中许多地区已开始筹划和进行这项工作,但还有些地区并未确切进行,已开始进行的地区尚未获得显著成绩,而且部分干部对“精兵简政”的认识仍然发生一些错误偏向,甚至个别干部和个别部门间有因执行“精兵简政”而发生不团结的现象。通知规定:(一)“精兵简政”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教育与动员,必须使党政军民一切干部和群众了解今后敌后的严重困难与斗争的复杂和曲折,而“精兵简政”则正是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胜利反攻的唯一正确的出路,了解“精兵简政”不是简单裁减,而是充实主力加强部队战斗力量,做到以少胜多,短小精干;了解“精兵简政”正是为了关心民族,照顾群众利益,进一步依靠群众,建立军民血肉不分的联系,不致造成人民负担过重,与民争食的困境。(二)要有精密的计划和步骤,在实施精兵简政时应当分期进行。如第一期 of 政治教育与动员;第二期 of 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第三期为确定全部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计划。(三)在计划“精兵简政”中当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

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骈枝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四)在“精兵简政”中干部的调整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应当特别审慎注意。抽调大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党校抗大学习,不得降级使用;抽调大批可以造就的事务人员及杂务人员送入学校学习,对有专门技术的人才应调到其他部门工作或给以进一步学习机会;对一切编余人员及老弱战士与荣誉军人亦当有计划地安插,如经营各种生产事业。一切对编余人员采取漠视和轻视的态度,都等于犯罪。(五)爱护培养和节省民力,是“精兵简政”的中心问题,切实计划开辟各根据地敌后边区整理财政税收,发展生产事业,厉行各种节约运动,严格注意公粮保管及分配。通知还指出,华中局及军分会为了全盘讨论并确切规定全华中“精兵简政”方案起见,将召开华中建军会议,各师各区应将全部材料和方案提到建军会议作最后决定。各战略单位应以“精兵简政”工作为冬季的中心工作任务,不得有任何忽视,或籍口拖延现象,并按月向此间报告,以便转报中央并交换意见。预计明年1月至2月完成华中全部精简工作。

同日 陕甘宁边区简政委员会召集的简政座谈会结束,前后讨论时间共计一周,各级政府的机构、制度、职权、干部及关系等等问题,均就简政精神进行详细讨论,其中尤以乡级讨论最为周详。现正就边府至区乡各级政府所反映的材料及问题,分组详研实施方案,供给边府作为决定简政事项的参考。

9月27日 林伯渠致函《解放日报》编辑部:“本月23日我在简政调查会上的谈话,主要意思是说明这次简政,除了进一步减

政,还须同时在政权工作中达到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精兵简政不就等于裁兵减人’这句话,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若干同志鉴于前次简政的经验,认为简政只是减人,所以我的谈话特加以说明。然而简政首先就是要减政,换句话说,就是要减去非急要的政务与不必要的人员,这是无疑义的。在这方面我们至今还没达到应有的成绩,这次简政仍须加以贯彻。因此,贵报发表我的谈话时(二十四日本报),标题为‘简政不是减政’,是同我的谈话的原意不符的,是同简政精神相冲突的。为了免去误会,希望将我这几句话当作声明,刊布在报端为感。”《解放日报》已于9月26日刊出紧要更正:“二十四日本版第一条消息标题《简政不是“减政”是提高工作效能》,系《简政不只是“减政”且是提高工作效能》之误。”并于28日刊出林伯渠来函全文。

9月29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日根据地民众团体的性质和任务》。社论指出:“人民团体的领导和工作,应当是统一的。边区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一个组织可以办工人、青年、妇女各种人民的事情,就可不必分立门户,各树旗帜。组织与领导的统一,可以增加工作效能,同时又可以节省力量。这是就区级以上而言。在乡村中,各种不同的人民,还应保存他们独立的组织形式。如妇女可以有自己的纺织小组,青年学生可以有自己的学生会,工人可以有自己的工会等。但这些组织,既不必强求划一,也不能由上而下机械地加以规定。组织形式应当由实际工作的内容来决定。”“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正在认真地彻底地推行着。民众团体的整顿,也是根据着这个原则的。”

9月30日 新华社电讯:晋西北贸易局银行系统为彻底进行

“精兵简政”，克服头重脚轻的现象，总局已计划对现有组织、机关、干部、资本重新予以全面的调整与配备。对今后业务的开展，本“精兵简政”原则，亦应有所改进，故决定于最近召集各分局长、银行经理、协理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并具体布置银行贸易局的“精兵简政”工作。

10月3日 新华社电讯：山东党政军各机关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紧缩机构减员一半。电讯说：《解放日报》这次关于“精兵简政”的社论，已引起山东各界的极大注意。中共山东分局，特指示山东党的各级组织，应以斩钉截铁的精神，坚决执行。并决定分局一级机关，在10月底全部完成，然后深入至全省。《大众日报》亦著文加以论述，称之为《再不允许迟缓的一个政策》，对于过去山东部分地区，明简暗不简，上简下不简，前方简后方不简的坏倾向，痛加批评，号召各级党的机关彻底纠正。现在分局机关精简工作，已大致完成，人员减少百分之四十，勤务员全部取消。分局部长一级干部的私马亦将取消。机关支部工作，由组织部宣传部分别直接管理。各部门的分科，尽可能的合并。此外动员警卫部队一个班的战士，参加了主力。第一一五师直属队，亦在师直党代表大会后，断然精编，共减少人员百分之××（原件如此——编者），骡马百分之七十七，佚子百分之六十，单位合并百分之五十五，杂务人员百分之七十九。减去之牲口组成完全群众化的运输队，从事运输生产工作。第一一五师教×旅精简后，旅直减少非战斗人员百分之五十七，单位合并百分之四十，除首长外，马匹一律取消。裁去之人员，一部参加生产，一部充实连队。该旅还提出三大号召：第一、实行劳动主义，生活要简单朴素；第二、人人要当家，每个人都要替公家打算盘；第三、发扬互助友爱。八路军滨海军分区及中共滨海地委机关，

亦于日前实行合并,增加地方武装工作及敌伪军工作干部,并以所减干部三分之二,充实下层工作。此外,省战工会,为深入领导,决定与某专署合并办公,以某分区一切政令实行的经验,推动全省的工作。

10月4日 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在某地举行精兵点验,参加点验者约数千人,阵容庄严。点验结果,军事方面,四大队、野政供给部、司令部第一。卫生方面,特务团、野政卫生部占先。

10月5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兴县“精兵简政”工作已开始进行,预计10月即可完成,现正在深入动员中。县级干部对“精兵简政”,经动员之后,已有深刻认识,一般干部均要求到区村工作,如县府某科长要求做村长。另外兴县决定于10月初训练全县县区村干部,筹备届时进行全县精兵简政大动员,着手进行区乡精简工作。

同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神府各界人士,对“精兵简政”政策极为拥护与称颂。记者遇着一位荷着锄头的老汉,他很惊奇地问道:“有人说八路军没有办法,才实行精兵简政,我真不敢相信,我觉得实行精兵简政后,八路军更有办法了,一个顶一个,打仗做事都很精干了。”贺家川士绅李先生,在土地革命前做过好几任区长,他说这个政策很好,人员少办事却很多,谁能不拥护这个政策呢。神府很高明的医生某氏是县参议员,他非常赞成“精兵简政”,他说:“贯彻精兵简政,节省了人力、物力,工作还不受影响,这是政策我是极端赞成的。”现神府机关团体“精兵简政”已进行两项,第二次较第一次更彻底。根据裁减编并原则,县上每科减为2人,区上只留2个助理员,群众团体减去原数三分之一。裁减人员,

均已适当安置,分派至区村工作的干部,工作情绪甚高。

10月6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日前志丹县召开县务委员会检讨8个月来“精兵简政”实施情况,大家多认为尚不够彻底,各种工作制度的制订及工作效率的提高,依然无显著成效。某些干部对于“精兵简政”认识尚不够清楚,每当组织机构调整或干部重新配备时,均有不少干部觉得自己不能担负新职,呈请辞职,影响工作颇大。县务委员会决定重新调整组织机构:(一)加强秘书室(按目前该室仅有秘书、文书各一),增设助理秘书及管理员各1名,俾使秘书能够摆脱日常琐事,专司襄助县长掌握政策,及使全县性的工作研究、总结、指示、汇报等,能经常迅速有系统的进行。(二)增设司法处检查员,以免拖延案件的解决。(三)撤销保安科下的警备队队部,因该队部的设立,反而增加工作上的阻碍,撤销之后,还可减去指导员及勤务员各1名。(四)取消通讯站,由一科兼理,因该站特设1人,每天最多工作仅有半小时。

10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简政要从思想上贯彻》。社论指出,过去政府两次简政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最近政府各厅处院为简政所进行的检查工作又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如果不先在思想上贯彻对简政的认识,那末,在实际上就无法使简政工作贯彻。在思想上有什么东西阻碍简政贯彻呢?首先是对简政在今日条件下之重要的迫切的意义,不了解或了解不足。其次是对简政缺乏全面的了解。再次,阻碍简政贯彻的还有存在于我们一部分同志思想中的那种只从局部出发而不照顾全局的片面观点。再次,还有存在于我们一部分同志思想中的所谓“正规化”的问题。最后还有一种习惯的传统的思想,也在我们一部

分同志中阻碍其对简政的彻底认识与执行。社论最后指出：现在党与政府都在准备积极贯彻“精兵简政”，根据过去经验，要贯彻“精兵简政”，首先就必须求得全部干部在思想上有明确的一致认识，所以我们提出上述各点，希望大家注意与讨论。

同日 新华社鲁中电讯：山东省战工会在第四次常委会上通过各级政府精兵简政新决议一件：第一、取消同一地区类似性质的重复机关；加强村、县及行署三级的机构，县以下区村两级，则着重政令之推行；干部配备，根据精简原则及工作需要而定，不普遍裁减。第二、行署主任常驻地区，不设专署，由行署直接领导县；如行署临时移动，则由行署主任或其他适当人员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留原地区督察工作。第三、一般的专署（即非独立战争区）须兼理一个县。第四、为适应各地环境，专员区所谓各县分为一、二、三等县，并分普通与特种县两种，根据地区之广狭及敌我力量之对比而定。县以下之区，分为一、二两等，重要地区可设特种区。一般的区，为区长、副区长、助理员各1人。区政府的财粮经建工作，集中于县的征收处及经建工作队，区的文化教助理员，改为中心小学校长。

10月10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靖边县委研究简政，对县区乡机构提出意见：（一）在县政府方面，应添设政务秘书1人与事务秘书分工工作，在政务秘书下设研究室，由3人至5人组成，专做地方情况、政策法令及实施问题等的调查研究。而在事务秘书下设视察室由3至5人组成，任务是视察各区乡工作实况，并传达与参加各科动员工作。各科酌量减少不必要之人员以充实视察室。这样才能建立正规的工作制度，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人尽其用，位无虚设，以收最大效果。（二）在区政府方面，在区长下设文书1人，管理上下文件，及一切帐目。设巡视员2人，任务为检查乡级干

部对政府法令之认识,及其对工作的态度及实施情况,以纠正过去乡级干部对政府法令之模糊认识与对工作之应付态度。(三)在乡政府方面,应设正副乡长2人均脱离生产,并有一定办公地址。取消各种委员会(如优抗、文教、民事等),而将各委员会之工作规定为乡长之实际工作内容。行政村应划小范围,所辖地域最大者长宽不得超过10里,所辖居民不得超过45户。行政村下不再设行政干部。

10月11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各厅处院根据合署办公的需要,将各该部门人员尽量缩减到最低限度;由于政府设立了总务处,各厅、处均不设立总务科,各厅、处的公文处理亦由政府办公厅统一管理。

10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本地“黄河”旅,已着手积极布置整编,除令各部首先在整编前将其意义进行深刻解释外,将各部所有财物,彻底清查,精确登记,呈报处理,严防以多报少,造假账,打“埋伏”的现象,必须作到按级负责,按级检查,否则当予军纪党纪制裁。该旅还特别提出注意整编前、整编中、整编后三个时期可能发生的不良倾向,对编余人员作好安置工作。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酃县政府为把精兵简政政策贯彻到乡级政权中,决定举办乡长训练班,提高其质量与文化水准。第一期于八月开始,已于本月三日举行毕业式。此次参加受训乡长包括10个区,人数20名,均从在职乡长中调来。现县府决定继续办理第二期,轮流抽调乡长受训。

10月1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诞登的文章《山东怎样实

行精兵简政》。文章指出：山东根据地在今年一月间开始，有计划地传达和布置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迄今半年有余，已得到了不少成果。就以胶东、洼河两区来说，共计减少经费 393000 元；西海区专署简政后，节省经费 9230 元，粮食 228940 斤。具体做法是：一、关于改进机构提高效率。首先是缩小上层机关，充实下层领导。在党的系统方面，规定区党委机关工作人员与事务员为四比一；地委机关工作人员与事务员为三比一；县委机关工作人员与事务员约为三比一弱；分委只有脱离生产干部 5 人。在政府机关方面，除主任公署本身已实行裁员归并机关外，划分为甲乙丙三种不同行政地区。如丙等专署干部和杂务员共 40 人；丙等县府干部和杂务员共 33 人。区公所脱离生产工作人员共 8 人。一般专署又都兼理当地县政。除专员有马 1 匹外，其余县长以下，均不得有马。在群众团体方面，主任公署一级，规定职工会 3 人，农会 3 人，青救妇救各 2 人，共 10 人。专署一级，工农青妇各 1 人，共 4 人。县一级职工会 2 人（矿业区可适当增加），农青妇各 3 人，共 11 人。区级职工会 1 人，农会 2 人，青妇各 1 人，共 5 人。区以下干部一律不脱离生产。其次为减少层次，取消重复机构。中央山东分局各部门的尽量合并，东海区把金库贷款所合并于银行，不少乡公所取消，甚至依据对敌斗争形势，取消了专署及地委一级的领导机构，加强了主任公署和区党委对县的直接领导（如鲁南临邳区、抱犊固山区的取消等）。部队方面，原有 31 个指挥机关，减为 18 个；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单位缩并了百分之五十五。再次为提高工作效率，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的任务和关系，以及各部门的日常业务与工作制度，取消了不必要的会议，克服了事务主义的现象。随着机构的改进，干部节省的很多。山东分局本身人员已减少百分之四十，勤务员全部取消，部长一级干部的私马亦全部取消。胶东区专署，减去人员百分

之四十。西海区从专署到乡公所,减去人员百分之二十七。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减去人员百分之××,骡马减少百分之七十,佚子减少百分之六十,杂务人员减少百分之七十七。这些编余干部又都充实到下层(连队都充实到150人以上),加强乡村工作,或送入学校受训(如部队已有650名班长以上干部到军校受训),加强地方武装工作,或增调到敌伪工作部门,或调到生产部门,如工厂、合作社、农庄等。至于编余马匹,组成完全群众化的运输队,从事运输生产,以达到各得其所。二、培养民力。如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家庭手工业,发展各地兵工生产,发展公营企业等。在加强经济财政建设上,如强化对外贸易,广泛发展合作事业,厉行节约、严惩贪污等。三、克服缺点扩大成果。由于有些人还满足现状和被习惯所束缚,以及缺乏周密的详尽的布置,在精简实施中仍发生了不少缺点:如在认识上,将“精兵简政”只当作是裁员减兵,而忽略调整组织机构,加强科学分工及提高干部能力与工作效率。在调整编余干部上,缺乏政治说服,深入解释,及安插不周,引起有些干部恐慌抱怨不满(说“不要咱们了”),特别是妇女干部,从家里出来又要遣回,觉得是丢人。因此在今后进一步的实施中,必须更彻底地政治动员与教育,务使干部和群众都能了解“精兵简政”不仅是适合目前敌后战争形势和对敌斗争形势与组织形势的武器,且是保卫力量、坚持阵地、渡过难关的唯一道路。使得所有干部和人民,都能把这一极重要的政策,变成为自己的政策,而自己有责任的并自觉的来实现这一严重的政治任务。

同日 延安市政府召开会议,检查各部门工作,彻底进行整编。市府还决定,暂停整风学习,全体干部下乡,检查各乡工作,搜集有关整编材料。并传达各科工作与帮助乡府进行布置。

同日 新华社鲁北电讯:山东清河区清东县,“精兵简政”已获

初步成绩,该地第一次精简时,编余人员大部均送至政府收容,因此并未真正贯彻精简目的。此次再度精简,县府即具体指示精简方针及要求。现清东县 22 个单位,已合并为 10 个单位,全县共裁减人员四分之三,过去县府各科均有科员 14 人,现只留 2 人。编余人员十分之三参加武装部队,十分之二参加生产,十分之五受训。每人每年以节省 1500 元计算,全清东县人民,每年即可减轻 1 元的负担。机关短小精干,县府工作直接深入到村,一切法令均得到迅速下达,问题亦能及时反映与解决。

10 月 18 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边区吴堡县府在今春第一次简政中,虽曾减去区上行政助理员(由区委书记兼),自卫军营长(由保安助理员兼),县上保安科,一二科亦有减人。但在别的部门人员却增加不少,故简政结果,反有人员不足之虑;另外在工作机构及制度的改进上,亦未曾有明显的改进。所以该县最近正以最大努力,彻底实行简政。

同日 新华社晋察冀电讯:抗大二分校的“精兵简政”,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对四期教育的检讨来实行的。强调“提高教学质量,紧缩组织”。取消训练部改设教育长。连队教育情形直接汇报校部。合并政治教育科与宣传科为宣教科,使教育作业与课外作业一致,教员原则上使其有机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便于提高自己。连队上不设驻队教员,只设政治助教与军事助教。学员主要按文化程度编,高干科为便于管理,按原来在部队中的职别编队,但在教育上则分成高、上、中、初四班。

同日 新华社鲁中电讯:山东沂郯地区厉行精简,减调不称职干部。北沂水、沂南、蒙阴、边联四县共减裁人员 200 人。北沂水 7 月份执行精简时,由于干部认识不够,仅减去县区的杂务人员 40

人，政令依然繁重。此次重新精简，首先即着手检讨七月份的教训，重新深入动员。现县大队已减去四分之一，公安局减去五分之二，各区区中队平均减去三分之一，县政府全部机关共计仅余 40 人。同时在工作上亦有改变，如：（一）过去不称职的干部，掌握政策不稳，以致造成工作上的损失，现在对此等干部，或减或调，宁缺毋滥。（二）某某两区大部是敌占区，现决定将我占村庄完全划入根据地，群众情绪高涨。

10 月 19 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简政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出席开幕会并讲话，他在谈到边区的建设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军队有的还能自给百分之八十，将来可以作到自给百分之一百。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现在在各个系统中准备减去 1 万多人到生产中去，到生产中去同志应该被重视的。但这里有个故事：××部有个女同志，原来她的爱人是作政治工作的，后来调到骡马大队当队长，因此这个女同志就不爱他了。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要重视作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在这种情形下，女同志应认为是自己的光荣，应买花生欢迎他。这种人我说应有恋爱的优先权，女同志应首先和他們去谈恋爱。我们要奖励这些同志去管理骡马大队，去生产。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要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

10 月 20 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继续简政，为使领导

更加简便，行署特决定专区对县，县对区用写信代替公文命令，区对村直接用口头传达。同时加强县的权力，成立对敌斗争行动委员会，可以因事制宜，负责处理事件。晋西北五行政区，经精简后的干部，仅占原有干部百分之二十五，杂务人员仅占百分之二十。

10月2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转入生产中去》。社论指出：“精兵简政”，对于建设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说，有两重意义。消极的方面，是紧缩开支，节约民力，以便渡过难关。积极的方面，是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而这些人员一定要转到生产中去，扩大与发展生产事业。现在在“精兵简政”过程中，已经有一部分同志转入生产，而且还将有更多的人要转入生产，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最值得称赞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非常重视，甚至在现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形之下，在我们的机构“头重脚轻”得不可容忍的时候，还有人要求增大这些工作的机构，还有人要求脱离生产工作而去做这些工作；当党和政府要人们转入生产时，有些人却不甚愿意，对于转入生产的其他同志则表示轻视的态度。这实质是剥削者贱视生产、践视体力劳动的意识的残余在作怪。“精兵简政”必须实现，大批的人员必须转入生产，头重脚轻的现象必须终结。在这个时候，应该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应该造就尊重体力劳动、尊重生产工作的社会舆论，应该给与那些尊重党与政府的分配、乐意转入生产的同志以最大的光荣，因为他们与其他同志一样忠实执行党与政府的决定，因为他们没有剥削者的思想意识的残余。

10月22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清涧县在一、二次简政以前，县府工作人员共63人，简政后人员减为34人，共减29人。因

病、老、衰弱退职的有 9 人,其余干部均加以适当的安置。人虽减少,工作效率则相对地提高。据该县黄县长谈:该县在前次简政中,基本上有收获的,主要的是科长工作有了显著的转变,不过减人以后稍感困难的则是司法处的保安科,人亦有不足之感。另外关于粮食及财政制度,简政后成绩还不显明。今后在彻底简政的准备中,曾讨论如下问题:一、加强科级领导,除了具有全面性的大事要经过政务会决定外,一般问题由各科自行处理,不需要把一切事都放在县长身上,这样又可培养干部独立工作的能力。二、在动员工作上,必须负担的数目字一定要达到,但是动员的名目、次数应减少,突击性和临时动员太多,影响干部的经常工作,群众亦嫌麻烦。

10 月 26 日 延安军事机关后方勤务部与中共中央管理局“精兵简政”方案,均已具体执行,军事机关原有之后方勤务部已经取消,原来机构并入中央管理局,改设中央管理部,连裁减及分别给别的机关,约可减去 2000 人,目前平均每人每月需生活费 500 元,精简后每月即可节省 100 万元。两大单位合并后,虽由一个单位统一供给,因范围已缩小,行政方面没有困难,今后因集中领导,工作统一,工作效能亦可大为提高。

10 月 27 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二专署精简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实行精减后,专署一级干部减去百分之六十五,减下干部均已根据需与个人兴趣,派至下层或参加生产工作。现专署除继续商讨其它部门之精简外,正研究领导机关工作制度等,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另报道:晋西北临南简政工作,已按上级指示开始进行。县府特提出“好干部要到村政权及武装工作中去”,许多好干部深入下层,如某区派 4 个县区干部当村长,以加强对敌斗争。该县精

简先由干部开始,然后再推及杂务人员。经此番精简后,临南县级机关可减少人员百分之四十五。另报道:晋西北兴县贸易支局、税局与西北农民银行分行,决定合并,更名为兴县贸易支局,工作人员较前减少百分之五十五。

10月28日 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10月30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教育,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作八九批陆续送来。”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68位老英雄,昨日捐枪今日生产,都是为的打日本。他们在精兵政策的号召下,现在都集拢在“老人队”里,其中有的编制筐篓,有的做挂面,有的磨豆腐,也有开铺子的、上山砍柴的、自己烧木炭的,还要生产更多的东西,把产品卖出去,改善自己的伙食。这些老人们从来是不服“老”的,有一位老同志在整编的时候,听说要把他编到“老人队”去,他的脸都气青了,他发恨地说:“好小子!谁说我老,就来拼命赛跑吧,看谁个掉队?!”他说八路军是他的家庭和学校,他死也不肯离开它。当指导员向他们详细地解释了“精兵简政”的道理后,他们想通了,他们拭去横流在面部的热泪,轻轻地从身上卸下他们亲手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来的三八步枪。现在他们时常背着柴火到市镇上去出售,他们哼着健康的调子:“昨天参加队伍,赴汤蹈火,为的是抗日;今日离开队伍,减少消费,增加生产,也为的是抗日。”从编队到现在虽

只有一个多月,由于“老人队”自己和各营弟兄共同努力,老人们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规了。

同日 陕甘宁边区原属工业局领导的利华第一纸厂,在此次精简中,奉命改归中央教育大队管理,并与该队原来管辖的延园纸厂合并。本日利华一厂迁入延园纸厂,延园厂全体工友整队欢迎,厂方并组织联欢晚会。两厂工人原来待遇不同,利华厂是工资制,延园厂是津贴制。这次改编后利华厂全体工友因顾及整个经济困难,完全放弃工资制,改领津贴。

11月2日 陕甘宁边区清涧县精简通讯组织,200人转入生产。在简政以前清涧县共设20个通讯站,每站距离4里,有民差10人按日轮流递送,此办法除了因组织庞大,浪费人力财力外,还不能按时到达,甚至有些信件公文根本遗失,或被破坏分子偷拆,缺点甚多。现决定缩小组织,将全县20站的民差200人,完全取消,改由3人专门递送,每日均有来往县与区,区与区之间。此办法实行后,首先提高工作效率,过去一封信由县府送达最远的一个区,需时10天,而现在最晚3天即到,同时因有专职,信件也不会遗失,或被偷拆。其次在节省人力财力方面,过去费用以全年7200人每人30元计算,共216000元,现在3人吃饭穿衣完全在内只15000元,对于节省群众财力,甚为可观,而尤其为群众欢迎的,是200人的劳动力,可以投入到生产中去。

同日 新华社山东电讯: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山东军区直属队及大众日报社等机关的精简工作,在分局精简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已于9月中进行完竣,并分别点验完毕。精编成绩(一)部门合并后,伙食单位减少二分之一,每月可节省办公费1044元。(二)非战斗人员及杂务人员已大为减少,计分局减去七

分之二,师直减去七分之三,军区直减去六分之一强,战工会减去二分之一,抗大减去七分之三,大众日报社减去五分之二。(三)各部公用骡马大部取消,各机关科长以下干部,行李一律自背。(四)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一般为二比一,军区直为五比一。关于编余人员的安置:(一)老战士、工农干部未住过学校者,送学校受训。(二)充实各战斗部队及下级机关。(三)山东籍贯及身体健壮者,充任地方武装及民兵干部。(四)老弱残病者送后方生产部门或安置回家。总计编余人员充实连队者占二分之一弱,送后方生产部门者占四分之一,分配其它工作者占四分之一弱。安置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利用集体讲话,个别谈话等方式说明“精兵简政”的意义,征求本人意见,发动欢送慰劳,并分别发给护照、荣誉军人证、路费、粮秣等。从各方面周密照顾,决不草率从事,因此编余人员情绪均好。关于经验教训:(一)深入地动员与专门地组织,是完成任务的基本保证。(二)类似工作性质的单位部门,必须坚决合并或取消,否则人员不能减少。(三)在动员中要强调爱护公物,一切东西属于公家、属于党,以防止带人、带枪、带马、损害公物的现象发生。(四)精简后,立即着手组织的整理及工作的交代,以免工作混乱。现在分局精简委员会,正着手提高工作效率及推动其它战略区的精简工作。

11月4日 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两大基本任务,即发展生产和干部教育、提高工作效能。为此,必须彻底实行精简政策,必须精简任务和业务,必须精简机构和人员,必须坚持7500人的规定,还必须注意物力、财力和畜力的节约。而要彻底实行精简政策,必须纠正不顾边区具体条件和目前政治情况的“百端

并举”的思想,纠正各种各式不合实际的“正规化”的思想,纠正“简政不是减政”的思想,必须克服对精简政策采取应付态度,甚至采取抵抗态度的错误。总之,无论如何要把精简政策实行到底。报告还指出:改善领导作风以提高工作效能,是简政整政的重要目的之一。要克服只顾表面不顾实际的形式主义,只从公文里兜圈子不从实际上考虑问题的文牍主义,特别是忙在小事丢掉大事的事务主义。同时要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以达简政整政的目的。

11月10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高领导改造作风》。社论在指出边区党的领导作用的成绩后,着重指出了弱点,主要表现在许多党的组织对于领导的任务和作用,没有正确认识,日常业务没有建立,应作之事有许多反没有作,每天忙的有许多倒是不必管的。如代替政府的工作,如专管柴米油盐的日常事务。有的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要参加八九种委员会,仅仅开会,他就忙不过来了。因此,政策问题无时间处理,调查研究也不能进行,工作老是在一个地方打圈子,难以改进。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天天在日常事务中忙得不亦乐乎,没有时间来处理政策问题。结果,人虽然忙,但群众的情形也不了解,群众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这样下去,就要走到脱离群众的道路。脱离群众,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就是蜕化为官僚,这种官僚主义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家都反对的。一种是间接的,是人所不注意的,对于负领导责任的机关来说,是更危险的。不了解情况,不使党的政策在一定的环境中具体化,不检查政策执行的程度,其结果,同样是脱离群众,其实质也是官僚主义。必须明白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应和政府建立正确的关系,不代替政府工作,而且要从日常琐事的泥坑里跳出来。它应当对自己工作地区及其周围的情况进行

调查研究。它应当研究党的政策,规定实现这些政策的具体办法。它应当在实际的执行中来检验这些政策,使这些政策得到推进和发展。它应当定期地、有系统地审查党的决议执行的程度,总结经验教训,以教育干部和党员。它应当掌握干部及其思想的倾向,进行思想教育与思想斗争,把整顿三风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

同日 边区神府县召开区长、区书及各区抗救主任联席会议。县长在会上作精简问题的报告,宣布神府在第三次精简后,现今脱离生产人员(包括保安队及警卫队)只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一。

11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精兵简政在一一五师教二旅》的文章。文章说,在“精兵简政”这个政策执行以后,首先改变了教二旅的同志对抗日根据地的观念。在这之前,他们中若干同志认为,建设根据地只是地方上的任务,因此对根据地的爱护与参加建设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认识的。这之后,教二旅树立了巩固与建设根据地的观点,他们非常爱护根据地的民力与节省民力了。仅今年4月和6月的统计(缺×团)他们就节省的背柴背粮的民力6129人,如果按照每人每半天工资3元计算,就节省了18387元;此外自己磨粮373119斤,按照磨100斤工资6元计算,那就节省了22387元。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到现在共开荒800余亩,自己的菜地有154亩,植棉12亩,植树2292株。今年帮助群众春耕567亩,运粪532担,在麦收时帮助群众收麦27458亩,挑麦9094担。从去年7月到本年6月,全旅一共节约了6155889元。在同样的时间里,计生产鞋子15820双,水壶2691把,被子6398床,纱布98匹,帆布168匹,喂猪106条,鸡2181只,羊48头,收菜64033斤,此外他们还收集了破铜烂铁9万余斤。说到部队本身,在“精兵简政”执行以后,庞大的机关缩小了。这样一方面使机关精

干,增加了同敌人周旋的灵活性,另一方面缩编下来的人员补充到连队去,军队的战斗力更加提高了。全旅精简的结果,计减少办公费 610 元,教育费 2040 元,津贴费 4080 元,医药费 1632 元,鞋袜费 8602 元,伙食费 8002 元,被服费 20400 元,粮秣费 583078 元。在执行“精兵简政”的过程中,还召开了全旅党代表大会,与落后意识作斗争,坚决反对干部的地位观念,骄傲态度,把极少数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给予撤换职务的处分。之后还大胆提拔了 292 名新干部。连队中支部的堡垒与核心作用大大地提高了。如在最近一次的青口战斗中,我们有 18 名战士被 500 多敌人包围,由于党员的英勇,提出了不投降不交枪的口号,最后全体战士光荣牺牲了。从教二旅执行“精兵简政”中证明了:党提出的这个政策是完全必要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在日益艰苦的敌后斗争中,在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困难下,这个政策的执行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同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兴县“精兵简政”工作初步完成。计县区干部及杂务人员减去百分之五十四点三。村级脱离生产人员减去百分之四十二点四。此后全县一年可省公粮 1313 石。现区级以上干部,按决定均重新编整,干部亦整编妥当。好些同志,都自动要求深入下层工作。县级政民干部分配至区上工作者,共有 21 人。县区干部到村担任工作者 62 人,其余到工厂参加生产,到合作社公营商店工作,到学校受训学习,还有向政府贷款作生意的。整编后区村干部质量业已增强,今后主要为如何增强工作效率,进行节约,爱护民力,转变工作作风,改善领导等。

11 月 17 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

同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神府群众团体，又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结果共减缩原有人数百分之三十五。保德区乡精简工作也进行完毕。据一、三两区长谈，工作人员减少二分之一，开支可省五分之三，但工作效能并没有丝毫减弱。苛岚中心区抗联，二次精简工作已进行完毕，计减缩人员四分之三，所余均为合乎地方化群众化原则，且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者。关中驻军某营开始精兵教育：第一、革命军人以服从革命利益为天职；第二、党员须服从组织之调动与分配；第三、亲密团结，发扬友爱；第四、党员应起模范作用。

11月19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新华社精减效能提高。新华社总社电台工作人员经此次精简后，共减少四分之一。在译电部门，最近因各分社及边区各地工作开展，中文译电组报务稍嫌繁忙，因此有个别同志感到学习时间少，要求增人。但目前正处于彻底实行精简中，经过全组同志讨论认为过去工作精神不够集中，同志中间彼此照顾还差，影响工作效能，因此得出一致的意见：不需要添人，现有的工作可以愉快地胜任。会后，工作情绪高涨，第一晚5人译电量等于过去10人的工作成绩，效率提高一倍。现日文组、英文组亦正在响应，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11月20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军区卫生部所属各部大加缩编，计卫生部、手术医院、各所、药厂减去人员百分之三十五点七八；卫生学校减去人员百分之四十九点四一；卫生部直属队减去人员三分之二。此外将原来的部、处适当合并，可取消伙食单位4个，估计每月可节省粮食16946斤，菜金合法币1万元。编余人员除编制一个正规连补充前方外，其余按具体情况，分别安置。

11月21日 23日 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12条。在讲第三条时，毛泽东说：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这一条是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如“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地提出来的还是确有需要呢？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确当的，只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才适当，这是现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我们加以周密分析提出的口号。但是“精兵简政”过去不只进行过一次，为什么进行得不彻底呢？就是因为没有把具体的条件加以周密的分析。比如我们边区有多少人，要穿多少衣服？这中间是有矛盾的。老百姓少，公家人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一方面要“精兵简政”。究竟今天能够简多少？政府系统、党的系统、民众团体系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精密的分析。不能那样糊里糊涂，说现在要“精兵简政”了，就简。以前简过好几次都没有简彻底，就带了一点糊里糊涂，没有加以周密地分析。在讲第十一条党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时，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精兵简政”也算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目的要明确，要达到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因此，思想一定要统一，“精兵简政”的目的就明确了。

11月22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延安县委组织部长王国华的文章《精兵简政中关于处理干部的两个问题》。文章说：延安县曾进行过两次“精兵简政”，在精减的百余名干部中，有80余名的县区乡干部转入了生产，另外一部分县区干部调到区乡工作。最近，当“精兵简政”政策要彻底贯彻的时候，转入生产的干部一定很多，

干部调动到下层工作也一定不少,我们的组织工作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必须注意研究,使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办得好。文章介绍了延安县处理这两个问题的经验,主要是一个一个和他们谈,一方面说明“精兵简政”的意义,另一方面使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内心的话讲出来,若有什么困难,必须具体解决。通过工作,大部分编余干部都能服从组织分配。如柳林区李善德同志,一位“南梁时代”的老战士,曾任青化区委组织科长,现在回家耕田,担任乡的支书。过去他家里3口人吃饭,全靠优待过活,一年政府要给3石多粮食,现在种了14垧地,1月还能抽出10天工作,这样,家里不仅不要优待,而且生活也比以前好,今年可以打粮食9石,还能交1石公粮。过去干组织科长工作搞不好,现在当支书工作很顺手,拿这件事说,对公对私对群众对自己都是好的。文章最后讲了四点:第一、根据延安县第一二次精简干部的经验,要使干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就必须在党、政、民之间,实行干部的统一配备,统一管理,纠正过去“党是党,政是政”的宗派主义残余,打破一切界限,把每个干部配备到他最适合的岗位上。第二、对于国家干部,必须慎重处理,对于被减干部的实际困难,定要负责解决。如把一位有病的老工会主任,随便辞回家而又不管的办法是不对的,对个别有病的干部,应该负责治疗或设法妥为安置。对于所谓“降级”干部,必须讲清这是安置他到更适合的岗位上去,要他对党有更好的贡献,而不是什么“降级”。第三、对于回家生产的干部,应该注意特殊的教育,使他们在政治上不仅不倒退,而且能进步。县区党政对于这些回乡干部,要保持经常的联系,让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对他们进行谈话,鼓励其参加乡村工作。第四、“精兵简政”政策也要向群众宣传清楚,不然,有些群众会发生一些不好的现象,和他们为难。

同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军区某主力团，10月中旬以来，已有90余人返回到生产战线上去。愿意回家或在驻地安家者，均给以回家费或安家费。每人各发新鞋一双，在新棉衣未领到前，尽可能在部队中抽出半新旧的棉衣给去远方的同志（如愿意等新棉衣者，可以等候），每人并发给退伍证，抗战胜利后如有所需，可以持此证来团部，因此退伍者，均甚欣愉。同日，新华社晋西北又电讯：晋西北某团于本月4日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制定办法，厉行节约。在严禁粮食浪费方面：（一）前一期公粮算清，再拨下一期公粮（营向团一星期报告一次）。（二）吃非自己单位的伙食时，须给粮票。（三）不得把粮食当作生产贸易资金，如开粉厂、喂猪等。在经费开支上，应按一般生产水准，不得特殊，任何人不准动用公款（自力更生的钱在内），不管战士或干部，每人的钱严格登记，干部有病保健费不够，而必须另外开支时，应经团级负责人以上的批准，吃补药打补药针，亦经团以上的批准。开会用钱，有一定限度。取消空洞的不必要的书面报告，多做口头传达，以省纸墨。晚上早睡，以节省灯油。关于爱护公物方面，决定交旧换新，损坏公物必须赔偿，如不赔偿，则以纪律制裁。

11月27日 为配合精简工作，检查整风学习之效果起见，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学委会特发动一次思想大检查。首先由每个人写思想自传，内容为整风前与整风后思想之转变过程，对此次“精兵简政”的认识，及如何改进自己的思想意识等。然后由学委会从自传中抽出典型例子，在小组会上进行讨论，使检查更深刻和全面化。规定此种自传在月内完成。

11月28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临南县各级政府精

简工作,已告结束,干部及杂务人员,减去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全部可节省粮食 10 余万斤。仅县区级政府人员,可省衣服、津贴、菜金费全年 3 万余元。10 月中旬开始施行简政时,由于宣传动员不够深入,曾引起部分干部不安心,个别的甚至认为简政是洗涮干部,以后经过耐心的解释说服,大家对简政才有了正确的认识。有的说:“下层加强了,上级就容易推动。”有的说:“简政后真给老百姓省下无数的东西。”现临南各级政府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如很多村长都能独立地解决群众当中的问题。接敌区政权,能自动领导群众与敌伪斗争。特别在征粮工作中,对掌握政策贯彻法令比去年强得多了。群众都说:“区长也当了村长,从前管理几千户,而今管理几百户,一定会管理得更好。”

11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与国民党谈判和我党“精兵简政”的问题,他说,我军过去共有 50 万,经过几年抗战及现在“精兵简政”后,尚有 20 到 30 万人。我同郑延卓(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军少了,国民党就好了,日本更会进攻,对国民党也不利。郑延卓说,新四军已有国府命令不能恢复,我说可编入八路军,原八路军编成 3 个军,新四军编 1 军,共 4 军 12 师。如国民党承认 4 军 8 师及独立旅也可以,说明我们实行“精兵简政”。最近,彭德怀同志也懂得这一点,提议调 1 万余干部到后方训练。因此在编制上我们不要死争。

11 月 30 日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并告陈毅、饶漱石电。电称:“你们干部缺乏,因交通阻绝,无法派来。抗战趋势,全军将大减小,你处亦应准备在明年秋冬及后年春夏缩小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时量小质精,干部就

够用了。”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许多人谁也不服谁，而不能承认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环境完全矛盾着，如果再不改变，简直是自杀政策。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认真地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中央统一领导决定及“精兵简政”政策，在今冬明春予以实施，以便对付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指示对如何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相类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有些可以合并的分区加以合并。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手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不是小小的不痛不痒的）。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情况特殊者例外），作战损失后两团并为一团，两营并为一营，两连并为一连，旅的架子也可取消一些，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全军57万准备缩至20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一人兼做两人、三人、四人之事，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令经过下层锻炼。军队（包括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四分之三与四分之一的比例。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提倡降级使用干部，号召干部安心做下层工作，这不但因为目前环境需要如此，也因为我们的很多干部降一级或降两级使用更为恰当。学校有些停

办,有些缩小,有些改为训练班。各地干部凡可能来延安的,由中央局、分局筹划派送大批干部来延保存学习,保存干部仍是目前要注意的任务。三、干部相互间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严格地痛快地清除自己的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而被分配到下级的别地的别部的或学习的新岗位去。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应谁也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四、实行时要预先周密研究,不要草率从事。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已在开始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政策,某些机关的调整已经完成。专署与保安科等机关合署办公。此次住处迁移,各机关以及所有干部没有发生任何本位主义以及其它不良倾向。如迁移机关对于门窗纸张特别注意,没有丝毫损坏,真正作到了“在迁移中不浪费一文钱,糟踏一点东西”的号召。另外还报道:关中分区在精简中,整顿学校,改进国民教育工作。共取消了素质较差的完小 10 所,合并了距离较近的普小 33 所、完小两所;减去教学能力薄弱或不宜于教育工作的教员 54 名,同时补充了新的教员 31 名,目前全分区共有完小教员 53 名、初小教员 119 名,教员文化程度以完小或高小程度的最多,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中学以上程度占百分之二十九,其余占百分之二十一,至于等于初小程度的教员,经整顿结果仅余 7 名。

12 月 3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李鼎铭作 8 个月来政府工作与“精兵简政”方案的报告。报告首先谈到 8 个月来政府工作的成绩:(一)实行精兵简政和加强民众武装。除精兵问题另有报告外,在加强民众武装方面,整训了自卫军,整顿了哨站。简政方面,进行了第二次简政,在精简机构人员方面都比前

次进步,但不够彻底;于是又经月余研究制定了最近一次“简政实施纲要”。这是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方案,正待今后实现,另外同时还进行了整财和整军。(二)贯彻“三三制”建立制度。有22个县完全实现“三三制”,8个县经过今年乡选后共产党员的比例已接近了三分之一。(三)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经济建设。今年55万亩开荒计划,在开秋荒后即可完成;产量上虽不能达到预定数额,但对于军食民食仍然有充分保证。植棉计划已完成10万亩。工业生产都超过了半年前的产量。难民工厂织布一月份是352疋,至八月份增至620疋。振华造纸厂造纸一月份是233令,至六月份增至332令。并有一部分产品如毛毯、肥皂还可向外输出。发放了14个县的耕牛、农具、植棉、青苗、家庭纺织等贷款,共448万5千余元,购买了2670头牛,4980件农具,解决了8000多家农户的困难,增加10万8千余亩耕地,多打了万多石粮。(四)加强财政工作厉行节约。完成了统筹统支计划,保证各系统的开支供给,公债开始还本,做到不官价买粮借粮,另外进行了食盐统销。开源节流方面,整理了各项税收,9个月中税收额超过了全年任务的两倍半,减低机关人员食粮分量为一斤三两,实行粮票制等。八路军今年每人生产平均3573元,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五)加强教育行政,……等等。其次,报告谈到8个月中政府工作的缺点问题时,李鼎铭指出:“精兵简政”还未完全实现。人员方面,上层多而不精,下层又不够强,奖惩制度未曾确立,作风上还有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妨碍了工作效能的提高。上级政府对下级工作没有经常检查,职责规定不明,权限不清,以致领导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各机关多各自为政,各行命令,以致到下层执行中往往不免互相抵触等。李鼎铭指出这些缺点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兵简政”政策没有贯彻,并申述简政之任务就在于继续过去成绩,纠正

现存缺点,以达统一、精干、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之目的。他号召今后要贯彻简政委员会提出的《简政实施纲要》,强调指出政府目前须集中于两大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并要将脱离生产人员减至最低限度。

边府第三次会议于九日结束。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年3月3日公布)。

同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行政公署政务会议决定,为厉行精简,将原三、四两专区合并为第三专区。同时建立晋西北财政经济建设委员会,目的在于研究、计划、指导与加强晋西北财政、金融、贸易、生产建设等各种工作。在行政公署政务会议领导之下,使上述工作部门的工作步调一致,并致力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以适合目前之具体要求。

12月4日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在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政府委员会第二日的会议上作整军报告。报告说:整军就是整顿军队中不正确的思想;并对于军队对于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足,对建设根据地事业的长期性缺少认识,对政府不够尊重以及自由主义的种种不良思想作了检讨。报告还总结了遵照朱总司令屯田政策、兵工政策所进行的部队生产的成绩,指出明年度依照政府生产计划制定部队生产计划,还说明了精兵与编制问题。并指出部队今后应加强训练,以整风教育、改革教育与业务教育为中心,一面生产,一面训练。今后要号召边区驻军要拥护政府爱护民众,拟规定明年2月为拥政爱民运动月等。

12月5日 延安《解放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邹群锋的来信与编辑部的复信,谈《精简中的干部配备的问题》。邹群锋在来

信中提出精简中在干部配备问题上有3个困难问题：第一，配备干部中，各部门都挑选较强的干部留下，把弱的调出去，这样配备的结果，干部弱的部门还是无法解决。第二，干部不愿离开原工作部门，党的工作干部不愿到政府去，又不愿到群众团体去，如派去就认为组织上不信任他了，自己“吃不开”了。第三，把高一级的的工作，降到低一级去，就对工作采取应付态度，或消极抵抗不愿工作。同时还有同级干部降到下级去，就瞧不起同级工作过的干部，不受领导。来信还提出了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建议。编辑部在复信中首先肯定了邹群锋在来信中提出了目前组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确是直接影响到“精兵简政”的正确执行。然后讲了两点：第一，是干部统一管理的问题。指出这次规定的“精兵简政”的内容之一，是要实现领导一元化，要做到干部的统一管理。就是说各系统内的党员干部，必须一律集中在党的领导机关，干部工作的调动、了解、考核和教育等，统归党的领导机关管理，不容许有“好的留下，坏的送走”的本位主义的存在。第二，是纠正某些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落后意识的问题。要纠正认为只有在党的机关中的工作才叫党的工作，而政府工作、群众工作、文化工作、经济工作等等都不是党的工作的错误观念；要反对个人主义、地位观念等的落后意识。复信最后说：干部配备过程，是个对干部的实际教育过程。我们的干部工作者，对每一个干部应该慎重处理，从原则上和实际上解释清楚。除非个别的顽固的以外，尽少采用简单的组织制裁。把每个不同的干部，安置在最适合的岗位上，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是我们干部配备的目的。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为执行精简方针，后勤领导下的西北商店与新中国商店已经合并，连各分店，共减少100余人。两大商店合并后，人力、资金均已集中，领导方面亦较便利。过去分店

太多,资金分散,营利无多,成绩太小。合并后之营业方针,除推销土产外,兼转运日常用品。

12月6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华池县警卫队人数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一半,可是生产任务并未减少。另又报道:志丹县群众团体合并组织,将原青、工、妇合并成“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人员由18人减为8人,减去10人;其中准备受训者2人,调其它部门者4人,休息者2人,回乡工作者2人。

12月10日 新华社鲁南电讯:鲁南党政军机关,上月间根据上级指示,再度进行第四次精简,较以前三次更为彻底。仅区党委及军区直属队,减少3个伙食单位,减去人员百分之三十;减少工作部门百分之五十;减少马匹百分之七十五;勤务员全部取消。大批干部充实下层及连队。后方机关亦减少5个伙食单位。减裁干部,均各得其所,情绪亦好。现各机关已更加精干,工作效率更加提高。

12月11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专员、县长联席会议,李鼎铭致开幕词,林伯渠作题为《明年政府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对目前形势与任务以及精简、经济建设、教育、财政、司法、保安、乡政、干部、“三三制”及拥军等政策作了原则性说明,并特别提出边区目前基本任务,第一为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第二为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所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中心任务而奋斗,分散力量的“百废俱兴”的思想不容许存在,从而贯彻“精兵简政”政策的彻底实施,熬过困难,准备胜利反攻的力量。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绥德驻军某旅自1940年冬贺师

长提出精兵主义,该旅即将 30 多岁以上,17 岁以下的士兵减出 1000 余人,故该旅兵强马壮能在晋西北驰骋纵横,使敌生畏。今年春天,该旅又减掉×单位,仅司令部、政治部,即各减去一半,使干部充实连队,并送 70 余人入学校学习。自精简后该旅一切机构和效率均未减弱,相反更加合理和提高。

12 月 15 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合水“大渡”团认真做好检查工作,准备实行精兵政策,文化运动得到显著的成绩,战士百分之四十能写日记。

12 月 17 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岢岚县简政工作已作出初步总结,计减去县级干部百分之三十一;杂务人员百分之三十七;区级干部百分之五十三;杂务人员百分之六十四;村级干部百分之二十八。又减去村公所 2 个,小学校 14 所,教员 20 人。总计全年可节省粮食 10 余万斤,本币 20 余万元。县级干部到区级工作者 4 人;到村级工作者 6 人。区级干部到村级工作者 21 人。简政后,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及工作效率。许多干部认为今后村的任务加重了,不能再依靠上级,工作必须自己切实担负起来。同时报道:晋西北保德县自 9 月开始二次简政后,县级干部及杂条人员均减去百分之六十,区级干部及杂务人员减去百分之五十。计全年可节省开支 10 余万元,粮食数万斤。又报道:晋西北二军分区与二专署,共同组织退伍军人处理委员会,以适当安置精简后的退伍军人。再报道:晋西北军区直属部队精简工作大致就绪,所属机关均予调整合并,全体人员较前减少百分之六十,计司令部减去百分之五十七,政治部减去百分之六十一,通讯单位减去百分之四十四。

12月18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官僚主义》。社论认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仅仅表现为高高在上,不愿与群众接近的形式,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表面看来好象与群众有联系,而实际上是脱离群众的。犯这种毛病的人,每天工作是很忙碌的,但对群众的情形,是不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去抓住典型,调查研究工作。再则,他们虽然忙碌,但他们不可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不能解决群众的重大问题。一不研究党的政策,二不懂得地方的具体情形,只能把党的政策和指示当作教条来传达和执行,那就一定出乱子,其结果就使党脱离群众。这样,不管怎样忙碌,其结果还是使党脱离群众,还是官僚主义。社论指出:这种脱离群众,与前面说过的直接脱离群众不同,乃是间接的。它被外衣的忙碌所掩盖着,不容易看得出来。同时,这不是个别党员的品质问题,而是许多党的、政府的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的作风问题。如果不克服这类事务主义或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则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无法贯彻。

12月20日 华中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简政的通知。通知指出:“精简是切合敌后实际状况而又照顾到将来发展的政策,是要我们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于战争的需要,所以实行简政不是乱套编制的,必须根据目前环境及工作局面来切实地调整机构,减裁冗员,绝非不切实际千篇一律,相反的造成空立名目名简实繁的现象。”通知规定实行简政的主要办法有:“边区及游击区如靖江、泰兴、泰东、启海的某些地区在党政军民的组织机构上应该完全合一,平时是分工负责,战时一同作战。”“地委及县委机关应斟酌情形与分区司令部或专署,独立团或县政府合并为一伙食单位,减少事务员及炊事员。”“区党委会各部部长、行政公署各处处长、特务

员、马匹一律取消，只能留勤务员一人。”“专署各处与地委县长县专的勤务员、特务员、马匹遵照华中局决定全部取消，勤务工作由通讯员兼任。”“编余人员应分别处理，区级以上干部送区党委或行政公署另外分配工作，区级以下干部送地委或专署，在指定机关学习。身体强壮的杂务人员应尽量动员其参加部队，体弱的给资遣散回家参加生产，但须考虑其是否有社会关系生存。”“工作人员家庭必须参加一定工作或生产才能发给公粮，否则一律取消。”等等。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晋西北宁武县群众对“精简”的反映。10月初旬，县区干部到村里进行简政工作。他们先向群众宣传解释精兵简政的办法与意义，不要误会县区级到村里来工作的干部是犯了错误、受处罚降级了，他们没有错，而是为了加强下层。继而了解群众的反映，群众说：“老百姓过去也感觉吃公粮的多，老百姓就少了，现在的办法就好，很满意了。”“现在的办法，计划得再好也没有了，村子大，脱离生产的人少，干部回家也可增加生产，都是好的。”有的群众强调增加生产——开源的一方面：“年青人生产，不打十石打五石”！有的却着重节流一方面，说：“添粮不如减口。”另外一些人则双方并重，既开源又节流，从此看到了抗战前途。有的群众说：“人多协靠龙多旱，媳妇多了不作饭。”熟悉县稽征局的人说：“如稽征局只要3个人就办了事：1个办事、一个记帐、一个煮饭。现在用了15个人，办公的人多了，闲言很多，实有精简的必要。”

12月21日 新华社关中电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为彻底实行精简政策，正处在积极准备阶段，除进行干部登记外，并普遍进行干部对工作意见的搜集。干部登记工作的广泛深入，能使党正确地分配每个同志以适当的工作岗位。登记工作将于1月15日以

前全部结束。就目前分区一级干部填就的表格来看,大多数同志对工作,均填着“服从组织分配”,这和整风以前有些“讲价钱”的情形比较起来,已有显著的进步。另据报道,分区党委于本月16日已向各县委发出指示信,提出下列几点,要求各县委参照执行:(一)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及精简政策,是今天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具体方针,只有坚决实行这个政策,我们才能积蓄力量,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渡过难关。(二)要坚定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信念,认清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坚决地牺牲个人利益,以革命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三)精简后每个干部都会给予适当的工作位置,应强调绝对服从组织,听从组织的调动和分配,不为个人打算,严格肃清自由主义观点。(四)加强整风学习,把握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具体地运用到今天的实际行动中,使整风学习成为测验每个干部好坏的尺度。(五)每县区党委及分区总支委,应切实注意对干部党员的领导,加强精简政策及领导一元化的教育,以便克服不正确的倾向,使精简政策顺利执行。

12月23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克服思想障碍,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社论指出:我们党和政府所提出的精简政策,是要求集中力量于首要的任务,而使其它工作自觉地围绕于首要的任务,既不是样样都办,也不是一切放下。在陕甘宁边区,集中力量于发展生产与干部教育,这正是一个为边区为现在,又为全国为将来的方针,这正是精简政策的根本要求。不认识这一层,就很难贯彻精简政策。贯彻精简政策的思想障碍,除了来之“左”的一面,如“百废俱举”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与此关联的不合边区实际的“正规化”思想外,还有来之右的一面:有些同志是赞成精简政策,并希望厉行精简的,可是他们是从不正确的观点来赞成的。他们认

为简政只是减政,愈减愈好,凡事都要避繁就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缩减军队,他们是积极的,对于精兵,他们却不关心;对于裁撤或合并机关学校,他们是积极的,对于增强干部教育,却表示消极;对于节流(紧缩开支),他们赞成,对于开源(发展生产),他们消极;对于量入为出,他们赞成,对于量出为入,他们反对。总之,他们只想维持现状,不愿创造将来,幻想边区苟安,不顾抗战需要。他们自然也不赞成“左”的正规化,可是他们主张一切“率由旧章”。这是一种守旧的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可是穿的是“精兵简政”的外衣。因此,必须一方面克服“百废俱举”的平均主义思想,克服同边区实际脱节的“正规化”思想,另一方面克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守主义思想,克服“率由旧章”的守旧思想,然后才能真正贯彻精简政策,真正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为边区增强根本,为抗战增强力量。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关中淳耀驻军某团进行初步“精兵简政”教育,内容为:一、什么叫精兵简政;二、精兵期间要反对的不良倾向(等待主义、不安心现象、本位观念等);三、部队与革命问题;四、军人与命令纪律等问题。

12月26日 新华社太行电讯:野战卫生部材料厂,自实行精简后,工作效率及质量均有显著提高。今年虽处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全年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停工,人数且减少五分之四,而在6月中之产量,即已打破历年来每年生产总额之最高纪录。据10个月不完全统计,(因战斗停工时间在内)比去年提高一倍。至9月份提出重质不重量的口号后,药品质量已提高5倍。现一磅药品等于过去5磅之效能,此为白求恩医院实验所证明。而原料亦是在根据地内购买,此外并自造许多普通注射针药,如奎宁剂,强心剂等数十种。玻璃工业方面,去年只能制造一些简陋的大油瓶,今年则已

能制造医疗上所需及日常需用之工具,该项原料也完全采自根据地的土产。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已开始进行精简,原则是提高干部的质,减少量,着重提高工作效能。另据报道:原来专署与定边县府合在一起,即专署兼定边县府工作,分委兼定边县委工作,对于工作计划及领导诸多不便,此次精简中,为加强工作效能计,乃分开工作。此外机关团体合并的有:专署和保安科现已合并为一伙食单位,合署办公;统战部移回分委;文协、工、青、妇联会等合并为抗联会,分区一级干部共5人,县级共4人,定边市区与盐池市区各2人,区乡上抗联会干部则参加生产,如妇联会主任参加纺纱组,工会主任则参加工厂工作。

12月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撰写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解放区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报告特别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如果我们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报告说:“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的原故,有的人

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报告还指出：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去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给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给一个政治干部，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报告还指出：这次高干会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1943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决定指出：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我们必须有较大的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保留与学习。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经过去；由于根据地和军队的继续减缩，我们的干部，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中央特有如下决

定：（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的选送质量好的干部。（三）选送的干部，军队中应该是营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地方应该是县级及其以上的干部；山东及华中因交通更困难，故选送干部的质量，应更好些。（四）老弱伤病及妇女干部，不宜在敌后而必须送来延安者，其条件可酌予变更，但必须解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来延后多数干部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自给自足的生产工作，以便共同努力渡过难关。（五）专门家及优良技术干部，亦应酌量情形尽多送来延安保留培养和更有效地发挥其特长。等等。

1月5日 毛泽东致陈毅、饶漱石电：“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

同日 新华社晋西北电讯：晋西北兴县“精兵简政”中，大批干部派往区村，充实下层，共派下村长37人，村支书11人，小学教员19人。县府科长3人分配到区公所及市政府工作。经适当调整后，各级工作效能，均有显著提高。如在征粮工作中，大部村级干部都能独立自动进行工作，今年征粮工作，不仅完成得快，并且很少错误。如兴县市政府，去年征粮工作时，县府派30个干部去帮助，完成公粮750石，今年全由市政府自动进行，完成公粮850石，而一般群众还认为今年公粮合理公平。又如劳动英雄选举大会之召开，县府只下了一次指示，各村即自动进行选举劳动英雄40余名，其条件比前年更严格。生产展览品亦按期全部送到。此类工作在过去，则非派人再三督促帮助不可。此外精简以后，分工更加科学，劳

逸均等,发挥了干部积极性,各级工作会议,亦较过去健全,与会者都能充分发表意见,民主精神充分发扬,因此讨论很能深入,问题容易解决,工作进行顺利。又电讯:晋西北二专区将原有 35 个区、4 个市缩并为 29 个区、1 个市。专署对编余人员的安置:身患重病者发养病费,至病愈为止。女同志怀孕者发给生产费。如系家在敌占区,而应入学深造者,按公费生待遇。补助金发给,以家系外籍,家境贫苦者为原则。又电讯:晋西北三专区各级政府,自去年 10 月起实行“精兵简政”,现已告一段落。总计减少干部百分之四十,杂务人员百分之三十五。一大批干部均派往下层,区村干部质量提高不少,如过去区长能力较强者优先者仅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弱的有百分之四十点五,现在较强者优先者增到百分之四十六,弱的减到百分之十九。又电讯:晋西北临县四区精简后,减去区级干部百分之四十二,其次干部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也较前加大。在四区公粮工作中,3 个区干部在一个月中完成 3 个行政村的公粮征收,与去年平均 5 个区干部才能完成 1 个村的公粮工作相比,进步甚大。

1 月 7 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人尽其材材尽其用》。社论指出:陕甘宁边区快要实行第三次简政了。许多干部将要离开原来职务,调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党政领导机关正在慎重计划,务使这些干部都能各得其所。这种精神将要贯彻到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中去。社论在说明离开原有职务的干部大部分是去加强下级工作或者转入生产战线的意义后指出:“每个党员,除了党的事业外,无所谓个人的事业,除了党的利益外,无所谓个人的利益。党按照革命的需要,把每一个同志派到一定的岗位上去,只要他自己能对革命尽最大的努力,那就是个人最大的愉快和安慰。”“党政领导机关对于干部慎重处理的计划,是从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干部

一贯的爱护和培养的精神而来的。干部是党最宝贵的资本。无论他在什么岗位上,党和政府都是器重他、培植他的。在精简过程中,各级党政机关必须要根据领导机关的计划,使每个干部各得其所。分配工作时,要细心考虑,使新的职务,适合于干部的才能和志趣。同时,要耐心地说明工作的情况和进行工作的办法。对于干部的各种困难,则要尽一切可能,设法解决。需要休养的,帮助他解决医药问题。缺乏农具种籽的,则帮助他解决农具种籽。有些干部的家庭因劳动力缺乏,因此有特殊的困难,则要按具体情形,予以适当的帮助。有些干部回家务农的,乡村党的组织要和他经常发生联系,并且分配他适当的工作,使他能够不断进步。”社论最后指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简政中,在干部处理的问题上,我们已有很多好的经验和模范的例子。拿延安县来说吧。李善清同志是‘南梁时代’的老战士,当过区委组织科长,第二次简政时,决定回家生产,现在担任乡的支书。他对党的调动很满意。他说:‘以前在区上工作搞不大好,现在就搞得不坏。家里的生活,也比以前好了。’别的派去加强下级工作的干部也说:‘现在工作要做得更好。党和政府的工作,不能象从前的把抓了。老一套的办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好地学习。’这些模范的例子,在全边区,可以举出很多。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干部自己对于工作有了正确的了解;另一方面,党政机关对于他们的处理,是慎重的、恰当的。这些经验和模范,在第三次简政中将传播到每个部门的工作中去。”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为使即将到来的精简运动很顺利地展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一级机关党员,根据整风精神进行深入的思想检查,由宣传部发给思想检查提纲,由小组会提出每个人的思想鉴定。此外由分委组织部进行一年来党员登记工作的检查,并将分区一级党员干部作一有系统的考察与了解,以便在精简

中有计划地使用与配备干部。据悉一般干部均希望在精简中深入到下层工作,并表示愿意服从分配。

1月10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谢觉哉的文章《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文章指出政府工作效能不高的原因:一是“百废俱举”的观念。什么都做,客观的条件不管,主观的力量平分。二是调查研究不够。有不少工作计划常常停在纸上,成为官样文章,谁也不注意。比如:农业生产,每年都有开荒百万亩或60万亩、增加细粮40万石或20万石的计划,看到了有荒地和需要增加粮食的方面,却没有看到劳动力有限及劳动力如何组织的方面。又如国民小学,定几年要消灭文盲,然而师资怎办,农村儿童有否入学的能力,都未计及,结果学校办得多,成绩仍然有限。三是计划多检查少,及不会总结经验。计划了,或者计划也还不错,是否执行,执行得是否好,常常没有下文。好的少发扬,坏的无指责,形成工作欠紧张和深入的现象。四是干部分配不甚适合。干部管理欠统一,对各种干部的了解欠深入,以致某些环节的干部堆积太多,某些环节又嫌太弱。多环节的效能不能配合。最后,最重要的是领导作风,领导上的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不够。步调不一,这是一。忙于事务,遇事临时应付,因而不免常有朝令夕改的事,这是二。使用干部未能事当其才,才尽其用。忙闲不均,忙的做不了事,闲的没有事做,或则本可以做某些负责的事,而苦于无责可负,这是三。满足于文牍,文件发出,百事大吉,不顾文件上写的是否合于实际,也不计及接文件者是否吃得消,这是四。限于一般号召,缺乏具体指示,更缺乏个别问题解决的具体指示,因而不能帮助工作同志的能力提高,这是五。更重要的是忽视检查。不是决定一件事定要做,定要做好,从检查中来考核勤惰,从检查中来推进与改善工作,这是六。文章针对上述问

题,还提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要求。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和保存干部问题,致电陈毅、饶漱石:“(一)在敌寇扫荡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荫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的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二)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其他路线则可经刘晓送西安转延,或经北京、彰德、开封转延,交通建立办法另告。但人数不能太多,并须可靠的能在敌区国民党区行走的干部才可以。”

1月1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晋察冀分局,指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发表的宣言应注意指出:“目前晋察冀边区形势的特点是边区极大部分地区日益游击化,根据地日益缩小,处境日益困难,而严重的困难则还在今后。”“应着重提出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便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军民公私必须积极协力发展生产,发展贸易,以开财源,以裕民生”等。

1月12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陇东某旅,经过精简教育后,39位新干部,在政治部发下的调查志愿表格中,有35位填“到连队去”。而正是在他们中间,过去曾有许多是以为部队里“小池养不起大鱼”,要求“到延安去”的。“向下看”,是该旅在精简教育后新老干部的一致呼声。某同志,原为相当于营级的股长,他在志愿表

里填写道：“我想到连队去任副指导员，因为我虽说参加部队工作5年，但一向是呆在机关里，不了解部队。”另一同志说：“我感到自己还不够，工作作风不踏实，我愿意到连队去！”该旅的精简教育是从去年9月开始的，初期，有部分干部还不能很好了解精简意义，实感到彷徨不安，经过3个月的教育，精简政策像一般战斗的任务，在某旅胜利地完成了。

1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一级党风检查鉴定干部，配合处理精简人员。在填写个人反省材料时，分会及时提出纠正不良偏向：（一）写反省材料不加分析，只是罗列现象，堆积事实。（二）反省历史多，反省现在少，理论多于实际。（三）夸大缺点，以示“反省彻底”。（四）反省错误时忽略当时具体情况，模糊错误大小程度。（五）抛开文件只在检查要点上打圈子。

同日 《解放日报》关中电讯：关中分区组织部根据精兵简政加强下层工作的原则，分配这次毕业的干部训练班学员。这次毕业共53名，受训前担任乡长职务的仅7名，这次增加为18名；受训前担任区政府助理员者有18名，这次分配原职者仅2名。这次分配前曾担任县抗会科长的2个人全都分配了其它工作。转入生产部门者7名。在毕业的全体学员中有1人提拔为区长。由统计表上看出大部分干部分配至区乡工作，毕业的学员对组织分配的新工作欣然接受。

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提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高干会，已完成了将边区广大

人民与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

1月16日 晋冀鲁豫边区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社精简完竣。这次简政,是在党报委员会与该社负责同志直接领导下执行的,由社长陈克寒宣布新的机构与人事布署,学习晋西北“兼”、“并”、“合”的办法,取消部级机构、充实与合并科。简政结果,抽出大批干部,交给党分配工作,计全报社干部减少五分之二,杂务人员减少二分之一。此次调动工作的干部,对精简政策有深刻的了解,无不欣然乐从。虽有同志愿意终身从事党的新闻事业,亦均服从分配,毫无异议。他们均希望到下层工作,以加强斗争锻炼。留社同志,决心完成现有工作,并执行本年本报工作方针,加强学习与调查研究,做到编辑与实际结合。

1月1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闭幕。该会自去年12月11日开幕以来,已一个多月,中因高干会议,筹拟生产计划及出席各机关的座谈会等,曾间隔若干时日,实际开会时间共为10日。会议期间讨论了关于各级政府的精简问题。先由边府高秘书长提出报告,然后讨论。发言者对于边区所处的环境,以及抗战所赋予的任务,均有明确的了解,对“简政不是减政”、“百废俱举”,“缓急不分”之错误观点,都曾有所检讨。在讨论此一问题时均能和边区目前两大中心任务(生产与教育)联系起来,和领导一元化、民主集中制联系起来。从发言中可以看出,简政上的思想障碍,业已逐步清除。

同日 新华社太行电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再度实行简缩,抽出一部分干部,充实区村下层领导,加强县区村政权力量,坚持对

敌斗争。同时,并抽调一部分干部,加以培养训练,提高质量,准备力量进行反攻。边府、高等法院及公安局,也减少人员至最低限度,粮政局决定撤销,工作并入边府农业局,仅保留水利工作部分及农业技术干部一部。交通局在不变更工作制度及寄递效率的原则下,减少干部 202 人。工商管理局减少干部 180 人。太行卫生处及医院与其它医院合并。太行 3 个大众教育工作机关并为 2 个,抗战建国学院与某校合并为干部学校。各专署人数,决定减少七分之四。

1 月 19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决定将所属纺织一二两厂合并,现已开始搬运,随机随装并随即开工,以期尽可能减少停工时期。两厂合并后,可减少干部 7 人,工人、学徒 23 人,杂务人员 4 人,家属 5 人,共 39 人。另骡子 2 头。每月开支减少五分之一。在生产方面,大布由 500 疋增加到 700 疋,提高约八分之三。

1 月 20 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三边吴旗县在区长区书记联席会上讨论简政工作,认识到简政首先要减政,其次就要提高行政效率。现在各区负责同志要作好准备工作,主要是教育干部对生产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于所属干部作详细的了解,以便将来精简时,有些干部转入生产部门,避免发生消极怠工现象,并作到能适当地安置干部的目的。

1 月 21 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关中“渭水”部队整编工作顺利完成。该部精兵教育于去年 10 月开始,全体指战员均热烈拥护整编,此时期中部队乃愈趋巩固,逃亡现象消灭。某营全体指战员于两个月中,亲手构筑营房数十间,耗资仅百元,以作将来集训

之用。该部还用反面例子作教育：在部分干部中，曾发生工作松懈、不安情况。如该部政治处某指导员发生放松工作，进行私人生产，以及贪污公款、公物，经发觉后即将他撤职查办，并在干部及战士中间开展讨论，以杜绝不良倾向之发展。该部编余的 40 多位排连营干部在整编中能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个人地位。副连长康全生入伍已 13 年，任了 7 年排长，3 年多副连长，这次他自动报称，愿降任排长，还有 3 位副连长均自动请求降任排长，3 位排长欣然接受降任班长的命令。

同日 新华社晋察冀电讯：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皮革工厂自精简后，各方面均获得很大成绩。在克服浪费现象上说，以前裁下的碎皮头，都是丢了，可是现在他们已开始注意收集，并想法做成了弹盒的底和两头，节省大量经费。以前作皮袄裁下来的皮毛头，现在他们也收集起来，用线连起又缝了几十件皮背心和 52 件皮大衣，合市价就值 1700 元左右。近来他们又把牛皮头收集起来，每件可做 4 个子弹盒，合市价可值 72 元。

2 月 1 日 延安《解放日报》关中电讯：关中分区一级机关在精简过程中完全取消了勤务员制度。司令部各直属机关的 30 余名勤务员，均到各连队担任上士、通讯员，或参加生产。党委、专署等机关的 20 余名勤务员，按照年龄、特长、文化程度等转入生产事业及完小学习。部分年龄幼小者，则送其回家。党委于取消勤务员制度后，及时实行了集体食堂、公共浴室制，此举不仅增进干部间情感，养成守时早起集体生活的作风，且在节省食粮方面，更有显著成绩，该部仅在一月份内即节省下粮食 400 余斤。

2 月 7 日 晋西北文联根据精简政策，组织上进行变更，为使

文化工作与地方群众运动密切配合,决定参加抗联,设立文化部。原属文联领导的文艺工作团,将深入下层,直接参加抗联工作。

2月9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大发展等问题,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同日 甘泉驻军某部整编工作已告完成。多数干部均深入下层,现派赴连队中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都在很好地听从上级的分配。

2月10日 陕甘宁边区固临县政府召开扩大政务会议,讨论第三次整编问题。会议决定,一三科合并后仅留3人,二四科合并后留4人,保安科整编后留6人,秘书室现设3人(政务一、事务一、文书兼收发一)。其他杂务人员及通讯员共6人。司法机关以县长兼任法官,下设推事、书记各1人。故此全县府整编后仅25人。

2月11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军所处环境,交通不便,上下隔阂,各地情况特殊,很不一致,因此干部太流动是不容易熟识情况,有碍于正确领导,但干部太固定,亦使干部进步停滞,上下隔阂,故在适当程度内

(如政治部之科员科长,司令部之参谋与科长等等)实行干部交流之必要。即: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这样既可以从工作中更好地培养干部,又可以沟通情况,密切领导与加强部队的工作和战斗力。”指示指出:“实行上述多种交流,不管是长期的与短期的,都应把自己最好的干部调出来,反对本位主义,借交流之名,以坏干部换好干部;或者只要人家交流,而自己则一毛不拔,应识大体顾全局,对本位主义的应严加纠正。”

2月15日 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为调整分区国民教育干部,实行精简政策,专署教育处特向各县发出指示:第一、调整干部方面要对教员进行考试,在考试与分配工作中,要清洗如下几种人:破坏分子及思想太落后者;品学不端,不能为人师表者;文化程度太低,不能完成工作任务者;过于老迈,或有宿疾,不能担负工作者。在配备干部时,应特别注意完小校长、教导主任及高级班级任的配备,须选择政治强、能力卓越的干部充任之。第二、实行精简,要把高干会精简精神,贯彻到教育工作中去,对不够条件的学校与不合格的教员,要坚决予以裁并。

2月20日 陕甘宁边区安塞县决定今年就全县现有19处完小精简为10处,并集中力量办好一处。按各区现在统计,全县学龄儿童,除一些年龄过大或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童外,尚有430人,将分别招收于完小中心小学与8处普通小学中。在教员方面,特别注意才德的选择,要真正有学识,且为群众所信仰的人。在领导上,组织校董会,由当地有威望人士及学生家长组成,负责办理与领导学校工作。为照顾年龄较大的学生,于农忙时帮助家庭生产,规定夏耘、秋收及旧历年节放假3次。

2月2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杜心源的文章《晋西北政权系统精兵简政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在去年3月的专员会议上，即已一度提出并进行过初步的精简工作，但由于对精兵简政认识的不一致，不彻底，在执行上也充分表现了此简彼不简，单从人员马匹上裁减，或实行部分的并缩，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很少。去年九月一科长会议时，大家都认为精兵简政有认真贯彻的必要，故决定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之一。这次精兵简政的全部内容和要求是：减人、简政，求得节约，增强领导上的组织性统一性，并反对任何官僚主义的作风，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文章指出：“精兵简政”基本上是组织革命，也只有通过这一基本环节，才能达到减人简政，使组织精干统一，工作效能提高的目的。这次精简在组织机构上，被裁减的有行署至县级的调查研究组织，专署以上的观察组织、区级的各种助理员，村级各种形式主义的委员会。在兼并方面，如各级政府的民政教育的合一，财粮合一，银行贸易稽征的兼并合一，交通站之兼并于民教部门，公安局警士与各级政府警卫连的合并等等。根据28县的初步统计，行署至区级共减去5949人，其中干部1872人，杂务人员1064人，警卫人员3013人。过去区公所平均在15人以上，现在平均减少至7人，过去村公所平均脱离生产人员为8人，现在减少至3个半人，村级总共减去脱离生产干部5566人。这次精简，完全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依据一个专署，一个县政府，和一个机关的客观环境，任务繁简，与干部条件、实际计划，实行精简。现在全区的专署县政府之人员编制，无一相同，这便是真正克服了过去形式主义和定型化的机构，以及人浮于事的现象。文章在全面阐述了晋西北实行“精兵简政”中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后，最后还着重指出了缺点：一、执行精简时把减人简政

机械地分开,只作了精兵的一步,但简政和增强行政效率,还未能普遍切实地贯彻下去。二、在执行精简时,只提出了加强下层,但对各部门的协调上,上下级关系的明确上,以及领导的统一性上,各级干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之在执行过程中,个别机关不免有些只从局部出发,不照顾全面的片面观点,把自己做的一部分事业特殊化,从全部中孤立起来的偏向。三、在精简时,只强调了紧缩机构、减轻人民负担,却未能同时并进地提出积极的节约运动来。四、在政权执行精简时,事先没有与军队民众团体取得足够的配合,因之在吸收适宜于行政工作的军民干部上还不够广泛,缩小了加强各级,提高干部质量的程度。五、在安置退职干部时,开始只发给退职金与补助金,而未能切实交付区村干部以及人民加以爱护教育,使极少数的干部,把所发的退职金与补助金随意挥霍了,使生活上感到困难。文章认为,我们的“精兵简政”工作,只是开始,要认真贯彻全面的精简工作,还必须抓紧简政、节约、统一领导与增强行政效率,以及彻底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等等问题,如不这样做,就没抓住“精兵简政”的本质和精神,也不算真正完成“精兵简政”。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延安大学于春季开学之际,为便利整风与生产领导,特将各院系整风学习单位加以改组。大学部原有5单位,现并为3单位(法学院俄文专修科一单位,英文专修科社会科学院一单位,教育学院一单位),同时初中部之预备班取消升为初一乙,并将各部门工作人员精简至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二到三分之一。

同日 新华社太行电讯:晋察鲁豫边区政府民政厅通令所属,严格实行精简。通令指出:这次简政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今后严重的分散困难环境,与加强下层工作及开展敌占区工作,且胜利将至,积蓄与培养力量,亦为当务之急。为此,须紧缩机构,减少专

暑及县级人员,加强区村级工作。同类性质的机关,应再加合并。今后在领导上,应建立领导核心,加强领导一元化。至于干部的调整,应周密考虑,贯彻“三三制”精神,务使各得其所,要求一个人顶两个以至三个四个人用。而已经确定的区划与编制,应严格执行,克服随便增加人数,以及领导机关依然庞大等现象。

3月3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公布简政实施纲要的命令》(战字第680号)。命令指出:简政实施纲要,业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1942年12月)经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令行公布施行,现在随令发下,希遵照执行,并作为政务人员整风文件为要。《纲要》共分11个问题:(一)简政的意义和目的;(二)划清职权,审定业务;(三)加强乡政权;(四)区以上须精简机构、精简人员;(五)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六)改善领导作风;(七)统一干部管理,调整和提高干部;(八)拥护军队;(九)巩固“三三制”; (十)厉行节约;(十一)从组织上、思想上贯彻。《纲要》指出: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共同原则,就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要裁撤不急需的机构,合并性质相近的机构,缩小庞大的机构;精简人员,就是要裁减不急需的人员,精选称职的人员,又从各种业务的需要来调整人员,使之各得其所。”“二次精简后,除地方武装、荣誉学校及母亲婴孩外,边府所属吃公粮的人员尚有11500名,计: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关8200名,各中等学校及完小3300名。这次精简决定总额减至7500名,即减去百分之三十五弱。”“边区政府之机构、制度和人员,依下列的原则精简之:(一)坚持政务与事业分开,领导与事务分开的原则;(二)应该移下的业务移下之,应该分给事业机关的业务分出之,应该取消的空头机关取消之,应该合并的机关合并之,应该紧缩的机关紧缩之;(三)改正观察、研究与领导分立的

不合理制度,取消观察室及此类似的机关,使调查研究工作成为各科的重要业务;(四)重新审定各科的业务和职权,并紧缩之,但须加强干部质量,使之皆能掌握自己的业务;(五)设立合署办公机关,统一秘书工作和总务工作;(六)因职设人,不因人设职。并提倡一人能做几人的事。”“各级人员的精简,采取自上而下的步骤进行之。所有编余人员,须慎重处理,务期各得其所。除缺乏劳动力的残废老弱妇孺另行处理外,一般处理办法,主要有二:(一)加强下级;(二)转入生产战线。”关于改善领导作风,《纲要》指出:“首先要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高级机关和高级人员领导上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掌握政策与贯彻政策,换句话说,就是要会出主意,又会指导实行,做好了这两件事,才算得尽了领导的责任,也只有做好这两件事,才算得尽了领导的责任。没有好政策、好主意,只有整天忙碌,会流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有了好政策、好主意,却不会指导实行,也会流为空谈。”领导干部要做到贯彻政策这一层,“第一,需要善于掌握和使用干部,熟悉下级情况,善于指导干部和下级,把领导机关的政策、法令和指示灵活地运用到当地具体情况中去,并为贯彻这政策、法令和指示而进行各种必要的宣传组织工作。第二,需要及时地检查干部及下级执行政策、法令和指示的情况,指导他们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和发扬成果。第三,需要善于积累和总结执行的经验,用来教育领导人员自己和干部。”《纲要》在最后一节指出:“这次简政工作涉及了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业务问题、机构问题、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领导作风问题,以及拥军问题、三三制问题等等。由此可以明白,简政工作是一系列的组织问题,又是一序列的思想问题。”“为要正确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为要真正实现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我们的简政工作,就必须从组织上贯彻,又从思想上贯彻,

要从两方面同时贯彻,才能达到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一方面把简政工作同整风学习沟通起来,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观点,来从事简政;另一方面把简政工作同检查工作统一起来,同政务人员的思想检查和政府系统的工作检查统一起来进行。首先边区政府自己这样作,同时帮助各县这样作,用思想来指导行动,用行动来贯彻思想,期于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完成简政工作与检查工作,看谁作得好,谁作得更好。”

3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将边师、酃师合并为延安师范。为了使学校的设施更适合于地方的需要,该校已由延属分区专署代表教育厅直接领导,以培养延属分区各县所需小学教员及轮流训练区乡干部为目的。

3月7日 延安市政府实行精简。市府原有4个科,合并为2个科,取消自卫军团部,以及教管委员会,市府本身由36个干部,减为12个干部。延安设立4个区,每区连助理员共3人,乡的单位,照旧不变,唯乡长一律不脱离生产。又市公安局组织仍照旧,地方法院干部,亦要减少一些,交代手续,3天内完成。

3月8日 陕甘宁边区清涧、志丹县小学实行精简。清涧县的做法是一方面甄别教育干部,一方面精简小学,编整班级。举行全县小学教员考试,规定5里左右和有名无实的小学一律合并。志丹县第十次政务会决定,全县小学由10处精简为8处,并规定了劝导学生入学办法。

3月9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论简政实施纲要》。社

论指出：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已于日前由边区政府明令公布。“这纲要是精兵简政政策在边区政权工作方面的贯彻方案，也是整风精神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边区政权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从二届参议会以来，又有了新的进步，但同时也还有极需改正的缺点。简政纲要本着整风精神，揭露了这些缺点，找出它的根源和改正的途径。简政纲要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它是‘一系列的组织问题，又是一系列的思想问题’，而象红线一样贯注于整个纲领中的，正是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社论特选择纲要中一二荦荦大端，略加申述，以阐明这一重要文献的意义后，指出：“简政纲要，虽然刚刚公布，然而它所规定的方针和各种具体方案，已在实施的过程中，简政纲要的制定和施行，一方面是伟大的整风运动在政权工作方面的收获，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整风运动的内容，使其更加具体，更加丰富。正因为如此，简政纲要昭示我们：要把简政工作和整风学习互相沟通起来，同时要在简政工作中，实行检查政务人员的思想和政府系统的工作。换言之，就是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双管齐下地贯彻简政工作。”

同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召开直属机关精简动员大会。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在讲话中说：军队人员减少和军队自己的生产配合起来，才能真正减轻人民负担。而目前留直机关，尚有头重脚轻不合理的现象，因干部多，杂务人员、马匹需要亦多，以致费用难以减少。这次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精简号召，精简之后，领导更加统一，将工作效能提高，把精简、统一、提高工作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这五项原则联系起来。新工作制度，要使生活更为军事化，动作迅速，一个人最少要做8小时工作，实行集体办公制度，15个人配备一个伙夫，勤务员能招呼更多的人。精简下来的人员，应调到生产战线上，到农场、运输队、商店中去，老弱残

废、妇女等均按规定办法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副司令员徐向前在讲话中指出:精兵简政的口号,今天已不是一个新的口号了,由于我们过去思想上的关系,还未将这工作做好,所以今天重新来做。根据此次整编的决定:留直共要减下 1400 人,将这批干部及事务人员,转到生产战线上及下层去,这种事情要靠大家来做。今年留直 7000 余万元的生产任务,要靠有良好的干部及生产人员去完成。这批同志分配到生产战线上去,将今年生产搞好,于公于私,都非常有利。参谋长张经武在讲话中指出:华北的八路军已精简过 5 次,留直到今年才来真正动手,各单位在动员大会后,要加快进行。全留直精简任务 3 月底完成,4 月 15 日做编整总结。

3 月 10 日 陕甘宁边区延川县县级整编已经完成。县级干部共 150 名,减去 58 名,其中 25 名分配至各区工作,7 名调任小学教员,10 名调入学校学习,16 名调入生产部门。

3 月 11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

3 月 13 日 陕甘宁边区志丹县根据加强政府、加强区乡、加强经建部门的原则,依照乙等县的编制,将本县党政民干部作统一的配备。党委系统的编制没有更动,另供给政府 3 个能力较强的干部。政府系统,县府一级由过去 6 个科改编为 3 科 1 处,由 36 人减至 24 人(干部 19 人、事务人员 5 人),原任一、四科科长改任区长、县科员改任区助理员者 9 人;区级由过去的 40 人减至 33 人;仓库干部 7 人;全县 41 个乡现有文书 9 人。遵照编制,每乡除乡长外,添设文书 1 人,即共计乡级干部 82 人,县区乡合计 146 人。群众团

体方面,原留之区级5人全部取消,县级由3人减至1人。由原妇联主任任抗联主任,专门组织抗工属及群众妇女参加纺织。县区共计编余干部36人,决定送延安受训者2人,改归自给生产部门者6人,回村充任乡长文书者13人,退职回家生产者8人,转任教员者2人,留县委任用者3人,转调吴旗者2人,并限于4月半编整完毕。

3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就目前工作方针问题指出:中央工作总方针是要从研究与指导两方面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的目的。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去年以完成整风学习为第一位,今年要以工作为主,从5月1日起开始工作。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实行彻底的转变,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任弼时在听取毛泽东关于方针问题的讲话后,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指出:中央组织机构在1941年9月整风后实行了一次整顿,但现在机构“似觉分散”,要更提高一步,以使中央更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鉴于前一段书记处工作委员会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现确定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只是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主席可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青委、工委、妇委合并,成立民运委员会,对各地仍保持原名义;五个机要科合并为中央机要科,公开半公开电报合并于新华社

译电科,等等。

3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的工作条件,中央机构有重新加以调整之必要,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为此决定:(一)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中央党校、文委(文抗拨边区管理)、出版局。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同志组成之,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委成立后,原有之中央党报委员会取消。组织委员会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委。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八同志组成之,由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二)为着分工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统归刘少奇管理,陕甘宁晋西北统归任弼时管理(因为陕甘宁晋西北在军事上已统一,财经亦趋统一,决定晋绥分局以后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大后方工作归陈云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管理,而管理各地区工作的同志,直接向书记处负责。(三)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四)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它的经常业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和应

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五)中央研究机关作调整:将现有之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之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另行组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设局长(刘少奇担任)、副局长(杨尚昆担任)各1人,下设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和图书馆。在研究局之下,合并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图书材料室、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成立一比较完备的图书馆。在新的中央研究局成立以后,原有调查研究局名义取消。情报部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实行精简后,情报部与社会部可合署办公,干部工作,可以统一管理。(六)总政大部拨并于联政后,移驻王家坪与作战部靠拢,军委设秘书长,在军委内增设军政研究室。军委作战部除管理二局、三局外,在本部之内设立作战室与教育室,在军委内设立高级参谋室,另设办公厅,在中央管理局统一的制度与计划下,管理作战部、政治部、二局、三局之行政与生产事宜。(七)将现有的职工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设书记(邓发)和副书记(蔡畅)各1人,下分职工、农民、青年、妇女4个组,每组三、四人。(八)在华北华中大批党政军民干部来延后,中央党校应开办第二期。中央三委合并后,邓发任民委书记,解除党校校长之职务。决定由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等等。决定最后指出: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组织,均应根据力求精简、灵活和增强工作效能的原则实行精简,由李富春主持精简委员会,协同各部

委局厅社主管人员,负责具体计划,并提交书记处通过后实行之。但须在4月半以前完成精简计划。

3月22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依据整风精神,研究敌后战争新形势及检讨过去的工作弱点后,对今后政府组织形式特提出“一元化、群众化、军事化与简单化”之目标。边府本身直属各局均大加减缩(如工商管理与税务贸易局的合并等),将百分之五十六的干部分派到下层工作以充实机构,加强力量。专署(或县)设专员(或县长)办公室,专负责计划推动各县长领导综合性的中心工作与统一政令,确切配合。民政科与教育科合并为民教科,财政科与粮食科合并为财粮科。建设科取消,设抗战勤务科,游击区县以下则设工作队。一般区村行政机构,除设正副村长外,只设民事、财政、治安三委员会,必要时可设教育与建设委员会。在各级行政组织领导上,都统一于主席(边区)专员(分区)县长区长村长,各部门不得自成系统,任意行文,所有干部生活完全军事化,目前并曾进行过一次军事检阅与战斗演习。

3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便于中央机构实施精简,要求各部委对已审查清楚的干部,在4月底以前作出文字鉴定。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第四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各级政府新的编整方案。(一)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干部由1203人减为1007人,杂务人员由489人减为320人,具体为:(1)民政厅取消秘书室,改设各种专业秘书;将厅内4个科并为2个科,编制干部32人。厅附属之通讯站由原3科2室并为2个科;2个干部休养所和学生疗养院合并;防疫委员会工作并入卫生处;保健委

员会工作并入第二科；恢复设立边区抚恤委员会。(2)取消财政厅所属粮食局、税务局的秘书室，均改设秘书和秘书督察员，交税务局3个科并为2个科。(3)将教育厅所属鲁迅图书馆并入政府办公厅研究室。(4)保安处所属公安局并入保安处。(二)专署和县政府的编整：专署取消秘书室，改设行政事务秘书，将原5个科处合并为2个科(一科负责民政、教育，二科负责财政、经济建设)，取消专署于所在县设立的地方法院，改设分区高等法院，代理边区高等法院受理第二审案件。县政府取消秘书室，改设管理员；将原设之第一和第三科合并为第一科(民政、教育科)，第二、四、五科合并为第二科(财政建设科)；县裁判处改为司法处。根据方案规定，此次边区各级政府裁减部门及科室共100余处，区以上干部及事务人员由4453人减为3221人。

3月24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晋西北精简工作，进入更高阶段。各机关干部已减去大批人员，转入生产部门或充实下层。机关精简后为适应新的机构，各种制度重新规定，工作效能增进两倍。另各专署目前除依照行署新的各级政府编制表，重新配备干部及继续安置编余干部外，主要任务在研究并建立新的作风、新的领导、新的工作方式、方法、制度、手续。三专区政民机关精简工作，组织上已经执行，但思想上还没有贯彻，因而制度与作风没有显著转变，个别部门还有不正确的认识与行动，针对这种倾向，现正继续在思想上进行动员与教育。又报道：晋西北兴县精简工作已点验完毕，按现编制人员，较过去减少百分之五十二，全年经费可节省本币近50万元。精简后该县又按裁并缩减原则，将直接有关之工作部门又予以合并，如警卫连兼管看守所，编余干部人员大都转入生产或到区村工作。又报道：晋西北神府县精简工作，根据裁、并、缩、

减的原则,前后共进行了4次,计裁去民众剧团、干部修养所及分干校等6机关。全县小学由40处减为18处。其缩并部门有政府二、五科合并,工、农、青、妇改组为抗联。同时又实行大区乡制,全县47乡已并为40乡,二、六两区合并。经4次精简后,共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百分之三十三,县级干部减去百分之四十,区乡级减去百分之五十,地方武装减去百分之十七,杂务人员减去百分之五十二。在加强下层工作方面,由县派到区上干部27人,由区到乡、村的干部20人。现在脱离生产人员,仅占全县人口百分之零点七,较诸精简之前,每年可节省食粮344石,节省经费752500元。又报道:晋西北群众团体组织统一后,各级领导已逐渐加强。以前工、农、青、妇因过分强调独立性,干部配备等量齐观,以致力量分散,现并入抗联后,过去村级组织庞杂现象,亦均克服。

3月27日 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召开精简编余人员欢送会,到会80余人,这些编余人员,大半都是老弱残废,他们有的将到南泥湾农场去,有的将退伍归田,有的将到农村暂时休养,大家都以愉快的心情来迎接新的生活。在这个会上首长的讲话给予大家很大的鼓励,使编余人员进一步懂得精兵简政的意义,懂得生产的意义,而自己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特别值得赞扬的是,凡能够劳动的都乐于参加生产。

3月2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战字第七一八号)。命令指出:根据精简原则,经过周密研究,各级政府及各级参议会之更进一步的整编方案,现已具体决定。关于延属专署及所属各县(市)区乡(市)政府之整编规定如下:(一)延属专署人员编制规定:干部共23人:计专员2,政务秘书1,事务

秘书 1,收发 1,文书 2,管理员 1,第一科(民政教育)5,第二科(财经粮)6,保安分处 4 人。事务人员共 6 人:计特务员 2,通讯员 1,炊事员 2,饲养员 1。合计 29 人。(二)延属专署所属各县(市)区乡(市)的人员编制及县区等级的规定,均见附表。(三)关于专署及所属各县(市)区乡(市)及县参议会常驻会组织机构与编制标准,均另有附件规定。(四)限四月底整编完毕。(五)整编进行情形,须随时报告本府整编委员会备案。附表规定了各县人员编制,如延安县政府:干部 20 人,杂务人员 6 人,区干部 35 人(10 个区),杂务人员 10 人,乡干部 102 人(51 个乡),合计干部 157 人,杂务 16 人,总计 173 人。如延安市政府:干部 16 人(市长 2 人,政务秘书 1 人,事务秘书 1 人,第一科 3 人,第三科 4 人,保安科和地方法院 4 人,卫生事务所 3 人);杂务人员 4 人(法警 1 人),通讯员 2 人,炊事员 1 人);合计 20 人。所属区干部 8 人,杂务人员 4 人,合计 12 人。总计 32 人。另乡政府干部 16 人不脱离生产。

同日 陕甘宁边区甘泉县简政工作已完成。县府在组织机构上一、三科合并为一科,二、四科合并为一科,人民武装大队部与保安科合并。县级原有 64 人,已减为 53 人。各区皆配备强的干部,乡则增设文书,籍以加强乡政权。各区皆适当配备有知识分子干部。

同日 陕甘宁边区鄜县群众团体已实行精简。以前县区两级之工农青妇等团体共 27 人,现仅留 3 人。为加强群众工作与党的工作,特设一民运工作委员会,县委组织部亦派员参加,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之。工作方针规定如下:(一)发动与组织群众积极参加生产。(二)贯彻减租减息法令,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三)组织农村青年参加生产,加强学校青年学生之文化娱乐活动。(四)妇女工作以妇纺为主,本年要发展妇女纺织者 1700 名,纺线 2 万斤。

3月3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内容大要：(一)边府本部：特设政府办公厅，逐渐做到合署办公。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交际处、总务处、研究室。民、财、教、建各厅的组织，依据适应合署办公及其本身业务的需要，除将秘书室一律取消改设政务、事务、人事等秘书外，民政厅原有四个科并为一二科；财政厅取消视察室，保留一二三科，增设第四科，管理工厂工作；教育厅原有的四个科，合并为两个科，编审、督察两室保留；建设厅原有四科无更改，另设技术室。保安处、高等法院不参加合署办公，并将延市公安局、保卫团团部并入保安处。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亦略有变动，文化工作委员会取消，其工作并入西北局文委。上列各厅处院会本部人员亦均有调整，总计原有552人(干部315人，杂务人员237人)，整编为416人(干部292人，杂务人员124人)，减少136人，占原有人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二)边府各厅、院、处的附属机关：边区通讯站，原有之秘书室、视察室及一二三科，合并为两科；边区卫生处及其所属门诊部，边区医院共组一个伙食单位；干部休养所第一所保留，第二所与学疗合并，保安处招待所并入边府干部招待所，统一政府系统来往干部的招待事宜；防疫委员会、保健委员会均不设专人，防疫委员会并入卫生处，保健委员会并入民政厅二科等等。各附属机关的人员，总计原有1140人(干部888人，杂务人员252人)整编为911人(干部715人，杂务人员196人)，减少229人，占原有人数百分之二十点一。(三)各分区专署：秘书室改设政务秘书、事务秘书；原第一、三科合并为第一科，管理民政、教育事宜，原二、四、五科合并为第二科，管理财政、经建、粮食等事宜；专署多与当地县府分署办公，原有绥德、陇东、关中、三边专署人数共

101 人(干部 78 人,杂务人员 23 人),连建设之延属分区专署在内,整编为 148 人(干部 119 人,杂务人员 29 人),增加 47 人(三边分区专署过去和定边县府合署办公,故实增加两个专署),占原有人数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四)各县(市):取消秘书室,改设政务、事务秘书,原有之一、二、三、四、五及保安科,改为第一、第二及保安科;裁判处改为司法处,规定概以县长兼处长,另设审判员及书记员各 1 人。各县(市)干部人数,依据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配备,县参议会只设议长或副议长 1 人,秘书由其它部门工作人员兼任。总计各县(市)政府县参议会原有 1188 人(干部 952 人,杂务人员 236 人),整编为 791 人(干部 613 人,杂务人员 178 人),减少 397 人,占原有人数百分之二十九。(五)区公署:分大区小区两种,大区设助理员 3 人,小区设助理员 2 人,合计边区各县共有 213 区,内大区 107,小区 106,总计各区公署原有 1250 人(干部 1041 人,杂务人员 209 人),整编为 955 人(干部 742 人,杂务人员 213 人),减少 295 人,占原有人数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六)各乡(市)政府:均普遍增设有一定政治修养和相当文化水平的文书 1 人,计原有乡数为 1270,亦须增加乡级干部如数。以上边府、专署、县府、区署、乡政府计原有人员 5489 人(干部 4754 人,杂务人员 957 人),决定整编为 5737 人(干部 4997 人,杂务人员 740 人),其较前增加 248 人。此外如保育院、残废院等尚在整编中,又如病员、来往干部、犯人、警卫队等原有 714 人,边府一级吃公粮的家属和老弱小孩等 379 人,将另订安置办法,统一处理。最后关于干部调整和使用方向,将依据下列四个原则分别处理:(一)加强生产与教育部门干部配备;(二)加强保安、司法及下层干部配备,特别是县的秘书和乡的文书;(三)照顾有病及有累赘(如家庭等)的干部,分别予以适当安置;(四)在调整干部的时候,注意抽调一批有造就的干部到学校

去学习。另规定炊事员以灶为单位,大灶 10 人以内炊事员 1 人,30 人以内炊事员 2 人,60 人以内炊事员 3 人,百人以内炊事员 4 人,百人以上每增 30 人增加炊事员 1 人。

3 月底 陕甘宁边区清涧县整编完成。县政府设政务、政府两委员会,原有 5 个科合并为 3 个科,原有人员 38 人,减为县长以下,设秘书室 3 人,一科 5 人,二科 5 人,三科 5 人,司法处 2 人,通讯员 2 人,特务员 1 人,伙夫 2 人,共 26 人。裁余人员调任区级的 6 人,乡级 1 人,工厂 4 人,退职回家生产 1 人,调其它部门工作的 2 人,共 14 人,占原数百分之三十一一点六强。县警卫队原有 36 人,精简后只留下 32 人,减少 4 人,即减去原数百分之十二点五。全县区级干部原有 42 人,减为 35 人。全县乡级干部原有 41 人,各乡配备文书 1 人,现增至 78 人,即增加 37 人,占原数百分之九十点二强。

4 月 1 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太行政府各机关,经此次彻底精简后,各级机构大为紧缩,下层组织益臻巩固。据统计,边区行政系统及所属太行各专区专署、县、区、村等各级政权精简结果,已减少工作人员及杂务人员 8000 余人,不仅每年可节省人民大量负担,而且因干部深入下层,村区政权工作亦多有改进。通过精简可以看出:(一)简权中大部分减少了杂务人员,并增多了村不脱离生产干部,但区级以上干部的减少较差。(二)简政前甲等县干部与杂务人员之比是 3 : 2,简政后为 3 : 1.6,这就须加强干部的劳动观念。(三)边府各厅编制多者 11 人,少者 6 人,可见干部工作效率之提高。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事。(四)由区划变更与编制缩小,在政府方面可以节省不少经费,就是减少人员最少的二专区来说,县区

村干部共减少为 194 人,杂务人员 63 人,每人每年以 600 元计,则至少可节省开支 13 万 8 千元。同日报道:山东胶东专署实行第四次精简,精简结果,全体干部中百分之七十,均深入下层工作,其中处长级干部百分之三十四,科长级干部百分之四十二深入县区工作。百分之十六担任其它工作,科员级干部百分之七十一深入区村工作,百分之二十九参加经济工作。

同日 陕甘宁边区子长县整编工作已经就绪。县、区党政民原有干部 143 名,整编后共留 101 名。县府原有 6 个科现合并为 3 个科,干部由 32 人减至 21 人,原任五科长已派住南区当区长,科员到区上当助理员的有 11 人。此次整编中干部情绪很好,一般学生出身的干部,都以眼睛向下的决心自动要求到区乡去工作,并不认为这是降级。此次精简后工作效率已大大提高,在这次春耕动员布置中,区乡干部均能自动在乡与村中作生产计划,如中区六乡生产及运盐工作计划很详密,都是区乡干部自己做的;县上只派人到区乡检查与指导,已将过去以上代下的工作作风,初步改变过来。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正式开始办公。办公时间规定为经常办公与联合办公两种,经常办公由秘书处正副处长,秘书 4 人参加,联合办公时间定为每日两小时(下午一至三时),由政府各厅、处、会各派政务秘书 1 人参加。今后凡政府与各厅、处、会间或各厅、处、会相互间日常公文之交办、呈判、移转,与日常工作之联络商洽等,均在每日联合办公时间内处理。这不仅可以密切内部联系,而且更因此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行文手续,而提高工作效能。

4 月 19 日 新华社太行电讯:太行区简政中民力负担减轻。太行区民力负担主要是开会、警戒、支差三种。以和顺横岭一村为例,简政前(1941 年)群众平均计算,每月每人开会 1 天,站岗 1

天,支差1天,抬伤兵3天,其它2天,合计8天;村干部是开会2天,站岗1天,工作6天,出操1天,合计10天。简政后大部地区都实行了每月耗费群众时间不超过3天,半脱离生产干部不超过8天,不脱离生产干部不超过5天。根据地区站岗放哨已经取消,严厉禁止了无事在村听差拉人服务的事。

4月21日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抗救会经整编后重新建成。在此次精简整编前,分区抗救会共有脱离生产的干部及事务人员82名,精简后共有干部18名,其余的64名分别参加生产与转入其它工作岗位。现该会干部的配备是分抗救会两名,每县各1名,其余在有特别需要的区,酌配备干部1人,纠正了过去不按情况,平均分配的现象。

4月21日、22日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召开第九次常驻委员会议,林伯渠报告边区政府9个月来的工作,主要内容是:教育、生产两大中心任务的确立与执行;简政实施纲要的制定与实行情况;征粮征草任务的完成情况;拥军运动的开展情况;干部整风学习情况及制定各项法规的情况。报告最后提出目前政府工作需要做的两件大事是: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会议通过政府送交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修正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励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并决定由政府以草案形式公布,俟二届二次参议会大会正式通过。

4月2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

发出政府命令：“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修正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罚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业经本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兹特颁布施行，随令发下，希即遵照，切实讨论执行为要。”

5月4日 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党校合并大会，合并后改为中央党校第三部，这一决定是由中共中央作出的，彭真出席大会，并就组织机构、人选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工作等问题作了说明。

5月8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命令，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本公约共10条：（一）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体利益。（三）调查研究，深入检查，总结经验。（四）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五）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六）互亲互助、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七）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八）爱护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九）提高政治警惕性，严防敌探奸细。（十）努力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5月1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党的领导一元化和三三制政策》的文章。文章以本报答复来信的形式指出：“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是为着使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统一，使党政军民系统中的党员干部能够更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消灭共产党内部各个组织间及各个党员干部间行动上不一致的那些现象，使党的一切政策能够更加贯彻。”“三三制”是共产

党的重要政策之一。共产党是要求坚决实行这个政策的。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既然是为了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它当然也是为了保证三三制政策的贯彻。因此,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不但不会妨碍三三制的实行,反而保证三三制政策能够更好地实行。文章还分析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元化和“一党专政”的不同,指出:“一党专政”是由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把持包办政权,而对其它党派阶级则加以强力压制,不给与合法地位与民主权利。外国的法西斯党,就是这样干的。中国也有一部分,想学法西斯的办法,提出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口号。这种“一党专政”的办法,共产党从来就认为是违反民权主义原则的办法。因为中国需要团结一切抗日党派和阶级共同抗战共同建国,在这样的国情之下,要实行违反民主原则的“一党专政”,是非常不利于抗战救国的。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就是要使一切抗日党派和阶级都有合法地位和民主权利,使他们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抗战共同建国。这是最合乎中国国情的政策。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也正是为着保证这种民主政策的贯彻实施。

5月19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吴堡县生产运动中的劳动热忱,具体表现在农村党员、劳动英雄、退伍军人、精简回家的干部、在职的乡村干部等人的实际行动上,并从他们推及全县各农村劳动人民。退職干部丁宗新在了解精简政策下,特写信给几个县区级精简回家的同志,除鼓励各人积极生产外,并提议领导群众生产。

5月30日 新华社晋察冀电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从去年一月着手简政,至今共历4次。整风自去年五月半开始,迄今亦

届一年。二者进行的时间虽然不同,但自整风开始后,实际上即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第一次简政,主要是从量的方面减人,缩小各级政权编制(边区一级工作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九二;县级减少了百分之十三点八四;区级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第二次是第一次的继续(第一次减少的人员在内),比简政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但是对简政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只做到了减人,而没作到简政。事务主义与文牍主义的倾向,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第三次简政是在整风初步总结及参议会之后进行的,因而将简政重点改移在整顿组织机构与工作领导上。这一次精简才算是真正的搔到了痒处,收效之大远非前两次所能及。第四次是第三次的继续,中心在于改选领导,进一步贯彻简政。现在组织机构已大减缩,做到集中与统一。如财政部门之合并;专署以下之公安部门之改设为科;贸易局工矿局合并为管理局;教育部门减少科员增设督学;司法部门在高等法院以下各专署设法庭;县设司法处;均一新面貌。这些都是各部门加强工作,加强领导,加强干部的全面表现。各处除财政处、秘书处各减少科外,其余均取消科的组织。在肃清文牍主义方面,边委会发表之文告,今年3月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八;收到文件减少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八,而且仍在继续减少中。整风共分为3个时期,今年一月以后为第三时期,以巩固组织为中心。一方面根据整风精神,具体实行简政;一方面在整理下级政权(主要是村级)的工作中,进行具体的检查,研究下边如何简政。简政与整风的密切结合,是边委会第一期整风的基本特点。整风给了简政以思想上的准备,简政是整风的具体成果。经过了这次精简,边委会本身得到了极大进步——基本上克服了头重脚轻,机关庞大,机构不灵,分工过细等弊端。初步肃清了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作风,并清楚地认识三风不正,在政权部门中主要

表现是官僚主义；而事务主义、文牍主义正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

同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中国医科大学自实行精简后，工作人员减缩三分之一，原野战医院已变为医大附属医院。该校工作增多，一般同志工作热忱都增强了。教员每星期任课六、七小时，自己编教材，下午做实验，同时还兼医院的临床医疗工作。至于医生和实习医生，现在病员可以随请随到。在护士们中间，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已经没有了。一次为挽救延安县某保安队长的妻子，病势垂危，需要输血，当时许多护士同志争先恐后踊跃报名，病人因此得以挽救痊愈。

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以推动党的工作的开展。这个决定集中了整风运动的经验，同时也集中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革命工作的长期经验。

同日 关于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到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6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冀鲁边区工作,致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电。电称:冀鲁边形势严重,已成为完全的游击区域;必须善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密切与群众联系,隐蔽自己的力量,彻底改变过去的一套工作作法与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该区的艰苦斗争”。电报还具体指出:“该区脱离生产人员太多,望考虑在不妨碍坚持的条件下,将军队之一部分向其它地区转移,以减轻敌人注意和减少人员负担。”“军、政、党在组织上应实行完全一元化,除可隐蔽的地方干部外,其它负责干部应随军行动。统一党、政、军、民的领导,不必再保留各个机构的架子,多余的及当地难于隐蔽的干部,亦可有计划地撤出。”

6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宣言内容要与党的政策相适合。边区现在进行生产建设,“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做得很好。我们的政

策对敌是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对国民党是避免作公开武装冲突，把同盟者的力量用去对付日寇；对人民是拥政爱民，发展生产，使我党与农民关系弄好；对党内是保存干部，教育干部，进行整风。

6月22日 新华社鲁中电讯：抗大一分校自再度精简后，教育设施已更切实际。过去存在的党委、行政、教育三个系统的现象已根本改变，现全校自上而下，贯彻了一元化的领导。由于领导的转变，使教学中与实际的联系更加密切。连队教学已由单纯的理论的教学，走向掌握连队实际情况，学以致用的新方针，克服了无的放矢现象，使教育工作逐渐走向实际。

6月2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联合发出关于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原则的规定的训令：（一）有病的可组织临时休养所，按病情轻重及本人工作历史规定待遇，使之在一定时间恢复健康；个别情绪不佳，借口有病不愿担任工作者应进行教育与批评。（二）要求退伍归农的可给以土地农具房舍生活资料，由政府扶助他们，按月加以帮助，直到能够独立维持生活为止。或者争取他们加入公营农场一同参加劳作，在劳作过程中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当，然后实行退伍。（三）不论休养或退伍，均须照顾周到，关心体贴，不允许随意处置，不负责任，因为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可以造成错误和罪过，于内部团结是不利的。训令最后指出：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处理时，政府与军队必须分别负起责任，不得此推彼诿。在处理时应非常细致，要有十分耐心，不可害怕麻烦。至于经费一项，可由各分区按时做出预算，全报边府批准报销。

同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八路军留守政治部联合制定关于执行“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训令”之补充办法。办法指出：

对编余人员之处理,更应注意其思想教育,继续为革命服务之精神,说明他们现在虽因体力等之限制,不能在前方抗战,但也应秉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之精神,为抗战为建设自己家务,亦即建设边区事业而工作。办法分别对必须退伍人员、休养人员、家属作出具体的补充,如“抗日军人退伍后,参加农工商各业生产时,5年免缴一切捐税,同时开垦荒地耕种等,3年免缴地租。”“退伍人员家属则随其丈夫一起安置。”“休养人员之家属真有工作能力且无小孩牵累者,则可分配其适当工作;其不能工作者,参加生产;其有病不能工作与参加生产者,安置其休养;边区有家之家属,可送回家,其生活按优抚条例优待解决。”“退伍及休养人员转送各地安置时,均须编为组织,选定专人(较好之干部)负责率领,不得听其自由行动或放任不管。”

7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讲话。在讲到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时,毛泽东指出: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这些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7月7日 晋察冀边区召开高干会议,会议热烈讨论了“贯彻简政,改进领导,肃清官僚主义”等重大问题。对于肃清官僚主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检查反省,更进一步认识了民主与抗战的重要性。真正民主主要的是在于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民主与民生丝毫不可分离,任何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表现,都是官僚主

义的残余。由于在思想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所以在大会中其它问题的解决就很顺利。会中惊闻国民党顽固派调遣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全体出席会议的人员莫不愤慨，大家一致表示，互相砥砺，加强对敌斗争，坚决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援陕甘宁边区。

7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我党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中央今后要继续在全国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

同日 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们城下之盟，又见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殊不知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敌后亦请你们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

7月30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负责同志，指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8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晋察冀分局，对“精兵简政”

问题作重要指示：“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已悉。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部六千西移外，另调聂部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

同日 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再次强调“你们要下决心减去三万人，否则民困军疲，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三万精兵（包括游击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8月11日 为抽调干部送延安学习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请你和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黄镇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500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理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8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晋察冀分局，指出：“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8月1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

“中央给晋察冀分局关于保存干部电转给你处，谅已收阅。希望你处照此电意旨同样正确地处理此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干部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提拔中下级上来代替他们的职位。你处中级干部及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亦可送来，但不应放在上述数目之内。”

10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此指示主要地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其他各项政策，迭有指示，现不重述。但应知道：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但是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地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同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是一个重要文件,应在军队及党政民各方面广作宣传,并当作上课材料。”

12月1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林伯渠主持会议,他说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一年来施政工作,确定1944年工作方针。会议共开了18天,1944年1月10日闭幕。1月6日,林伯渠作了《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总结了1943年取得的成绩,他说1943年是生产运动大进步的一年,是军民团结更加巩固的一年,是防奸运动重大进步的一年,是贯彻“精兵简政”的一年。

本年 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工作的总结》。主要内容:一、精简前。精简政策提出之前边区各学校、群众团体及各地区情况是(一)部门太多,虚浮而铺张;(二)人员太多,有的人没有充分的工作做,同时各机关、学校都有许多不从事生产的“家属”;(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相重复,人力物力分散;(四)有些组织机关流于形式;(五)对干部标准,未曾规定明确条件;(六)机关内杂务与干部人数之比例,学校内工作人员(干部与杂条)与学生之比例,没有规定;(七)当时尚未实行干部的统一管理;(八)机关内部因人多,手续亦多,遇事要多经周折;(九)当时不论是各团体、学校与各分区工作中都多少存在着事务主义;(十)机构的变动性大,干部之流动性大。二、精简中。(一)机关变动与人员减缩:如西北局的三次精简共减少干部17人,取消了民运部,直属县管理委员会等。(二)机关学校的合并与精简的普遍深入,由第一次第二次的

分,各自实行精简,达到第三次的边区各团体合并为“抗联”,各学校合并为新延大。这样就减了“秘书处”很多,统一行政,节省了很多人员(以前每一个学校团体自秘书长到收发样样俱全)。(三)人员的甄别:在初步精简时,有些同志尚认为精简等于裁员,到二、三次精简时,才更加注意到挑选干部及学员的标准,并对在职人员按标准加以甄别。如民族学院,初次精简时,只说身体不好,不能培养成少数民族工作的人应当减去。第三次规定最简明,留下的学生标准是,年轻、进步快,将来能做少数民族工作,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四)行政合理化。如西北局增设行政处,划分秘书工作与行政工作于二处。旧延大以前有好几个会计,精简后会计工作已集中。(五)生产机构与经济部门的扩大。西北局到目前为止,生产单位有3个农场,又有皮场、磨坊、杀猪场、木炭厂、石灰厂、豆腐坊,又有生产科,所营之商业部门,目前自种及接庄稼之田地已逾千亩。三分区最近一次编余人员48人有44人转入生产部门。(六)业务条例之订立与工作、制度的建立。但这一工作在全边区尚未普遍深入。第三次精简编余人员的处理法有:(一)分配到县级、区级、乡工作;(二)供给生产部门;(三)当教员;(四)去学校学习;(五)退伍回家;(六)养病;(七)分配其它工作等。这次精简与整风相结合,对于编余人员除事先动员,进行解释外,还采用个别谈话,集体说服的办法,有的谈到5次之多。三、精简后。精简以后,不但人员马匹减少了,预算缩减,而且有以下好处:(一)效率的提高。(二)领导作风的转变。(三)不良现象的减少。(四)干部对精简认识的加强。同时看到这一工作中的缺点:(一)在初次和二次进行精简时,只注意到裁减在过去觉得是多余的人员,未曾注意到在新的工作作风下究竟可以节省多少人。(二)时间上没抓紧。初次精简后,边区各团体等待本局指示他们如何合并等,他们也没有给下层以指示,所以

下层也等待他们。群众团体的改编,本年是待了一年。党政的精简也嫌稍慢。(三)精简中提拔干部的工作或准备提拔干部的工作很不够,依赖上级“派干部来”的心理甚浓。(四)事先的解释、动员工作在有些地方还不够。在第一、二次精简中,对编余人员的处理亦较差,照顾未周。(五)据陇东报告:曾一度因未注意精简,初时对春耕领导抓得不紧。目前工作中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有些机关的彻底精简的计划已拟好,但无法立即贯彻。如鲁艺;按边府指示应减到120人,但目前尚有400余人,旧延安还有许多人留在校内整风。另一方面各分区各县干部,缺额太多,急待解决,如三边分区,分区级缺10人,县级缺44人,区级缺25人,乡级缺97人。共缺176人。四、意见。今后尚须注意(一)规定各种人员间的比例,需要略有限制;(二)普遍规定干部与学生的标准,减少人员与学生的流动性;(三)检查工作应注重研究每个脱离生产人员是否适合;(四)提倡一人能做两人的工作,不很忙的职务可由他人兼职;(五)调整干部“忙”和“闲”; (六)责成各机关、学校造具机构编制之简明图表,研究本单位编制制度之沿革;(七)加强业务教育;(八)精简医务所,司药助手等可以不要;(九)乡村精简者须进一步贯彻;(十)严格预决算制度,反对浮报人员。五、经验。(一)过去为什么机关那样庞大?“委员会”为什么那样多(如文协)?这是因为“事事为中心”、“件件要模范”的观点所致,形式分工的旧观点的束缚,铺张作风,本位主义未曾根绝,对于干部工作之“容量”(每人究竟作了多少工作),未曾加以逐一具体检查。(二)各分区在三次精简后,为何现在效率还未见提高?这是因为机构虽整编了,但工作作风与工作方式尚未彻底转变。旧的一套即“政”未“简”,“精兵简政”的本质,尚未完全贯彻到最下层。

1944 年

1 月 7 日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边区政府简政总结》的报告。主要内容：(一)精简问题；(二)统一领导问题；(三)反官僚主义问题；(四)提高效能问题；(五)节约问题。关于精简问题，报告主要讲了如下几点：(1)做到了业务精简，实行生产第一、教育第二。(2)做到了机构精简。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已经裁并了四分之一。如取消各厅、院秘书室，各厅管理科，银行研究室，民厅由四科合并为二科等等。边府直属机关从 35 个减至 22 个。税局、税所从 95 个减至 65 个。银行办事处 9 个全部撤消。各系统缉私机关与保安处检查机关合并。(3)做到了人员精简。边府各厅、处、院等及其附属机关的干部，大部已经如数精简，个别机关还缺人。合署办公前，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共有人员 469 人，合署办公后，就只有 279 人，计减去 190 人，占原有人数百分之四十强。各厅、处、院(物资局、银行、行政学院除外)原定编制数为 261 人，现仅 246 人，尚缺 15 人。附属机关(通讯站、卫生处、门诊部、边区医院、医校、第一、二休养所、抗委会、招待所、粮局、税局、盐务局、警校、公安局等)原定编制数为 197 人，现仅 190 人，尚缺 7 人。但应该指出的，就是还有不少家属未经处理，因之杂务人员未能完全精简。对于编余人员安置办法有两个：转入生产或转送学校。边府一级大部分转送学校，小部分转入生产；专署以下，大部分转入生产或加强下级，小部分转送学校。整个政权系统的编制大致已经精简，但因家属未经处理，送学同志仍算政府人员，所以不属正式编制而吃公粮的，还有 1000 至 1200 人。(4)调整了干部。提拔了一部分干部到专署和边府工

作,也选派了许多得力干部,加强了下级。为使精简工作做得更好起见,还须解决(1)继续加强乡政权,创造更多的模范乡村;(2)注意增强某些财经部门及司法教育部门的干部;(3)提倡家属参加生产;(4)因情况变动可以再行紧缩的,均须继续精简之。报告最后指出:曾经有过那么一些人,他们非常害怕“精兵简政”这一政策,他们懂得,这是一个重要政策,是边区的十大政策之一。因此,他就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的精简政策就是排挤非党人士,就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准备”,企图以此一举两得,破坏我们的团结,又破坏我们的精简政策。但事实证明了这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已经不是根据他们的愿望,而是根据人民自己的意志,将这个“精兵简政”政策坚决地实现了。但为了今后的需要,我们必须把精简政策更向前推进一步,把它与发展生产、提高军事、继续防奸三大中心任务联系起来,与其它各种政策联系起来。我们首先要在政府系统中把它贯彻到底,同时希望军队与机关学校也继续贯彻它。为着全世界推倒法西斯强盗,全中国推倒日本帝国主义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工作还应加强,我们还应从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方面,做我们尚未做得彻底的工作。

5月1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致函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及边区行政委员会,建议厉行精简减轻公粮征收。该函声称:“在7年艰苦斗争中,边区人民勤劳生产,节衣缩食,以支援前线。在敌寇残酷的掠夺烧杀之下,边区人民生产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前年执行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政策以来,去年人民负担已较前减轻,为关怀人民困苦,坚持长期抗战,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政策,以求增加国民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我们特建议于今年北岳区统累税征收中,减轻公粮×万大石,使每乡(按此乃统累税的征收单位,而

不是土地面积单位)负担量最多不超过8市升半。冀中、平北及冀热边亦须实行精简及发展生产,适当减轻人民负担。”边委会于6日发出布告,按照分局提议,确定北岳区本年度统累税每分负担量最高不超过8市升半;在冀中、平北及冀热边各地区,除加强对敌战斗,减轻敌伪勒索外,亦厉行精简政策,适当减轻征收数量。于此,边区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了。《晋察冀日报》于14日发表社论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这一建议,完全是以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精兵简政与发展生产的政策为前提的。今年统累税负担的减轻,决不是单纯地从财政观点上提出的,而是从积极地发展生产的观点上提出的,它一定会更加鼓励与推动边区的广大人民,进一步积极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在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更加有利地开展对敌斗争,反对敌寇的抢掠和勒索。”

5月7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的文章。《解放日报》在该文前言中指出:自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后,太行区即认真周密、彻底执行了这一政策,并能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及当前具体任务,不断地改进与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从四二年到现在,该区已进行了3次简政,且得到了不少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兹特报道于后,以供各地参考。文章主要内容有:(一)简政的方针与办法;(二)机构紧缩与行政区的划分;(三)人员缩减与干部调整;(四)生息民力;(五)领导作风的改进。关于三次简政的经过:第一次是从1942年初开始,具体办法:第一,裁汰骈枝机关,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确定政民全体脱离生产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第二,纠正头重脚轻,充实下层,提高干部质量,增强工作效率;第三,废除一切繁文缛节,建立简便的工作制度,提倡朴素计算与管理的作风;第四,反对浪费,肃清贪污,节省民力。但在五月“扫荡”

后,又鉴于组织机构还不够精干,不能适合于当前的“扫荡”新形势,因而又提出二次简政,其方针是进一步缩小上层机关,足够地充实下层,培养各地区之独立工作能力,其具体办法:第一,减少边府专署两级人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加强县区两级;第二,减少边府事务,加强专署县府职权;第三,着重改革机构,实施重点是强调适应战争。到1943年一月,又鉴于二次简政后,总数上虽减少很多,然还有些机关仍比较大,各系统强调垂直,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是又提出第三次简政,其方针是适应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游击战争的环境,加强区村工作,加强一元化的领导,用各种方法减轻人民负担,密切群众联系,加强对敌斗争。具体办法:第一,大大减缩边府专署两级机构,合并性质相同机关,放弃一些次要工作,抓住中心环节;第二,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第三,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下层,加强薄弱部门及游击区敌占区工作,提倡干部降级使用;第四,保存培养干部,以作今后准备。关于在编制区划中所发现的问题,有一条是“各科林立固然不好,但只图简单混合为一,而取消了部门工作,特别是合并教育系统,取消建设系统,致对生产与教育工作,受到相当的损失。”关于人员缩减与干部调整,指出基本原则是精干上层充实下层,因职设人,不因人设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降级使用。在调整中曾发生过如下的问题和缺点:第一是本位主义。若干机关和干部只顾自己方便,总想给自己增加或保留一些人员,口头上拥护精简,实际上托故不让调动,或者有因机关合并,将本机关的生产节约所存全部浪费。第二是个人主义。有些人对自己的马匹勤务员表示抗拒不让精简,或者表现“要减都减,不减都不减”的平均主义观点,有些被减的人表示悲观消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甚至痛哭涕流。也有轻视被减者,未被减的自豪自骄的现象。这些表现,都是说明对精简政策缺乏正确认识,在领导上思

想动员也不够深入,对精简下来的人员安置不够迅速,个别不移妥当。因而精简前后,机关呈现混乱,干部情绪动荡。二次简政因着重于机构改革,干部情绪没有多大震荡。到第三次简政时,因已有两次的经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与混乱状态,基本上是克服了,不过还有个别同志无条件地要求到后方学习,或一味企求个人物质享受而想调到工商部门工作,但在总的方面,三次简政是进步的多了,主要的缺点是精简下来的人员没有尽可能地组织到生产里面去。

7月9日 新华社晋察冀电讯:晋察冀边区政府继续贯彻精简。为进一步实现统一领导,强化行政效能,边府于第七次委员会讨论对组织机构变更如下:(一)委员会之下设立办公厅,承委员会之命处理会内一切日常事务,厅下设研究室及文电、干部、总务3科。(二)民政处、教育处、高等法院三部门结合,成立第一办公厅,下分第一、二两科,一科掌管民权、司法、教育方面的行政事项,二科主要掌管编辑、整理、研究材料等工作。(三)财政处、实业处、银行三部门结合,成立第二办公厅,下分第一、二、三3科,一科掌管农村合作事项,二科掌管工商事项,三科掌管财政事项。(四)公安管理处的组织与内部分工仍旧。上述新组织分工,已于6月19日开始实行。此次变更组织的主要特点是:(一)打破旧政府多少年来传统的组织形式(民、财、建、教……平列起来的老一套),创造了新的组织形式,使各部门工作今后结合更密切,免得各自为谋,分散力量。(二)加强调查研究,从组织上解决这一问题。(三)过去各处院是首长制,民主精神发扬得还不够,今后各办公室均采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工作效率将更加加强。

9月8日 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战士，9月5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讲话，深刻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他在讲话中提到：“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